

FD & 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2年12月号

金融与发展

慈善事业 播下改变的种子

比尔·克林顿论创新型合作

专访杰弗里·萨克斯

解读LIBOR

Jeremy Clift

主编

Marina Primorac

责任编辑

Camilla Andersen

James L. Rowe, Jr.

Hyun-Sung Khang

Simon Willson

Natalie Ramirez-Djumena

高级编辑

Glenn Gottselig

网络编辑

Khaled Abdel-Kader

Jacqueline Deslauriers

Maureen Burke

Lika Gueye

助理编辑

Lijun Li

印制/网络产品专员

Sara Haddad

媒体经理

Nicole Braynen-Kimani

高级编辑助理

Harris Qureshi

编务助理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Kenneth Grubby

Michelle Martin

Seemeen Hashem

美术设计

编辑顾问

Bas Bakker

Thomas Helbling

Nicoletta Batini

Laura Kodres

Helge Berger

Paolo Mauro

Tim Callen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Paul Cashin

Paul Mills

Adrienne Cheasty

Martin Muhleisen

Alfredo Cuevas

Laura Papl

Marcello Estevão

Uma Ramakrishnan

Domenico Fanizza

Abdelhak Senhadji

James Gordon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 版权所有，IMF 2012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特辑

改变的催化剂

8 慈善义举

在被官方援助所遗忘的角落，慈善和社会公益创业能够发挥作用吗？

马莉娜·普里莫拉茨

10 殊途同归

慈善和私人投资在全球应对贫困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迪恩·卡兰

14 学习型社会实验室

社会公益创业提供创新、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J. 格雷戈里·迪斯

18 观点：合作的力量

各种创新型合作网络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比尔·克林顿



8



18

本期还有

22 中国推动西方创新

中国制造业出口商所从事的是低技能生产，但却推动了西方的高技能创新

尼克·布鲁姆、米尔科·德拉卡、约翰·凡·里宁

25 当商品价格飞涨之时

价格暴涨可能对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很高且制度较弱的国家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加斯顿·杰罗斯、尤利娅·乌斯秋戈瓦

28 花费还是分配

发展中国家可以把商品特别收益金花费在实物投资上，但是从短期的角度看，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其国民可能更加有利

拉巴·阿尔扎基、阿诺·迪普伊、阿兰·盖尔布

34 公平分享

目前，通过再分配社会支出应对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经济体比发展中经济体中更为有效

弗朗西斯卡·巴斯塔利、大卫·柯迪、桑杰夫·古普塔

38 直言不讳：反思可持续发展

必须制定一个新的发展议程，使之真正具有全球性、与所有各方相互关联，并且在责任分配方面切合实际

奈梅特·沙菲克

40 相对难题

发展中国家正在重新评价贫困的定义

马丁·瑞沃林

44 躲避风暴

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大部分

国家总体上幸免于持续性的欧元区危机，但这种局面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巴斯·B.贝克尔、克里斯多夫·科林根



40

亿万富翁进行曲：给予的艺术

通过使用蚊帐、修建学校和改善基本卫生条件来抗击疟疾，慈善家们正帮助改变整个发展中世界。这些富有的捐赠者的财富大多来自电脑软件、娱乐业和风险投资。他们捐出自己的财富，以对抗贫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对官方援助渠道而言是一种补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官方援助。

从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到阿里科·丹格特、乔治·索罗斯，这些亿万富翁、资本主义的巨头用自己的资金支持公益事业。无论是提供新的疫苗、兴建图书馆，还是购买亚马逊雨林以保护自然环境，慈善家们支持公益事业创新和新途径，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构筑梦想。

本期《金融与发展》关注定向赠与和社会公益创业。

“慈善家所起的是带头作用，”微软的创立者之一、世界最慷慨的捐赠者比尔·盖茨这样说道。“我们利用基金会的基金来建立一个让市场力量更有利于穷人的体系。”他说，慈善事业的催化剂效应能产生重大影响。“好的想法需要传播者，而那些被人们遗忘的社区需要为其伸张权利的人。”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告诉我们，政府、企业、

民间团体间的创新型合作网络能够使事情做得更好，并更有利于世界上最紧迫问题的解决。

在本期，普卡拉什·洛嘉尼采访了明星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后者支持减免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和“千年发展目标”。我们探讨了穷国政府如何稳妥地将收入转移支付给居民，而不是用于获得意外之财的实物投资（这往往是腐败的根源）。在“数字聚焦”栏目，我们研究了中央银行为缓解笼罩发达经济体的危机的出路的举措。同时，我们得知中国的增长是如何激发西方世界的创造性。

在《金融与发展》杂志的不同职位上工作了十年之后，这将是作为主编的最后一期。我将出任IMF出版局局长。杰夫·海登将会接任主编之职，责任编辑玛莉娜·普里莫拉茨领导的编辑团队以及由路易莎·曼吉瓦长期领导的美术编辑团队将鼎力支持。《金融与发展》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重点关注全球发展问题的优秀读物。

杰里米·克里夫特 (Jeremy Clift)

主编

- 48 重构增长
为刺激增长，欧元区必须将积极的体制改革与拉动需求政策相结合
博格尤特·巴克布、杰斯明·拉赫曼
- 52 日本青年畅所欲言
日本高校学生获胜论文
介田智子、瀧永大典、仲田健治

其他内容

- 2 简讯
- 4 经济学人物
涉足多个领域
普拉卡什·洛嘉尼对“逍遥派”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采访
- 20 图表释义
投资于人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全球衰退凸显出教育的重要性
德克·冯·戴姆、科林·赫克曼、伊丽莎白·维鲁特雷克斯
- 32 回归基础
什么是LIBOR?
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被广泛用作利率基准，但如今却备受诟病
约翰·基弗

- 43 数字聚焦
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
几个主要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牵制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里卡多·达维科、布莱恩·约翰·戈登史密斯
- 54 书评
《过度消费的国度：美国的富裕与贫困悖论》，莫妮卡·普拉萨德
《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哈罗德·詹姆斯
- 57 索引

插图：封面、第8—9页，Michael Gibbs；第20—21页，Seemeen Hashem。
摄影：第2页，Jane Sweeney/JAI/Corbis；Latin Stock Collection/Corbis；Nic Bothma/EPA/Corbis；第3页，Gideon Mendel/Corbis；Craig Lovell/Corbis；Ric Ergenbright/Corbis；第4页，Ted Aljibe/AFP/Getty Images；第10页，Jay Directo/AFP/Getty Images；第14页，Pawan Kumar/Reuters/Corbis；第18页，Bryan Bedder/EPA/Newscom；第22页，Bo Zaunders/Corbis；第25页，Peter & Georgina Bowater Stock Connection Worldwide/Newscom；第30页，Yaw Bibini/Reuters/Corbis；第34页，Margie Politzer/Lonely Planet；第38页，IMF photo；第40页，Rene Mattes/Hemis/Corbis；第44页，Tibor Bognar/Corbis；第48页，Paul White/AP/Corbis；第52—53页，Yuko Ide/IMF；第54—55页，Michael Spilotro/IMF。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排名上升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称，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上升16%，超过2005—2007年危机前的水平。该机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12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将减缓，但总额仍将保持在1.6万亿美元。

该报告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指数（该指数衡量一个经济体成功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表明，在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所占比重超过往年。2011年，新加入的、排名靠前的国家包括爱尔兰和蒙古。资源丰富的国家——智利、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刚果共和国也榜上有名。

还有不少国家（包括加纳和秘鲁）的排名虽然没有进入前10位，但却表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这两个国家在过去6年间的排名都有所上升。



拜特雷克观景塔，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教育更好，收入更少

泛美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尽管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近来有所缩小，但仍普遍存在。

《新的世纪、旧的差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性别与种族的收入差距》(New Century, Old Disparities:

Gender and Ethnic Earnings Gap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比较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8个国家具有代表性家庭的调查，发现在同等条件（相同年龄、相同学历）下，男性的收入比女性高17%。该报告还称，近年来的收入差距已经有所缩

小，但缩小的速度很慢，令人难以接受。

研究表明，尽管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平均比男性要高一些，但低收入职位绝大部分还是由女性担任，诸如在教学、卫生保健和服务业领域。根据家庭调查，该地区的高收入职位中仅有33%是由女性担任，涵盖领域包括建筑、法律和工程设计。在这些领域。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非常大，平均达到58%。

该研究指出，要在劳动力市场达到性别平等，转换家庭角色以及改变传统观念至关重要。



课堂上的学生，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睿智增长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项新评估表明，如果当前的这一城市化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全球城市化将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

《城市与生物多样性展望》(Cities and Biodiversity Outlook) 汇集了全球123位科学家的研究。该报告显示，预计60%的土地有待开发，并将在2030年成为城市。该报告称，这为通过促进低碳和节约型城市发展来改善全球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机遇，因为这能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并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全世界的城市总面积预计在2000—2030年间将增加3倍，城市人口将增加2倍，达到49亿。这一扩张将对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的压力，而且还会占用主要的农业用地。

该报告还强调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各级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成功措施。例如，哥伦比亚波哥大实施周末期间关闭公路、

改善公交体系以及修建自行车道等措施，以增加居民的体育锻炼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013年大记事

- 1月15—17日，阿联酋阿布扎比世界未来能源峰会
- 1月23—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 3月14—18日，巴拿马巴拿马城泛美开发银行年会
- 4月19—2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
- 5月2—5日，印度新德里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 5月10—1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
- 5月30—31日，摩洛哥马拉喀什非洲开发银行年会



津巴布韦营养不良的儿童排队领取食物。

八分之一的人在挨饿

根据联合国一份有关饥饿的报告显示，2010—2012 年有近 8.7 亿人（1/8 世界人口）长期营养不良。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布的《2012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12) 称，自 1990 年起，全世界范围内饥饿人口数量下降了 1.32 亿。

然而该报告也指出，饥饿人口数量在非洲和近东地区有所上升，且自 2007 年起，减少饥饿的进程在总体上停滞不前。

报告里提到，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还是有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到 2015 年将发展中世界的饥饿人口数量减半的目标。

2013：国际水合作年

联合国已经将 2013 年定为国际水合作年。

其目标是提高加强合作潜力的意识，同时鉴于对水资源的获取、分配和服务需求的增加，水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负责牵头推广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其宣传活动中突出那些成功的水合作措施的历史，并确定在水资源教育、外交、跨界管理、金融合作、国内与国际法律框架以及与“千年发展目标”间的联系方面的主要问题。



缅甸彬乌伦的阿尼斯堪瀑布。

应对阿富汗的气候变化

阿富汗政府推出了一项 600 万美元的气候变化措施，这在该国还是头一回。

这一里程碑式的措施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实施，旨在帮助那些易受气候变化（如干旱）影响的社区，并建立阿富汗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能力体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阿富汗列为全球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因为该国受影响的程度更大但应对这一影响的能力较弱。

阿富汗大部分农业生产活动依赖发源于中部高地的河流。全



阿富汗巴米扬省的灌溉田地。

国的自然生态体系非常脆弱，在许多地区，日益增加的人类活动所带来负面影响，当前多变的气候（主要是频繁出现的干旱以及极端天气导致的洪灾和泥石流）进一步恶化了这一状况。

该措施包含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和使用计划、基于社区的流域管理计划、改良梯田计划、农林业、有关气候的研究计划以及早期预警体系、改进粮食安全、牧场管理。

在阿富汗，60% 的人口生计依赖于农业。



普拉卡什·洛嘉尼对“逍遥派”

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采访

涉足 多个领域

很难想象还有人的职业生涯能比杰夫·萨克斯 (Jeff Sachs) 的更有建树、更加丰富多彩。1982年, 28岁的萨克斯被哈佛大学授予终身教职。30岁出头的时候, 他帮助玻利维亚终结了恶性通胀, 并对其债务结构进行了重组。仅几年之后, 他帮助波兰政府起草了从计划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蓝图。随后, 他又担任了包括俄罗斯、爱沙尼亚、布基纳法索和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政府顾问。此外, 他为帮助众多贫穷国家免除债务进行宣传呼吁, 并作为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顾问, 制定了一项旨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计划。自2002年以来, 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 萨克斯制定了更加高远的目标。地球研究所是由850名人员组成的跨学科组织, 旨在应对全球部分最为棘手的问题, 如消除疾病和应对全球变暖等。

所有这些给予了萨克斯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才能享有的超级明星地位。2005年, MTV播放了一部萨克斯与著名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在非洲考察的纪录片。此前, 他曾与U2乐队主唱波诺 (Bono) 一道, 为免除贫穷国家的债务进行宣传呼吁。当时萨克斯的哈佛同事、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 (Robert Barro) 回忆道, 萨克斯曾邀请他和波诺共进午餐, 讨论宣传活动。巴罗说, 他的“本能反应是谢绝邀请”, 不过, 他年仅十岁的女儿说服了他, 女儿说: “爸爸,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棒的事情了……当然你必须得去。”

然而, 萨克斯的工作也招致了批评, 有人说他所倡导的政策往往会带来很强的副作用。对于这种指责, 萨克斯总是强烈否认: “在玻利维亚、波兰和俄罗斯, 我的工作就如同急救室里的医生。这些患病的国家已经处

于休克状态: 恶性通胀、物资匮乏、政局不稳、货币体系面临崩溃、恐惧心理无处不在。那些纸上谈兵的批评家们对这种混乱状况的性质以及在这种动荡的情况下制定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都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千万不要将进入急救室的患者的不良状况, 也归罪在医生身上。”

哈佛派系

萨克斯1954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祖籍是先前为波兰所属、后来又划归前苏联的格罗德诺。其父是一位杰出的劳工律师, 在美国民主党内政治生活中表现活跃。萨克斯的妹妹安德莉亚 (Andrea) 回忆道, 他们的父亲经常告诫他们“诸事顺时多为善”。在考虑是否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律师后, 萨克斯最终没有选择哈佛法学院, 而是选择到经济学系就读。哈佛经济学院也成为他此后30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地。

上大学时, 他修完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所有课程。1982年, 他在经济学界领先的学术期刊《计量经济学》杂志 (Econometrica)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点边值问题的多种解决办法》 (Multiple Shooting in Two-Point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的论文。固然, 他的这篇论文获得了他人的部分帮助。他的合作者包括现任IMF第一副总裁的大卫·立普顿 (David Lipton); 现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一家美国著名经济研究机构) 局长的吉姆·波特巴 (Jim Poterba); 前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兼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即便在人才济济的哈佛大学, 萨克斯仍然非常引人注目, 28岁时即获得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

不过，真正让萨克斯脱颖而出的并不仅仅是他在技术方面的卓越才华，同时还来自于他热衷于应对当今各种迫切的经济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且为这些解决方案得到采纳而大力游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写道：“杰夫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既是一流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把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起死回生”的解决之道

萨克斯首个参与的重大项目是1985年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的经济顾问。当时，玻利维亚的年通胀率高达600倍。萨克斯指出，如此之高的通胀率意味着“如果你不小心把（钱）放在你的口袋里有一周或两周的时间，它的价值就会失去1/4。”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事实上，工薪阶层得到大把大把的钞票，然后立即奔向市场，希望将手中很快就会不值一文的钞票换成可以保值的商品。萨克斯说：“你真地感觉到紧迫性，你真地是绞尽脑汁，希望找到可能发挥作用的解决办法。”

萨克斯说，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通常，当政府面临预算赤字，希望通过印制钞票来弥补赤字时，就会出现恶性通胀情况。因此，遏制恶性通胀的关键要素就是给政府获得实际收入的部分渠道。对玻利维亚来说，就需要大幅提高政府所拥有的石油价格。此前，国家为油价提供了大量补贴。将油价提升至一个现实的水平，确保了当政府出售石油时，“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教育经费。”这就充分弥补了政府的预算赤字，从而终止了恶性通胀的状况。

萨克斯说，终止油价补贴的措施“是一大进步”。他指出，由于货币贬值，穷人成为恶性通胀的主要受害者，而“极低的油价则使富人从中受益”。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那些走私者，他们从玻利维亚购买成品油，再将其偷运到秘鲁。”

在帮助玻利维亚提高油价的同时，萨克斯还帮助玻利维亚争取减免债务——1984年，玻利维亚的公共债务是其财政收入的110%。这使他与IMF的意见不合，并且这不是最后一次（见专栏）。萨克斯说：“由于当时国际社会尚未确立减免债务的原则，这使（我）与IMF和各大银行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不过，萨克斯仍然牵头负责出面帮助玻利维亚开展谈判，最终帮助玻利维亚免除了90%的外债。

1986年年初，玻利维亚的高通胀状况得到解决，“此后玻利维亚一直是美洲地区中通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不过，玻利维亚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这使萨克斯深感苦恼，并导致他此后为清除影响该国经济增长的障碍开展了更为重要的工作。

瓦文萨的苦恼

萨克斯在玻利维亚所取得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业务。1989年年初，波兰政府与他接洽，希望他帮助波兰向资本主义过渡。萨克斯与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就市场经济学理论以及可以实施的措施”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不过，当时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对波兰经济转型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

萨克斯使他们确信波兰可以实现经济转型。如果市场自由化，即物价由市场供需而非行政指令确定，就可以发挥其作用。一旦市场开始运转，国内投资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外投资就将带动波兰工业的发展。同时，按照他给玻利维亚政府的建议，萨克斯对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说：“不要去管外债——外债会被免除的。”

几个月之后，波兰团结工会开始转变看法。一天晚上，萨克斯及其哈佛同事利普顿来到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之一亚切克·库隆（Jacek Kuron）的家中拜访。萨克斯和利普顿为他简要地描绘了转型计划。最后，库隆说：“很好！详细写出整个计划。”萨克斯说，他和利普顿回美国后马上将整个计划写出来，并尽快寄给库隆。然而，库隆说，“不行。明天上午我就需要这个计划。”

于是，萨克斯和利普顿回到了他们的办公室，萨克斯说，他们已在办公室的“水槽上放置了很多木板，足可以放下一个电脑终端。”于是他们通宵达旦，编写完了整个计划，“从晚上10点左右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看了计划后，对萨克斯说：“你可以马上坐飞机去格但斯克了。现在是你去见瓦文萨先生的时候了。”

亚洲危机

长期以来，萨克斯一直对IMF持批评态度。即便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态度也依然如此。在与史蒂夫·拉德莱特（Steve Radelet）合著的一篇文章中，萨克斯写道：“将（亚洲）经济萎缩归咎于亚洲各经济体的深层次问题，如亚洲的权贵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这种解释似乎太言过其实。”相反，拉德莱特和萨克斯将亚洲金融危机归咎于“亚洲各国政府在危机之初出现的金融恐慌、政策失误以及国际救援计划设计不良等综合因素，”使得危机更为严重，超过了“必要或不可避免的状况”。

尽管拉德莱特和萨克斯一致认为，在外资撤离后必须提高银行利率，但他们对“IMF要求进一步提高银行利率，并在外资已开始大量撤离后仍要求（亚洲国家）保持财政盈余”的主张提出了质疑。IMF的建议所依据的假定条件是，更高的银行利率将带来“货币的稳定或升值，而货币稳定在降低外债偿还成本方面带来的好处，将超过银行利率提高导致的短期生产成本增加的不利影响。”

不过，与众多其他观察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样，拉德莱特和萨克斯对进一步提高利率所带来的好处是否物有所值提出了质疑。

波兰人的骄傲

在萨克斯和利普顿通宵达旦完成的计划基本要素的基础上，相关工作在1989年全年继续推行。其中，波兰财政部长莱舍克·巴尔采罗维奇 (Leszek Balcerowicz) 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团结工会的经济计划在1990年1月1日正式对外宣布。萨克斯说，这一时刻确实“非同寻常，(因为) 当时波兰正处于高通胀、混乱、绝望、经济极端贫困、商品匮乏的时期，要推出一项如同这样前所未有的实验确实不可想象。”

现任IMF研究部研究员的安德鲁·伯格 (Andrew Berg) 当时是在波兰工作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他说：“我那时可以说是萨克斯—利普顿联盟的常驻波兰代表。”他回忆道，和萨克斯共事“很有启发，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好的理念。”而事实证明萨克斯的观点往往是最好的。伯格说：“杰夫可以将复杂的事情化繁为简，”他非常清楚“二维图表可以让人们明了整个大局。”

正如萨克斯和利普顿此前所倡导的，该经济计划迅速使波兰的物价自由化，并使波兰的商贸活动迅速开放，缓解了消费品和关键生产投入匮乏的状况。萨克斯说，该计划阻碍了主要的国有控制行业的私有化进程，这是因为他对此“没制定详细的计划，这一进程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

不过，经济计划同样导致物价飞涨，使得高通胀状况更加恶化。食品价格在一个月內增长了一倍，对波兰能源生产至关重要的煤炭价格飙升了六倍。而工资水平则停滞不前。“你知道，工资的增长速度不可能赶上物价的增长速度，”萨克斯说，“这就是全部的道理。”

同时，萨克斯还为波兰政府从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那里获得资金援助而极力游说。伯格回忆道，利用他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话卡，波兰财政部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就可以给时任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打电话申请经济援助。

该计划最初导致的阵痛曾引发人们对萨克斯的指责，但此后人们对该计划的长期效益则很少存在质疑。

更加艰巨的挑战

随着波兰的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它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前苏联的关注。1990—1991年期间，萨克斯开始和当时的前苏联经济学家格里格利·叶维林斯基 (Grigory Yavlinsky) 合作，设计民主化和经济改革计划，当时西方国家对前苏联在未来五年间的技术援助和经济资助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该计划名为“大交易”计划 (Grand Bargain)。

1991年年底，萨克斯被正式任命为叶利钦的经济顾问。利普顿和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安德斯·阿斯伦德 (Anders Åslund) 是他的主要助手。

阿斯伦德说：“除了由前苏联年轻的改革者组成的盖达尔团队外，前苏联国内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专业知识。”因此，团队成员由在西方接受过培训的年轻的前苏联经济学家以及从西方聘用的经济学家组成，从西方聘用的经济学家包括伯格以及当时刚从哈佛毕业、现任IMF研究部研究员的安德鲁·华纳 (Andrew Warner)。

萨克斯说，“我们获得了当时最高级别的信任：拥有出入内阁大厦的长期通行证并在大厦内部为我们常驻莫斯科的工作人员预留了几间办公室。”伯格回忆道，当他在莫斯科机场下飞机后，很快通过移民局检查处，钻入一辆已经等候多时的豪华轿车内，“当时还有豪华轿车的专用车道。”不过，伯格说，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味道：“空气中有一种汽油的味道，他们告诉我，这是由于汽油存放在轿车的行李箱中所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油价暴跌，使前苏联的经济支柱产业——油气生产行业一度遭受重创。

该地区缺乏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实践。华纳说，萨克斯及其团队所做的绝大部分是阐释基本原理的“常识性的经济学”工作。“我们力争使每个月的信贷额增长幅度不超过25%，并开展了基本的预算改革。萨克斯在学术上坦诚相见，”华纳说：“总是尽力获得正确的数据并推动开展正确的分析。”

在俄罗斯遭受挫败

不过，萨克斯及其团队成员在俄罗斯并未像此前在波兰那样取得成功。在一篇名为《我在俄罗斯的工作》的长篇辩护性回忆录中，萨克斯认为结果之所以令人失望，其原因在于他的建议被俄罗斯团队在很大程度上不予理睬，同时被西方国家几乎全部不予理睬。尽管萨克斯有关消除物价控制的建议在1992年年初开始执行，但他有关紧缩货币供应和终止对企业补贴的建议则未得到采纳。因此，高通胀状况“在好几年时间内仍然有增无减，”使得改革背负骂名。

阿斯伦德说，萨克斯及其团队也“未能成功解除对能源价格和外贸的管制。”这意味着，“部分人可以用一美元买到石油，然后在国际市场上以100美元的价格转手卖出，因此这些人肯定没有改革的动机。”萨克斯有关大型自然资源企业应该继续由国家控制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采纳；阿斯伦德说，相反，“该行业通过极度腐败的方式进行了私有化，导致政治寡头的产生。”

不过，阿斯伦德说，萨克斯及其团队在俄罗斯遭受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与萨克斯的建议背道而驰的是，“西方国家未对俄罗斯提供任何帮助。”七国集团 (G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 几乎未提供任何经济援助，相反却将责任全部推给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时任IMF俄罗斯监管部主任的约翰·奥德玲—斯密 (John Odling-Smee) 曾经写道：“它们

自身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七国集团将IMF的作用置于“有时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要求IMF基于符合该机构“正常标准”的政策原则向俄罗斯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当七国集团希望显示其对俄罗斯政府的政治支持时，又要求IMF放宽这些标准。

奥德玲－斯密说，鉴于这种双重作用，“有时造成这样一种气氛，比如在1993年年底……IMF感到即便因为未能坚持那些不力的政策而犯错，也不应中断向俄罗斯政府提供贷款。1993年萨克斯继续向俄罗斯政府提供咨

在经过30年关注于世界各地的
问题之后，萨克斯重新将目光转向
美国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

询建议，但那年的状况“（在政策措施方面）比1992年甚至更为糟糕，”于是他和阿斯伦德在1994年1月公开宣布辞职。伯格说，在人们的眼中，俄罗斯成为了“一个非常另类的国家，即使用最为优秀的人才和最为卓越的理念来进行改革也会在此大碰其壁。”

资源诅咒

20世纪90年代中期，萨克斯将注意力转向研究为何世界上部分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的问题。他在玻利维亚和俄罗斯的工作经验是其中的一个激发因素。20世纪80年代，玻利维亚轻松战胜了恶性通胀状况，但其经济增长率仍然不高。萨克斯认为，这是由于玻利维亚“过度依赖于几个主要的商品出口，”以及“从地理位置上讲是一个安第斯山脉内陆国家，被高原和热带森林低洼地带所分开。”

表面上看，大宗商品出口似乎可表明一国的资源非常丰富。然而萨克斯和华纳指出，实证研究证明，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产生这种倾向，即“资源丰富往往滋生惰性。”法国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曾在1576年写道：“那些土地肥沃国家的人们往往过于娇气、懒惰和懦弱，”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荒芜国土上的人们则表现得更为“稳健、勤奋和执着。”

萨克斯和华纳指出，一些历史经验似乎证实了博丹的看法。17世纪，荷兰超过了黄金资源丰富的西班牙。19世纪和20世纪，资源贫乏的瑞士和日本突飞猛进，超过了俄罗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部分亚洲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同样发展迅速，超过了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国家。

萨克斯和华纳通过开展世界范围内的对比研究，验证了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他们的统计分析证实，“在经济增长方面，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往往大大超过资源丰富的经济体。”

遏制贫困

在过去十多年间，萨克斯一直关注非洲地区以及如何遏制该地区的贫困状况。在“2000年欢乐”免除债务的宣传活动中，萨克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地说服债权国免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萨克斯和波诺向债权国的总统和首相（总理）以及教皇保罗二世进行游说，并取得了成功。1999年，八国集团（G8）（G7加上俄罗斯）承诺在2000年年底前免除发展中国家1000亿美元的债务。波诺对萨克斯充满钦佩之情地写道：“当他付诸行动时，他更像一个来自哈莱姆地区的传道士，而非来自波士顿的书呆子。”

2002年，萨克斯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20多年后离开哈佛，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在此，他发起了他个人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一个项目：千禧村项目。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萨克斯希望帮助非洲农村地区在2015年前实现全球改善人类发展状况的目标——千年发展目标。该项目为非洲10个国家共15个乡村提供大规模援助，帮助他们对抗贫困和疾病。这些乡村收到的援助包括高产粮食种子、肥料、饮用水井、建立学校和诊所的建材、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和抗逆转录药品等。

项目的初期回报已经显现。千禧村的大部分人类发展指标已得到改善。也许，没有萨克斯发起的项目的支持，这些指标也可能得到改善。因此，人们对该项目是否发挥了决定性影响（通过对项目村与非项目村的成果进行对比）的说法仍有很大的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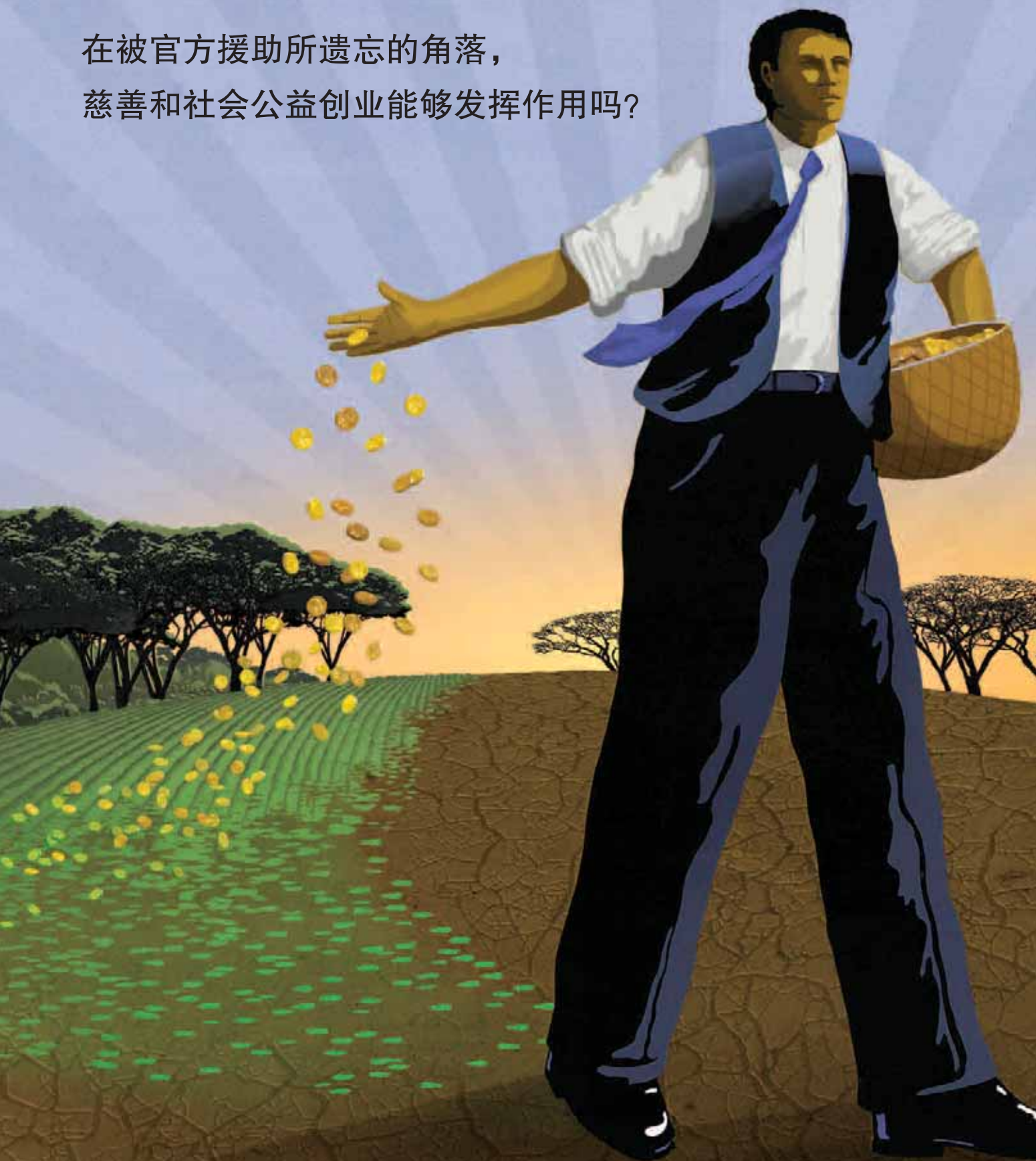
回归美国？

1972年，还是高中生的萨克斯在去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途中，给他的女友邮寄了一张白宫明信片，并在背面写下“终于到家了”。在经过30年关注于世界各地的各种问题之后，萨克斯重新将目光转向美国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他最新出版了一本名为《文明的代价：重新唤醒美国人的美德和繁荣》（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的书。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萨克斯“就如同一位环球旅行家，回到故乡才发现他的国家比当初记忆之中的国度还要糟糕得多。”萨克斯所悲叹的美国问题有：缺乏就业岗位、基础设施日渐老化、教育水平不断下降、不公平现象不断增多、医疗卫生成本大幅攀升及各大企业露骨的欺诈行为。

尽管有以上一大堆的抱怨，萨克斯对美国的发展仍一直持乐观态度。“如果波兰能够成功地从前中央计划体制过渡到资本主义，”他说：“毫无疑问，美国也能成功地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一种更好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普莱凯希·拉格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顾问。

在被官方援助所遗忘的角落，
慈善和社会公益创业能够发挥作用吗？



慈善义举

马莉娜·普里莫拉茨

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创业由来已久。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范德比尔特家族曾帮助美国建立了其文化基础设施。玛丽亚·蒙台梭利、约翰·缪尔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被公认为教育、自然保护和公共卫生领域早期的社会公益创业者。

现在，慈善事业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多国家的政府考虑退出慈善行动的同时，富人们在捐赠方面更有创造性和战略性，并且——如果比尔·盖茨用他的方式的话——更加慷慨大方和积极主动。

2010年6月，沃伦·巴菲特以及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发起了一项名为“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的行动：全世界部分亿万富翁公开承诺将自己的过半财富捐献出来，以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捐赠。迄今为止，已有81位亿万富翁签署了“捐赠承诺”，其中仅巴菲特一人就承诺捐献370亿美元。

现在，慈善家们鼓励其他同等地位的人开展同样乃至更多的捐赠。捐献财产和解决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转交巨额遗产或者死后捐款那么简单。

包括斯坦福大学、乔治敦大学、杜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美国大学已设立了有关慈善的课程，甚至建立了慈善研究中心。其中一个方法是研究如何加大慈善力度，为项目获得更多的资金。另外一个方法是研究如何衡量慈善的效果（即影响），以便从捐献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不过，目前的研究工作仍存在不足：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私人捐赠的数据仍然有限，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私人捐赠正变得愈发重要。例如，香港实业家和亿万富翁李嘉诚捐赠的金额已超过15亿美元，并已承诺将他财富的1/3——估计约90亿美元——捐献给慈善事业。

一个人捐献多少钱是一回事，它可产生多大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因此，慈善家和学术界都很关注捐赠可以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衡量这种影响的最佳方式。

盖茨认为，由于投资者（承担风险者）仅收到投资回报的很小部分，因此私营部门对创新的投资不足。国家往往会出面满足那些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不过盖茨认为，各国政府（至少那些民选政府）不会采取长远观点，不愿承担风险。

这正是慈善家可以弥补空缺的领域，也就是盖茨

所称的“催化式慈善”。政府擅长于发现少数的成功者，而慈善事业则擅长于支持大量的潜在成功者，从而增加个人为某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找到最新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现在，慈善事业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各个企业在为社会作出贡献（或者至少表面上如此）方面受到的压力日渐增大。反对者认为，企业界只做那些有利于其利润的必要事情。各大公司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大肆吹嘘他们生产的产品在环境、教育、卫生和文化领域的好处。当制药公司以更低的成本在贫穷国家提供治疗艾滋病或肺结核等疾病的救生药品，或者将相关专利开放供通用生产企业使用时，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改善患者和贫困人口的命运，还是迫于法律和政治压力？

以全球超级富翁为服务对象和介绍其情况的《福布斯》杂志在今年6月份举办了一次慈善峰会，邀请161位亿万富翁听取了巴菲特、史蒂文·凯斯、盖茨以及奥普拉·温弗瑞等主旨演讲人就如何改变世界发表的演讲。目前，世界经济论坛举办了一场有关社会公益创业的研讨会。按照格雷格·迪斯的定义，社会公益创业是指“寻求针对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

目前，美国纽约市正在开展一项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融资试验——融资不仅将用于衡量其实施成果，实际上也将取决于其实施成果。高盛集团已投资一项“社会效益债券”，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提供资金，设计和实施一个旨在使纽约的重新犯罪减少一定目标数量的项目。如果项目实现了该目标，高盛即可收回其投资；如果项目超过了该目标，该投资公司就将盈利。得益于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提供的补助金，先期的96亿美元投资的亏损限制在总金额的1/4以内，也再度证实了慈善风险承担者的重要性。

在本期的《金融与发展》，我们分析了慈善、私人投资和社会公益创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们正如何寻找解决社会各种最迫切问题的更好途径。■

马莉娜·普里莫拉茨（Marina Primorac）是《金融与发展》的责任编辑。



迪恩·卡兰

殊途同归

慈善和私人投资在全球应对贫困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用于全球减贫的资金一度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支持。不过，这一情况正在发生转变。目前，来自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基金会，以及来自格莱明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等社会企业的慈善捐助，加之流向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多的投资基金，在应对贫困方面的工作中正受到更高的关注。

目前，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不过，它们仍需要来自私人捐赠者的援助和资金，以便帮助它们矫正市场失灵状况，推动为贫困人口寻求解决方案（见专栏）。

捐赠的发展趋势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资金不断增长。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对外援助（也称之为官方发展援助）、私人投资和慈善捐款的总体绝对水平出现了增长（见图 1）。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双边和多边对外援助总额占全球 GDP 的比重却出现了下降。

与全球援助的发展趋势一致的是，过去 50 年间，来自美国的对外援助额占其 GDP 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就名义金额而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捐助国（但其援助额占 GDP 的比重并非最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980—2000 年期间其援助额降低所致，但 2000—2010 年期间援助额占 GDP 的比重实际上出现了增长。

目前，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额占其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约为 0.2%；而北欧诸国（包括丹麦、挪威和瑞典）的这一比重接近 1%（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的数据）。从绝对金额来看，2011 年美国的对外

援助额为 310 亿美元，而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的总人口仅为美国总人口的 2/3）的累计对外援助额达到 580 亿美元。按人均金额计算，2011 年美国人均对外官方援助金额为 99 美元，而上述欧洲三国的人均援助金额则达到 280 美元。

部分援助是直接预算支持，另外一些援助则采取某种特殊的形式，如技术援助（如日本提供的援助）或者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如中国提供的援助）等。所有这些援助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发展中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往往服务于捐助国本身的利益。

民意的转变

美国人对对外援助的看法似乎自相矛盾。根据 2010 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很多美国人大大高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外援助额，他们认为每年美国对外

援助“图谱”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用于扶贫的资金既有赠款也有私营部门的投资。

赠款是指 100% 发放给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为提供某项服务或转移支付的津贴。位于援助“图谱”的中部是那些旨在产生社会回报，而不仅仅是私人回报的投资——以向政府提供的贷款，或者向私营企业提供的股权或贷款的形式进行投资。这些社会效益可以通过积极的外部效应，如降低碳足迹或者减少传染病的传播程度来得以实现。

援助“图谱”的另一端是那些只产生私人回报的私人投资，受益对象为投资者、企业和企业客户。位于援助“图谱”以外的是那些导致负面外部效应，社会回报低于私人回报的投资。

援助额占联邦总支出的平均比例达到25%。而实际数据不足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美国人希望将对外援助预算额占联邦总支出的比例“降低”至10%，而这一比例实际上是美国真正对外援助比例的10倍（WorldPublicOpinion.org，2010年）。

不过，人们对对外援助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40年间，希望减少对外援助额的人口比重持续降低，从1974年的79%降至2010年的60%，而那些认为对外援助水平适宜或者过低的人口比重则相应增长（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不过，尽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错误地认为美国对外援助水平偏高，但总体更可能认为该比例仍然相对较高。与此同时，他们更希望将其善款捐往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人的国际捐助额占美国GDP的比重开始稳步上涨（见图2）。

美国人认为，非政府援助与政府援助相比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发展（KFF，2012年）；美国私人慈善活动的增长，可能主要源于这一认识。这一看法的准确性仍有待商榷，不过，与预算支持等可靠但很古板的传统援助方式相比，由非政府组织引领的全新援助方法（如小额信贷等）显然正吸引了媒体更多的关注。

事实上，小额信贷是上述现象的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作为接受私人善款和私人投资的一种形式，小额信贷经过大张旗鼓的宣扬（包括2006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格莱明银行和穆罕默德·尤纳斯）已经声名鹊起。像基瓦组织（Kiva）一样，Web 2.0服务通过推动与援助接受者的个人联系，将小额信贷这种已经很受大众欢迎的方式推向更多的人群。Kiva使捐助者可以了解个人客户的故事，并跟踪其还款情况，同时，它将捐助者的故事及其捐赠记录放在网站上，为捐助者赢得社会认可。对于“脸谱”（Facebook）一代而言，这种方式与“资助儿童”计划类似。另外一些新的捐助方法，如直接给予组织（GiveDirectly），进一步发展了与被捐助者直接联系的理念，使个人捐赠在没有中介机构的情况下直接到达受益人手中。

对可持续性的思考

当今慈善家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涉及“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这一很有诱惑力但又界定不明确的术语。在市场或政府无法或者不愿为弱势群体提供捐助的情况下，慈善捐助往往在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非营利组织对捐助的依赖性，使其很容易受到资金状况波动的影响，从而可能危及它们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换句话说，它们在资金上不具有可持续性。鉴于非营利途径所存在的不足，部分潜在的慈善捐助者已从“慈善图谱”中基于捐赠的末端转向中端——

社会回报高于私营回报的投资，甚至“慈善图谱”之外的只有个人效益、没有社会效益的投资。

营利性企业与非营利机构相比的主要优势是，营利性企业的收入直接与其产品和服务相关，如果它们提供的产品滞销在其公司财务上将会得到反映，当其产品销路良好时可确保公司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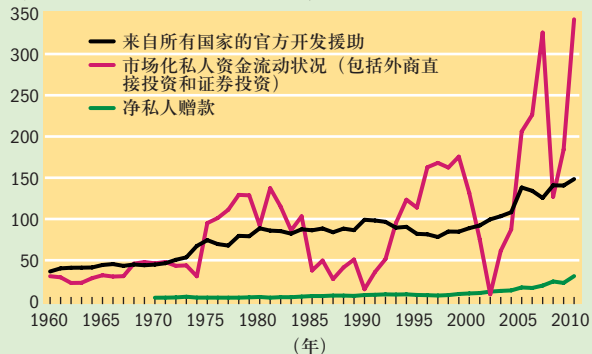
对于那些关注财务可持续发展的捐助者来说，投资发展中国家将为其提供良好的契机，可以更好地将其收入与受益人的产出保持一致，并在这一过程中创建出在财务上更具可持续性的组织机构，这是因为来自受益人的需求可以使那些成功的计划始终正常运转。很多主要的开发行业从基于捐助的模式转向以市场费率向低收入客户提供服务的模式，小额信贷就是首批此类行业之一。

实际上，要计算出如何将放债人的市场利率降至接近商业银行向富裕人士提供的贷款利率，则需要一些创造力。人们批评营利性小额信贷银行对营收的重

图1
不断攀升

过去50年间，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投资和赠款总额持续增长。

（10亿美元，以2010年定值美元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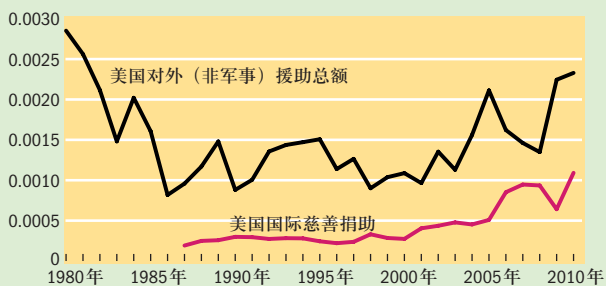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图2
另一种方式的捐赠

1980年以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比重不断减少，但私人慈善捐助比重持续稳步增长。

（占美国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外援助）；美国施惠基金会（慈善捐助）。

视程度超过对减贫的重视程度，不过银行提供给客户的产品实际上基本相同。同时，迄今为止所开展的为数不多的随机试点项目表明，与非营利模式相比，小额信贷银行在减贫方面的影响力更大。目前严格开展的试点项目还很少，但举证责任方正在发生转变，非营利模式的支持者必须提供证据表明非营利模式如何比盈利模式更为有效。

当然，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投资水平。由于捐助者对传统援助在使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持久改变方面的能力不再抱有幻想，他们或许将注意力转向财务可持续性。尽管捐助者幻想破灭所带来的影响难以评估，与其他因素相比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较小，但仍可能确实存在。其他对投资流向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技术创新、贸易壁垒、国际税收政策、美国货币政策以及接受投资国的政策环境等。

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投资抱有热望，但一个基本的难题始终存在：很多投资方式实际需要也应该获得补贴，才能弥补市场失灵的状况。同时，某种程度的收入再分配在社会的积极发展（贫困人口福利的改善有助于整个社会更好地运转）和道德规范（道德标准要求为那些相对不幸的人群提供某种程度的利他性和慈善行为）方面具有很好的政策意义。我们不可能依靠投资者解决全社会面临的所有问题。

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社会从援助和慈善转向投资的结构转变，并且掌握针对具体问题的适宜解决工具，要求我们首先认真分析市场及其发挥作用或失效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当市场失灵状况确实存在时，创新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可能需要借助技术（如手机）、质量更好的蚊帐（以防止携带病原体的蚊子）或药品等。有时，可能涉及商业流程，如小额信贷等。当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可以使某个问题得到解决时，市场力量就将吸引投资进入。

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可以越来越多地得到解决，这一看法使得很多人将注意力转向投资。例如，小额信贷最初只是一个非营利的理念，经过快速的发展后，现已成为一个由那些寻求牟利机会的营利性投资者所主导的方式。这与支持基本增长理论相似，基本增长理论认为，由于低收入国家的预期边际资本收益率更高，可能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因此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应该超过高收入国家。

投资额不断攀升

过去 50 年间，发展中国的投资额变化不定，但总体呈上涨趋势。

在二战后的全球繁荣时期，发展中国的投资额

大幅攀升，20 世纪 80 年代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动荡期间，其投资额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跌，从 20 世纪 90 年代迄今为止则不断回升（除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遇袭之后，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短暂的下跌外）。

发展中经济体政策和经济环境的两个转变，即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提供更好的信息（直接来自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其投资额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效的市場要求提供完美的信息和零交易成本。整个市场不可能按照这种方式运行，但这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也可以作为找出问题所在的一种方式。

首先，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信息”具有特定的含义。除了提供单纯的数据外，信息还意味着完成交易、相信合同能够得到履行、确保各方对交易中的风险和效益拥有对称信息的能力。按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以及更近的戴龙·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机制的改善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

当市场失灵状况确实存在时，创新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信息的改善可以建立和改进实际市场的状况。例如，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有关印度喀拉拉邦的信息与市场相互关系的重大研究发现，手机发射塔的引入，使当地渔民在选择停泊的港口前，可以给岸上的渔民打电话或者给他们发送短信，询问水产品的市场价格。这种信息的获取，导致不同渔村之间的价差大幅减小，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促进了交易量的增长和并减少了鱼产品在交易方面的浪费（Jensen, 2007 年）。

过去 50 年间，交易成本显著下降。“冷战”后，由于国有经济管理方式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非常明显，很多发展中经济体采纳了市场经济政策，将其注意力转向消除针对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并努力降低交易成本。

发展中经济体发现，为促进国内投资，它们日益需要在公开市场为国际资金相互竞争，激发了新一轮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针对已过时税收法规的改革。道路状况的改善、资本市场限制的减少、贸易壁垒的降低、通信速度更快和性能更加可靠以及互联网的出现，都有助于降低经商的日常成本，从而使得开办企业的成本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经商环境指数”数据显示，自 2005 年开始收集该数据以来，低收入国家为开办企业或登记财产所需要的天数持续减少。随着机制的改善，投资也随之流入。

产生社会影响力

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存在何种影响？某种特定类型的投资在“慈善图谱”中处于哪个位置？投资是否确实非常重要？

“社会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是很多人所使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产生重大社会效益的投资。在这些国家中，获得“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居民比那些获得单纯性投资的居民生活更为富足。不过，所有的投资只要没有负面后果——“负面外部效应”（并且假定不存在那些导致人们不愿拥有的上瘾——如吸毒成瘾或者酗酒的非理性行为），就应该让人们的生活状况较此前得到改善。社会影响力投资表明存在因果关系，但投资者或企业很少开展过缜密的研究，来令人信服地证实某个计划或投资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通过其他方式所不可能实现的转变。

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是有利的。具有负面外部效应（如污染）的投资可能导致人们事实上比以往的处境更加糟糕。在某些情形下，一项投资可能仅仅是使财富从一个地方转向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某家公司提供的是社区现在已经可以购买到的产品，而只是这家公司的广告更有诱惑力，投资这家公司将无助于改善贫困人口的命运，相反只是使利润从另一家公司转向这家公司。不过总体而言，任何一个有助于增强竞争和效率，不至于造成负面外部效应的投资都可能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如果社会影响力投资要成为不仅仅停留在营销口号上的事情，就必须超越普通的有利可图的市场交易行为。

但问题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收益是否能惠及第三方？换句话说，其社会回报是否超过私人回报？例如，一家公司可能开发出清洁烹调用炉技术，这种烹调用炉所使用的薪柴比传统的火炉相对更少。使用这种新型烹调用炉的消费者可以节省采集薪柴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其他家庭成员可以享受到质量更好的室内空气，整个社区也能从二氧化碳减排中受益。不过，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实际证据并不支持烹调用炉的这一理想局面。

同样，生产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不仅仅可以保护消费者免受疟疾的困扰，还有助于降低该疾病在临近街区的流行程度。与传统的投资者相比，那些选择在经济效益和积极外部效应两方面均具有潜力的项目的投资者将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当然，投资将会产生积极外部效应的看法并不免除企业在商业伦理方面的责任，也并不排斥评估其实际效益的切实需求，正如慈善机构也必须分析其计划的实际效果一样。

社会影响力投资者可以将利润作为其投资生产的蚊帐或烹调用炉在市场上畅销的表征，不过销售状况和参与率本身并不能证明该项投资是否使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毕竟，发展中国家销售的部分最有利可图的产品是烟酒类产品（或者当地替代产品，如阿拉伯茶 khat），这些产品几乎没有有什么广泛的社会效益。

小额信贷是这方面一个恰当的例子。过去数十年间，小额信贷的从业者大肆宣称小额信贷在减贫方面的作用，但他们是基于假设而非实证得出结论的，并且仅仅依靠计算参加者的数量来量化其所谓的成功。不过媒体中报道的故事则对接受小额信贷者的过度负债状况提出警告，人们开始担心小额信贷实际上正在损害参与者的利益。令事情更为复杂的是，这些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同样缺乏具体分析和数据。最近开展的六个随机对比测试结果表明，尽管获得小额信贷具有部分积极影响，但它并未真正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慈善投资者的初衷是希望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认为投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不过，开展良好的成本效益分析，需要很高的费用，如果这种分析无助于提高盈利性投资者的利润，要期待他们为之买单确实不大现实。那么，谁应该为之买单呢？应该是那些希望评估投资项目的社会回报是否超过私人回报的慈善家。这些慈善家本身也可以是投资者。并非所有的投资（或者此方面的援助项目）都应该得到严格的评估——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件并不合情合理的事情。不过，我们确实需要拥有比现在更多的证据来进行论证。

资金将继续通过对外援助、私人慈善和投资活动进行流动。每种方式均具有自身独特的目标、优势和劣势。不过，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着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利用时间和精力将那些真正好的东西与那些仅仅表面动听的东西区分开来，是既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未来，也有利于我们子孙后代的事情。■

迪恩·卡兰（Dean Karlan）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扶贫创新行动（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组织主席兼创始人。

参考文献：

-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0 (May). www3.norc.org/GSS+Website
- Jensen, Robert, 2007, "The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 in the South Indian Fisheries Sect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2, No. 3, pp. 879-924.
-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KFF), 2012, "2012 Survey of Americans on the U.S. Role in Global Health." www.kff.org/kaiserpolls/8304.cfm.
- WorldPublicOpinion.org, 2010, "American Public Vastly Overestimates Amount of U.S. Foreign Aid." 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articles/brunitedstatescanadara/670.php?lb=btada&pnt=670&nid=6

学习型社会实验室



社会公益创业提供创新、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J. 格雷戈里·迪斯

在印度勒克瑙，孩子们靠煤油灯照明学习。

在被诊断出携带 HIV 病毒后，一位南非孕妇曾一度惶恐、茫然，在经人介绍认识了非盈利组织“母亲互助团”的一位“母亲导师”后，方才安心。这位同样患有艾滋病的“导师”给出的有益建议，提高了孕妇的存活几率，同时也降低了母婴传播的风险。

在不得不面对贫困、待业时，一位年轻的柬埔寨妇女觅得良机，开始学习数字型数据转换，凭此在一家名为“数字鸿沟数据 (DDD)”的社会公益企业找到工作，并拿到了高等教育的奖学金。

在印度，一位父亲则在市场上发现一个货摊，正销售由盈利组织“d.light”生产的太阳能提灯。他家中没有电，他用这种提灯替代之前使用的煤油灯，不仅节省了煤油，还能让孩子们挑灯夜读时有更好的照明。

虽仅是冰山一角，上述三个事例的确生动诠释了：社会公益创业正如何致力于解决艾滋病、青年就业、电力短缺等发展问题。这些企业拥有近乎无限宽广的舞台，涉及小额信贷、可持续林业、水质净化、环境卫生、农业增产、女性就业、教育、医疗（从药物/技术发展到物流、产品销售和医疗服务）等众多领域。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做得不错；而有时则不然。成功与否通常取决于诚信度，以及与政府机构、重要基金会、

多边发展机构、大型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关系。如能抛开各种炒作和煽情因素，吸取业内教训并制定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它们将有望获得非常可观的回报。

社会公益创业能将私人资源、独创性、创业决心和业务技能融合起来，并在某些情况下为解决阻碍社会发展的的问题提供了符合当地实际的思路。这些企业对新方法加以创新、检验、改造，其成败则成为宝贵的正反面经验。而得益于这些努力，一个探索发展创新的学习型社会实验室已初具规模——方兴未艾，却又亟待利用。然而，在引起政府和发展机构重视这一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基于严苛的发展评估，我们可以对各种尝试的有效性、发展潜力加以甄别，并从那些原本看似不错、但最终却无法获得高成本效益的想法中吸取教训。（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殊途同归”）

被误读的概念

许多人把社会公益创业与“社会型企业”这一更狭义的概念混为一谈，后者是指那些在盈利的同时也

会创造社会福利的企业。强有力的社会创新加上高度盈利性的企业模式，或许是很多社会公益创业的“制胜法宝”，却非这类企业的本质特征——且看“社会公益创业”的主要倡导者如何定义这一概念（见专栏）。社会公益创业的本质特征是追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其模式从依赖馈赠的非盈利模型到具有商业可行性的盈利模式，不一而足。

无论采用何种模式，社会公益创业都会创新性地利用商业手段，以降低成本、扩大规模并实现可持续经营。它们的经营模式通常会别出心裁，以获得更好的社会投资回报。获利虽非强求，但面对成本结构、收入流和资金要求等老问题，企业经营者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寻找变世之道，经济性必须先行。

上文中三个事例展示了一系列（可行的）企业模式。

“母亲互助团”（mothers2mothers, m2m）是南非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雇用感染艾滋病的母亲为那些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孕妇提供指导，以降低艾滋病母婴传播的风险。这项尝试证明，在安排了“母亲导师”的医疗机构，已有越来越多的孕妇开始并继续接受产前护理，因此越来越少的婴儿感染艾滋病。如不采取上述措施，母婴传播的几率将高达20%—45%（根据2008年的统计，约39万婴儿因此感染艾滋病毒）；近一半的婴儿不会活过两周岁。如采取上述措施，母婴传播几率在非母乳喂养人群中仅为1%—2%左右，在普遍采用母乳喂养的人群中也会小于5%。

“母亲互助团”成立于2001年，目前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7个国家的600多个地区推行上述模式。2011年，该组织雇用的近1500名“母亲导师”为24万余名孕妇提供了指导和鼓励。比起护士或专业医疗服务人员，这些“导师”的服务更见效、更经济。

“母亲互助团”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救助机构、外国

政府拨款、企业捐款和类似途径，其运行模式为医疗系统节省了治疗艾滋病毒新生儿的巨大开销。而这种运行模式已发生改变：除直接提供服务外，“母亲互助团”正建议各国政府将“母亲导师”项目纳入国家医疗体系。2010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帮助下，新模式在肯尼亚开始实行。2011年，“母亲导师”得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认同。

数字鸿沟数据（Digital Divide Data, DDD）是一家社会公益企业，旨在为众多消费者提供数据输入、转换、数字保存等服务。该公司2001年成立于柬埔寨，2003年进入老挝，2011年进入肯尼亚，在上述三国培训、雇用了一些出身贫寒的青年，并资助他们继续深造，以培养职业技能、增强求职竞争力，从而摆脱贫困。在过去11年中，超过2500名青年曾接受公司培训，其中约900人现任职于公司的3个分支机构。在发展问题缠身的上述各国，这些数据显得有些单薄，但在蓬勃发展的“正面效益型外包”领域（通过雇用贫困、弱势人员造福社会的业务流程外包），DDD已被视作先驱与榜样。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美国埃文森咨询公司近期出台了一份报告；据其估计，“正面效益型外包”领域从业人数现已超过56万，而到2020年或将增至290万。

我们很难预测这些就业机会的长期效益，但DDD最近的一份效益评估显示，其培训对象的薪资水平是高中毕业生的5倍之多。虽然业务红火、2011年收入即超过240万美元，DDD在法律意义上仍是非盈利机构——其拓展培训和奖学金项目另须募集200万美元。该模式在被划为“正面效益型外包提供者”的组织中并不典型，因为这类组织的雇员是贫困者或在其他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相同成效或鲜见于那些未提供同等培训或奖学金的组织，但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比较、评估。

d.light设计公司创建于2007年，是一家盈利性的社会公益企业，旨在向尚未用上电灯的贫困人群提供实惠的照明。该公司所生产的商品是价格低廉的太阳能提灯，包括学习用提灯、大功率家用提灯等——后者甚至可以为手机充电。公司产品销往45个国家，短短几年时间就使1000万人受益；这一数字在2015年计划增至5000万。作为煤油灯的替代品，d.light产品不仅提供了更可靠的照明，还为家庭节约了成本，避免了由火灾事故导致的伤亡，并减少了由室内污染所导致的就医花销。据d.light公司估算，其产品的广泛应用已使超过220万学龄儿童受益，减少了相当于27.6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为消费者节约了超过1亿美元的能源开支；这些数据虽尚未得到独立评估机构的认证（IMF的阿南德等人撰写的一份即将发表的调查报告表明，d.light和其他一些企业可能高估了家庭

什么是社会公益创业？

一些重要组织对此有多种定义。

阿育王基金会：服务于大众的创新者——“社会公益创业家是这样一类个人，他们用创新性的方案去解决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它们满怀壮志、坚持不懈，致力于应对主要的社会问题，为社会大变革提供新思路。”参见 www.ashoka.org/social_entrepreneur。

斯科尔基金会：“社会公益创业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社会创新的主体，这种创新会改变现状、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参见 www.skollfoundation.org/about。

施瓦布社会公益创业基金会（隶属于世界经济论坛）：“社会公益创业在很多领域推动社会创新与转型，这些领域包括教育、卫生、环境和企业发展等。凭借创业热情、运营手段以及开展创新、打破传统的勇气，它们致力于实现各种减贫目标。”参见 www.schwabfound.org/sf/SocialEntrepreneurs/Whatisasocialentrepreneur/index.htm。

的煤油开销，特别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政府对煤油投入巨额补贴)。由于 d.light 是一家私营企业，其财务信息也具有隐私性，但其希望赚取一定利润，并且承诺留出在美国、加拿大净销售收入的 10%，通过与一流的非盈利组织合作，为贫困社区提供照明设备。

为将太阳能和其他形式的分散式电源带到发展中国家缺电的农村地区，人们做了很多尝试，而 d.light 产品只是其中一种。这些基于市场的介入必须通过市场的检验才能实施。如果这些产品无助于节省开支或提高生活质量，人们便不会购买。产品的市场表现说明了其对消费者的价值所在，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产品必须与其他解决方案进行评估比较。例如，广泛应用 d.light 产品或其他设备（例如，能覆盖全屋的太阳能电池板或乡村微电网工程）或可减少或最终消除对政府煤油补贴——这是印度政府的一项主要开支——的依赖。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基于市场的尝试仍有待仔细考量。

上述三种尝试都还在进行中；从内、外两方面因素来看，它们必将因时间而改变，并激发更多的创新。这些事例被用以展现仍在进行、而非大功告成的各种尝试。大获成功的例子包括亚拉文眼科关爱中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眼科服务中心，其每年能为近 35 万病人进行外科手术，而其中至少一半是穷人；孟加拉乡村进步委员会（BRAC）也是一例——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其业务触及孟加拉国和另外十个国家超过 1 亿人的生活，主要包括兴办创新型学校、实施卫生推广项目、开办雇用穷人的企业等。亚拉文中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那些可以承担治疗费的病人，而孟加拉乡村进步委员会则通过其企业收入来支付主要的日常开支。一些尝试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我们若想从这个学习型实验室获益更多，就需要做更系统化的工作。

全球实践

“社会公益创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但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调查显示，其已在全球范围内付诸实践。2009 年，作为其年度企业调查的一部分，GEM 网络在 49 个国家做了一项关于社会公益创业的调查。在此次调查中，GEM 采用了“社会公益创业”的一个宽泛定义，即“为了某个社会目标而参与企业行为的个人或组织”（Terjesen 等，2012 年，第 8 页）。通过某种形式参与处于各种发展阶段的社会公益创业的活动的 18—65 岁成年人约占成年人总数的 2.8%——比例很可观，即每 40 人中至少有 1 人参与了这类行为；具体而言，马来西亚为 0.2%，阿根廷则为 7.6%（见图）。各国之间的比例差异很有调查价值，但相关数据足以说明社会公

益创业活动已遍地开花。

广泛获益

从发展角度看，社会公益创业带给我们的潜在收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检验各种创新性尝试：社会公益创业为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系列尝试，而经过严格检验，我们可以确定那些有效、可行的办法。这些尝试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设想大胆，且能为各种想法提供试验素材，以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长期、棘手问题；若换做较大的组织，这些想法或被扼杀，或难以涌现。通过对各种想法的小规模检验，并在扩大规模前提供足够的调整空间，社会公益创业一直将成本、风险控制较低水平。企业往往将独立创业视作试验场，并时常在业内初创企业中寻找创新元素。即使像谷歌这样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企业，这类收购就开展了 200 多次，其收购对象包括安卓等——这使谷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网络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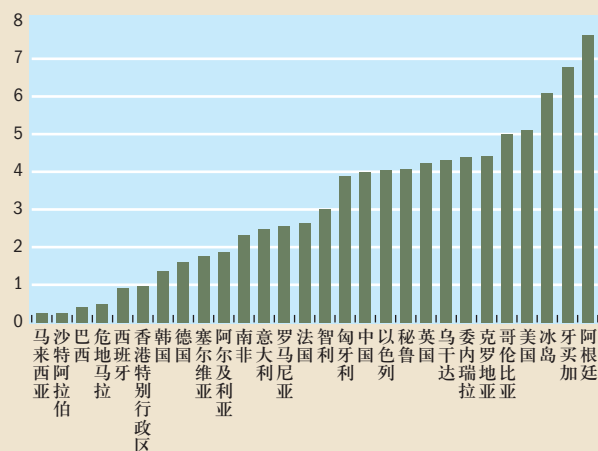
有效利用资源：在一个缺乏公共资源的时代，社会公益创业将灵活的商业思维和有形的私人资源带上台面。在很多情况下，私人资源可为部分或所有尝试，以及扩大规模提供资金。社会公益创业的企业模式创新，可降低效益性成本，并且促进公共资金与已获收益、私人慈善资金的有效整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创新与基于市场的、自身具有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的各种模式一样，有助于消除对各种政府补贴的依赖。

增强社会的适应能力：社会公益创业有助于增强社会的适应能力。发展应被视作对社会之适应能力的

参与其中

不论发达或发展中经济体，人们对社会公益创业行为的参与方式可谓千差万别。

（18—65 岁成年人参与社会公益创业活动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Terjesen 等（2012 年）。

打造。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即认为，得益于“可帮助社会将其所付努力最大化、从而摸索出替代性问题解决之道的分散化决策过程”，“适应性效率”得以加强（North, 1990年，第81页）。通过设计、检验各种替代性解决方案，社会公益创业成为分散式的问题解决者。

打造更好的社会实验室

正如诺斯所言，适应能力“与获取知识、进行学习、开展创新、承担风险、从事各类创新，并逐步解决各种问题和瓶颈的社会意愿相关。”“实验室”中的各种试验应多多益善，但前提是这些试验作为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社会公益创业为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系列尝试。

习惯解决分散式问题的人难以承担这项工作。如无适当支持和规范，分散式的问题解决方式将变得零散、重复和趋于边缘化——例如，屈指可数的偶然性成功、一次次得不偿失的失望与失败、效果难判的各种无谓付出。幸运的是，很多“试验者”正致力于加强这个实验室。

斯科尔基金会、施瓦布基金会、阿育王基金会、回声绿色组织、纽约商机基金会和奥米迪亚网络公司等机构都对有前途的创新者给予认可和支持。总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HUB公司，正在研发一种孵化器网络，以服务世界各个城市的社会创新者；目前已有五大洲的25座城市采用了该网络，未来还会有更多城市加入这一行列。“扶贫创新行动”（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IPA）和“贾米尔扶贫行动实验室”在多项创新中采取了严格的评估措施。IPA启动了“证实效益基金”，为产生积极结果的举措提供支持。亚洲效益投资交易所正在打造社会公益创业股票市场。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正试验新型的法律实体——例如社区社会公益创业或公益公司，即是对公益目标和企业结构的融合。而对“社会效益债券”等创新型金融工具而言，只有其满足特定的功能标准时，才会被政府偿付。哥伦比亚和美国已经成立国家机构来管理社会创新，世界许多大学也在该领域启动了研究和教育项目。但总体而言，上述举措都处于试验和初级阶段。

那么，在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上，各类主体——无论公共或私人、单边或多边——如何将“实验室”的打造与其自身业务加以整合？

与社会公益创业的三大益处相对应，相关主体可采取如下步骤：

- 推动智能型社会创新：为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便利，支持严格的评估，鼓励采用效益已经证实的各种想法。

- 支持资源节约型的方法：对资源节约型的企业模式的发展给予鼓励和切实激励，特别是那些不使用稀缺公共资源、或能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模式。

- 增强当地的适应能力：如果当地机制有助于分散式的问题解决，并使人们从中获益，我们应对这种机制进行投资，例如旨在解决紧要问题的创意比赛、资金与业绩挂钩、严格的评估考核系统、社会公益创业孵化器等等。

许多机构正迈出第一步，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母亲互助团”在肯尼亚的合作。

基金会、效益投资者和其他一些组织、个人在利用混合或盈利型社会公益创业模式，营造基于市场、节约政府成本的业内环境时，即可采取上文提到的第二步——支持资源节约型方法。洛克菲勒基金会与DDD等效益型外包机构的合作就是这种支持形式的一个典型实例。

第三步则要求帮助当地机构（如政府、慈善家、投资者和大学等）建立一套基础设施，用以激励、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公益创业。这意味着要召集业内领军人物，就新型法律实体、新型融资机制、国家层面的社会创新管理机构等话题分享经验；甚至激励大学参与研发具有高度可购性的设计，例如斯坦福大学对d.light产品技术的研发。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旨在解决问题的学习型实验室，社会公益创业是塑造社会适应能力的关键。但只有国家决策者认可其价值，并且帮助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提供规范和支持的机构或文化，它们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J. 格雷戈里·迪斯（J. Gregory Dees）是研究社会公益创业的教授、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社会公益创业促进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他目前也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

参考文献：

Anand, Rahul, Adil Mohammad, James P. Walsh, David Coady, and Vimal Thakoor, forthcoming, “India’s Fuel Subsidies: Incidence and Reforms,”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rjesen, Siri, Jan Lepoutre, Rachida Justo, Niels Bosma, and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ssociation (GERA), 2012,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9 Report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合作的力量

各种创新型合作网络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比尔·克林顿总统

在这个星球上，智慧、勤奋和能力被大家均等占有，但投资和机遇则不然。要实现我们对 21 世纪的各种期望，就得另辟蹊径、创造更多机会，使每个国家的每个人在有利于成长的机制、基础设施和网络帮助下公平享有成功的机会。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我们就会对每一天充满期待，并对各种可能性理解得更加深刻。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同时促使国际援助事业实现由慈善向合作的转型。

如今，人们的相互依存程度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作为世界公民，我们的价值取决于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实现和提升自我。

所幸我们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做些事情，为他人创造机遇。开明的政府决策，例如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政府为那些送孩子上学的家庭支付学费并逐年予以监督，则充分证明：

国家可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的不均。企业则逐渐意识到强有力的社会和市场有助于提升销售量，并在其经营模式中不断融入公益元素。近年来，全球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科技进步则使更多人得以通过短信或互联网进行小额捐款；得益于此，慈善捐助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化，从事该事业的非政府组织也在经历着相应转型。

在业已建立起创新型合作网络的领域，我们的进步最为明显。来自政界、商界和社会各界的利益相关者齐聚一堂、共谋盛业。与孤军奋战相比，这种方式更有效、更快捷也更经济。“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CGI）会议机制于 2005 年应运而生，每年 9 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后都在纽约开会。我们每年都邀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商界领袖、慈善家、社会名流等出席会议，就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共商解决之道。

在交流真知灼见的过程中，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建立了合作关系，就解决当今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出创

新性的解决办法。例如在过去两年中，可口可乐公司将其供应链管理经验分享给全球基金，用以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疾病。这两家机构还一起找到了

更有效的途径，将重要药物和医疗服务提供给急需的患者。在今年 9 月的会议上，它们宣布将扩大该项目所惠及的范围。此外，GAP 公司也正与一批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名为“个人发展与职业提升”的项目，以期通过技术培训提高服装女工的从业素质。该项目首先在印度实施并取得了成功，目前已扩展至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

在过去 8 年的会议中，CGI 理事就诸多领域的问题做出了 2300 余项承诺，包括减少贫困、创造教育机会、化解冲突、推进环保前沿技术等。这些承诺使 180 多个国家的 4 亿多人受益，而相关资金一旦全部到位，总额

将超过 731 亿美元。我们正继续展示出精诚合作的巨大力量，并探讨如下问题：如何将美好的想法转变为实际行动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这些年来，我发现非政府组织可在创新型合作网络内发挥独特的作用，从而回答上述问题。这些组织通常以为人们创造长期利益来衡量自身价值，这使得它们勇于冒险和尝试。它们能够与来自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将解决方案付诸实施。非政府组织的最佳运营之道是在项目伊始就做出最周全的考虑，确立可以一贯到底的行动目标：帮助人们在不依赖外部捐助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目标。

在卸任公职后不久，我便亲身体会到上述“如何做”问题的分量。我从政 30 年的经历，无非是与人探讨两个问题：你打算做什么？你打算在这件事上花多少钱？当 2002 年人们就艾滋病危机求助于我的基金会时，我迅速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灵活性。

那时，在发展中国家只有 23 万艾滋病毒携带者和



本文作者比尔·克林顿曾任美国第 42 任总统，是威廉·J. 克林顿基金会的创始人。

患者接受了治疗，因为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价格太过昂贵。事实上，高价格不仅缘自生产成本——由于低收入国家支付行为的不确定性，生产商不得不预先构建一个高利润空间。当时，这是大家在业内生存的唯一办法。

在我看来，若有足够多的捐款人来确保及时支付，便能说服药品生产商将经营模式转向薄利多销。因此我们曾与一些财力充裕的政府接洽，请他们为那些向我们寻求帮助的发展中国家代购非专利药物——这些努力得到了爱尔兰和加拿大等国政府的积极回应。

艾拉·麦格齐纳则率领我们的团队与生产商们进行了多次谈判，劝说他们降低价格以赚到更多钱。我向他们保证，若言之有谬则重拟合同，确保他们不受损失。他们最终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今天，在发展中国家有800万人正接受可能挽救其生命的廉价治疗，其中超过半数直接受益于我们出面商定的合同。相对于原有经营模式，药品公司也赚取了更多利润，实现了自身利益与社会公益的有机结合。在这项事业中，大家都得到了实惠。

这一经验让我充分领略到非政府组织的巨大力量——通过与企业 and 政府合作，利用助人自助的方式对市场加以拓展、组织。我的基金会将该理念运用到非洲最穷困的农业地区——那里的人们拥有获取成功的意愿和技能，唯独缺乏有效的物质手段。

在马拉维的“安佳农场”项目中，我们与当地成千上万的小佃农合作经营一个大型农场，并以批发价格向他们出售种子和肥料。我们还向他们提供产品直销市场的途径——大多数农民都没有马车，更别说汽车了，因此他们此前通常得将年收入的一半付给中间人，仅仅为了把新收获的粮食运往市场。

项目成绩不俗。勤劳智慧的农民们获得了丰收，收入平均增长了4倍。得益于一个旨在改变生活面貌、具有可持续性的机制，他们正探索着属于自己的脱贫之路。

上述模式如能扩大规模，将极大地提升发展中农业国的人民生活质量。同时，该模式也能帮助当地政府有效利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充分获益于出口、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在不依赖他国援助的条件下，掌握自立自强之道。

我们可用类似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应对所有挑战。我的基金会与加拿大慈善家弗兰克·古斯塔在哥伦比亚合作开展了几个项目。弗兰克曾在拉美矿产开发中大获成功，并由此致力于帮助当地人民改善生活。

目前，我们正帮助当地小摊贩与大型豪华酒店建立联系，使他们也能从该国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我们还启动了该国第一个针对建筑工人的现场工作认证项目，现已为超过5000人提供了免费培训。我们也曾与拉丁天后夏奇拉的“赤脚基金会”合作，为该国4000多名学生提供营养校餐、职业培训和学业帮助。

我和弗兰克还与卡洛斯·斯利姆基金会在哥伦比亚合作建立了一个2000万美元的投资基金，帮助中小企业拓展业务。这类企业雇佣了该国约30%的劳动力，却在已有资本市场中受益甚少。我们在海地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基金，帮助当地中小企业克服业务增长中——特别是2010年大地震后面临的各种长期性障碍。上述两个投资基金在相关领域开展审慎投资，它们的服务对象与马拉维的佃农一样，仅需有针对性的帮助，便有能力冲破贫困和地理阻碍、最终取得成功。

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权利帮助他人获得成功。放眼全球，我深信这种相互依存终将战胜各种不利因素。

看到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死亡率不断下降，看到贫困地区的人们把更多女孩送到学校读书，我倍感欣慰，这样的投入将会取得巨大的回报；看到诸如“健康伙伴”、“盖茨基金会”和“斯塔基听力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拯救生命，我倍受鼓舞；看到宝洁、沃尔玛和德意志银行等大公司将自己利益与社会公益相结合、并与社会分享它们的运营经验，我倍感乐观；看到爱尔兰、挪威、英国等国家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时仍保留原有的对外援助预算，我倍受感动。

正如生物学家爱德华·O. 威尔逊在《被社会征服的地球》中所述，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是那些精诚合作者：蚂蚁、蜜蜂、白蚁和人类。我们人类享受意识与良知的福泽，并接受它们的考验。我们的确能毁灭自己，但当我们停止冲突、选择合作时，亦拥有克服逆境、抓住机遇的惊天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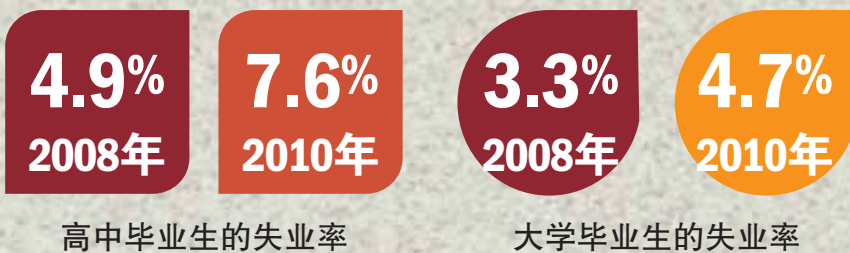
人知己所不知——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就已做出了最好的抉择。如果非政府组织、商界和政府能携起手来、创造性地开展合作，就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们有尊严地生活。而我们每个人也将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公民。■

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是那些精诚合作者。

投资于人

最近的这场经济危机凸显出良好教育的重要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找到并保住工作,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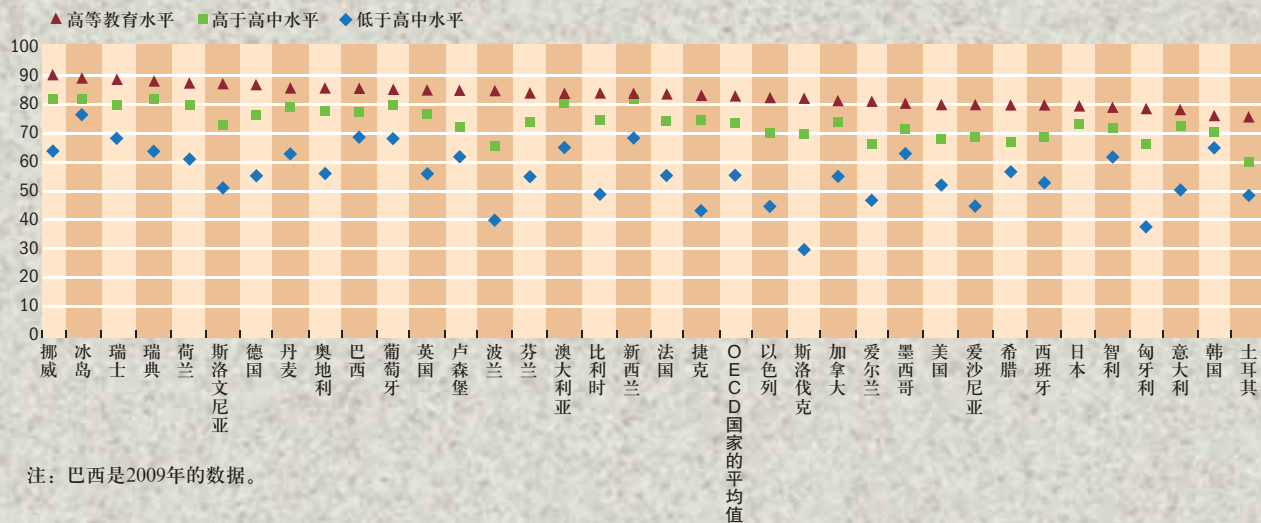
例如,OECD国家中那些仅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的失业率在2008—2010年期间从4.9%上升至7.6%;相比之下,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失业率要低得多,在同期仅从3.3%上升至4.7%。



《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指出,在青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方面,尤其是那些来自贫困家庭以及那些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各国间存在巨大差异。那些处于失业、辍学以及没有接受任何培训的年轻人的问题日益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ECD国家必须优先考虑实施能够让年轻人从学校顺利过渡到工作岗位的措施,检查诸如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措施,因为其对于这一重要的年龄群组来说影响巨大。

20%
来自父母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的孩子中,仅有20%完成了大学教育

就业前景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占25—64岁人口就业率的百分比,按受教育水平划分,2010年)



注:巴西是2009年的数据。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全球衰退凸显出教育的重要性

62% **17%**

的年轻成人

进入高等教育

进入职业教育

额外年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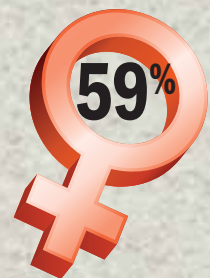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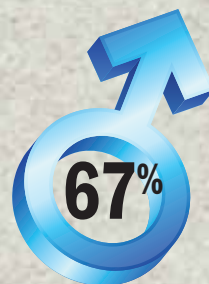
与具有高中学历者相比，具有大学学历者在其工作生涯中获得的净收益为



男大学毕业生的收入

女大学毕业生的收入

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要高



本文由德克·冯·戴姆 (Dirk Van Damme)、科林·赫克曼 (Corinne Heckmann) 和伊丽莎白·维鲁特雷克斯 (Elisabeth Villoutreix) 撰写。其中的文字和图表均基于 OECD 于 2012 年 9 月出版的《2012 年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2: OECD Indicators)。(除单独注明的以外，数据均为 2010 年的数据。) 该报告提供了 OECD 34 个成员国以及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教育系统在结构、资金及教学成绩等方面的数据，可通过 www.oecd.org/edu/eag2012.htm 浏览。



中国推动西方创新

纽约中央火车站苹果门店。

中国制造业出口商所从事的是低技能生产，但却推动了西方的高技能创新

尼克·布鲁姆、米尔科·德拉卡、约翰·凡·里宁

当加利福尼亚高科技公司 Eye-Fi 于 2005 年推出一款具有内置 wi-fi 功能的全新存储芯片时，它面临着许多技术公司所共同遭遇的一项挑战：如何设计制作一种颇具前景的原型，然后将其转化为一种大众市场的低成本产品——并先于其竞争对手投入市场。

Eye-Fi 的解决方案是许多西方公司为应对中国作为制造业巨头的兴起而日益采取的一项策略。Eye-Fi 利用加利福尼亚当地的一家精品生产商来开发原型，再由其公司内部的工程师几乎每天对所生产的原型进行改进。随着需求逐渐旺盛以及该产品的广泛销售，Eye-Fi 把美国本土小批量的精品生产迁往中国并进行大批量、低成本生产。高技能的创新和开发在美国进行，但是较低技能的批量生产则移向海外。随着中国的规模生产在全球生产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诸如此类的情形在美国、欧洲和日本频频发生。

苹果 iPhone 和 iPad 的发展历程与此类似。两款产品均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设计和原型制作，而后在中国生产。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日益集中在低技能生产领域，但同时也在培育西方的高技能创新。

这反映出有众多西方公司正在成功地利用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1987—2007 年期间，美国和欧洲源自中国的进口占比增加了 10 倍，这可能导致许多低技能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就业岗位（见图 1）。这无疑是个坏消息。但是，正如 Eye-Fi 公司的事例所证明的那样，中国面向欧洲和美国出口的大幅增加对以创新为基础的西方经济体的经济前景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中国的出口促使发达经济体最优秀的公司更好，从而推动创新，确保未来增长。当然，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欧洲和美国的低技能工人备受煎熬，因为雇

主们转而雇佣更多的高技能员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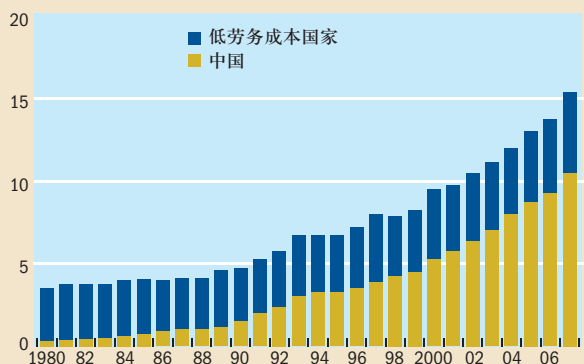
以鞋类这个典型的低技术含量的部门为例。根据传统的思维，鞋类生产将全部移向诸如中国或越南等低成本的海外生产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许多美国和欧洲的鞋类生产商都因此而消失了。但是，一些厂商正在对设计进行创新，以使之服务于中国与之竞争起来较为乏力的部分市场。

例如，瑞士的一位工程师卡尔·穆勒患有背痛病，他发现，当光脚走在结缕草上时，背痛症状就会减轻，由此，他创建了马塞族赤脚科技（MBT）公司，专门生产姿态矫正鞋。他为旨在仿效这一作用的设计申请

图1
价格便宜的趋势

1987—2007年期间，从低劳务成本国家到美国和欧洲，几乎所有大幅增长的进口背后都有中国的身影。

（面向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占比，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低劳务成本国家系指1972—2001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的国家。

了专利，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如今，这一模式受到竞相效仿。

诸如 MBT 和 Eye-Fi 之类的许多公司已经对中国生产商所取得的潜在进展采取了应对措施：对新技术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并对高度定制的设计进行创新。在与中国实现贸易一体化之前，实施此类创新的公司少之又少，因为以同样的方式一成不变地做事情总是要容易得多。但是，巨大的冲击——例如来自中国生产商的竞争——减少了创新的机会成本，因而使得公司在经营领域不愿像往常一样得过且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随后的四年中，针对中国商品的许多贸易壁垒得以消除，纺织行业中尤为如此。对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商而言，这无疑造成上述冲击的主要原因。这导致中国对上述经济体的出口大幅增加，从而使得寻求低成本产品的零售商与谋求保护自身市场的国内生产商之间爆发了冲突。事实上，国内生产商在恢复配额方面取得了部分程度的成功。中国制造的服装——尤其女士内衣——在欧洲港口堆积如山，直至欧盟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所谓的“胸罩战争”。

诸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事件无疑是考察低劳务成本国家所引发竞争效应的天然试验——也是可供我们利用以进行研究的良机。在研究中国对西方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影响这个历史上最大型的研究项目中，我们在过去的 10 年中跟踪了 12 个欧洲国家近 50 万家制造企业的业绩 (Bloom、Draca 和 Van Reenen, 2011 年)。

我们针对所有的生产商详细考察了其信息技术 (IT) 领域的投资、专利申请、研发 (R&D) 开支、管理惯例及生产率增长。然后，我们利用欧洲纺织、服装及鞋类进口配额的详细信息，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自然试验进行量化。

中国对技术和就业岗位的影响

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是，在过去的 10 年中，欧洲约有 15% 的技术变革可直接归因于源自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对欧洲经济体而言，这相当于近 100 亿欧元的年收益。各个公司对源自中国进口产品的威胁采取了应对措施：增加其自身生产率——采用更优异的信息技术、提升研发开支及增加专利申请。毋庸置疑，这些举措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增加。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受困要素”的解

释相一致，即，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推动了受影响企业的创新 (Bloom 等人, 2012 年)。这个模型给人的直觉是，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和沉淀投资，一些生产性要素如若在公司之间流动，则代价过于高昂——也就是说，存在无法完全恢复的部分不可逆性投资 (如针对特定企业的技能进行的投资)。虽然源自中国的进口降低了低科技含量产品生产的相对盈利性，企业却无法轻易

各个公司对源自中国进口产品的威胁采取了应对措施：增加其自身生产率——采用更优异的信息技术、提升研发开支及增加专利申请。

地处理他们“受困”的劳工和资本要素。因此，创新和生产一种全新产品的影子成本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通过减少当前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盈利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降低了创新的机会成本，这无疑促进了用以生产新产品和改进工艺的投入。

我们最近参观的一家美国机械零部件公司很好地说明了上述受困要素效应。在 21 世纪初期，该公司大量生产品种多样的产品以供应市场。但是随后，中国公司进入了市场，并能够以几乎一半的价格生产所有的标准化目录零部件。因此，这家美国公司便停止为目录市场提供产品。这导致公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裁员——低技能工人被解雇，部分生产线被关闭。但是与此同时，该公司发现，它在要求周转时间较快 (需要“明天”交付的零部件)、针对敏感客户 (军事或商业原型机) 及根据规格进行订单生产的产品 (为诸如 Eye-Fi 之类的公司进行初期的生产运行) 方面拥有小规模生产运营的市场。因此，创新得以提升，从而招聘更多的工程师，而与此同时，许多低技能工人则遭到解雇。此外，还必须大幅改进管理惯例，以应对产品种类更加多样、周转时间更为缩短的挑战。总体而言，公司从一家服务于大众化市场的公司转变成为一家服务于利基市场的公司，加大了其创新力度，增强了信息技术。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受困要素效应具有十分明显的统计证据。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的大幅增加普遍促使公司开展技术变革，但是，在公司针对性或行业针对性资本程度更高的领域中，这种效应便愈加明显。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公司均通过寻求创新而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效率不高、技术含量低的公司更有可能失去就业岗位并最终消失。随着经济活动从效率低下的公司转向行动敏捷的竞争对手，这种现象本身可通过残酷的自然选择来提高生产率。在因源自中国的竞争而导致的所有效应中，约有 1/3 是以“创造性的破坏”的形式出现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

如若对技术进行投资，则可大大有助于保护各种市场中的企业免受中国竞争对就业岗位负面影响。

图2通过对欧洲各种类型的公司进行考察显示了创造性破坏的实际作用。左侧所显示的各个行业的工厂所面临的源自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较慢——例如，制药和医疗器械公司。毫无疑问，高科技公司的增长速度快于低科技公司。（在图中，我们展现了信息技术密度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所有其他的技术指标均遵循了与上述相同的模式，如专利和生产率。）右侧显示的是各个行业的就业岗位增长，如中国进口增长出现大幅上升的家具、服装和纺织品。与受中国进口影响不大的行业一样，高科技工厂就业岗位的增长约为10%。尽管平均而言所有行业的低科技含量的工厂均进行了裁员，但是，受中国竞争影响更大的许多行业减少的就业岗位更多。在这些工厂中，就业率几乎下降了20%，相比之下，受中国竞争影响不大的工厂的就业率下降了10%。实际上，图2低估了低科技产业就业率的下降，因为它只计算了幸存下来的公司。此外，我们还发现，源自中国的竞争增加了低科技含量公司的破产率，但是高科技公司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衡量的是源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成品——采购者所消费的商品——的影响。但是，对于上游行业公司用作原料的中间体或下游商品而言，还存在离岸外移效应。我们对这种离岸外移的渠道进行了计算，

发现它对生产率起到了更大的积极作用。

需要采取何种政策？

除了提升西方公司的创新速度之外，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还有许多益处。例如，消费者可享受更低的价格，扩大的出口市场可促进投资，以及一体化意味着可利用专业化获得丰厚的收益。

虽然开放可从总体上促进经济的繁荣，但是大量更为贫穷的无技能工人却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调整压力，因为这些工人现在正在与中国而非英国的工人进行竞争。由于源自中国的竞争使得技术变革的步伐加快，因此，除了通常的趋势之外，我们的数据还预测，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需求将下降。如若没有人才留置措施或其他工作性保障，低技能工人将面临日益惨淡的未来。

正是诸如此类的就业岗位的损失才产生了与中国贸易往来的政治阻力，并导致采取应对措施的压力。如若提高出口补贴、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及增强贸易壁垒，从而惠及那些目前中国占优势的行业，则可能效果甚微，甚至可能产生实际的危害。诸如此类的措施不仅将导致国内价格的上涨——到沃尔玛转一转，看一看中国的商品如何为购物者省钱——而且限制进口还可能延迟必要的重组，并令创新望而却步。实际上，贸易壁垒可能诱使公司将原本花在科技和创新领域的资金用于游说和政治捐献。

更好的应对政策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此举将缓解失业工人向其他岗位过渡的压力，并促使竞争者抢抓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机会，以推动其创新领域的发展，同时为其消费者生产更加廉价的商品，从而使中国和西方都从中得到实惠。而且，当培训较为困难或不具经济可行性时——例如，针对经济严重低迷地区接近退休年龄的工人——区域性的援助和数额可观的补偿金将会减缓这一冲击，并对这些因全球化而失业的人们提供帮助。■

尼克·布鲁姆（Nick Bloom）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兼经济业绩研究中心（CEP）的研究人员；米尔科·德拉卡（Mirko Draca）是CEP生产率和创新研究项目的研究经济学家；约翰·凡·里宁（John Van Reenen）是CEP主任兼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Bloom, Nicholas, Mirko Draca, and John Van Reenen, 2011,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CEP Discussion Paper No. 1000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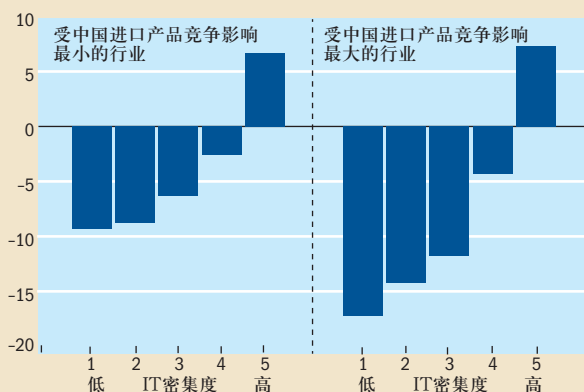
Bloom, Nicholas, Paul Romer, Stephen J. Terry, and John Van Reenen, 2012, "A Trapped Factors Model of Innovation" (unpublished;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www.stanford.edu/~nbloom/TF.pdf

图2

高科技是出路

2000—2005年期间，欧洲各个行业低科技含量工厂的就业岗位出现萎缩，受源自中国的竞争影响更大的工厂尤为如此。高科技工厂的就业岗位出现了增长，严重受中国出口竞争影响的行业也是如此。

（就业率，2000—2005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本图所涵盖的是欧洲12个国家的2.1万家工厂在2000—2005年期间的就业岗位增长。左侧显示的是中国进口增长最弱势的20%的行业，如制药。右侧显示的是中国进口增长最强势的20%的行业。信息技术（IT）密集度的衡量单位是每个员工的电脑数量。处于最底部20%（第一五分位）的工厂每名员工的电脑数量最少；处于最顶部的20%（第五个五分位）的工厂每名员工的电脑数量最多。



当商品价格 飞涨之时

加斯顿·杰罗斯、尤利娅·乌斯秋戈瓦

最近出现的食品价格飞涨意味着，许多国家可能迅速面临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 and 东欧出现的严重旱灾及其他粮食生产国出现的严重问题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粮食供应持续恶化的前景意味着，粮食价格可能在近期内持续居高不下。同时，在地缘政治风险因素的推动下，石油价格也乘势上涨。

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经济增长缓慢的国际环境下，高涨且不稳定的商品价格——如同 2008 年的情形一样——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挑战。决策者必须努力避免商品价格的飞涨引发通货膨胀的总体性持续攀升——也就是说，要防止商品价格波动迁移至所谓的核心通货膨胀（剔除波动巨大的燃油和食品价格后的通货膨胀）。

这种国际环境不仅迫使决策者们认真权衡合适的对应政策，而且它还凸显

出了解下述内容的必要性，即哪些政策框架（例如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类型及所实施的汇率策略）及结构性特征——从劳动力市场到金融市场——有助于遏制商品价格波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效应。令人不解的是，迄今为止，对此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仍不甚了了。

问题重重

就为应对商品价格暴涨而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层面而言，人们不禁产生下列疑问：拥有更为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国家或者其货币政策旨在实现特定通货膨胀率的国家是否减弱了商品价格波动向国内通货膨胀的迁移——其中包括核心通货膨胀？一个经济体的贸易开放度或其金融部门的发展程度在国际价格波动传播中何有作用？先前业已存在的通货膨胀水平在确定价格波动的传播过程中具

价格暴涨可能对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很高且制度较弱的国家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有何种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治理框架——除去货币体制的制度性特征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受到的波动？汇率灵活性发挥何种作用？

为了研究上述及其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我们采用几种方法策略（Gelos 和 Ustyugova, 2012 年），研

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在价格波动之前，通货膨胀率越高，商品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越大。

究了 31 个发达经济体及 61 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首先，我们通过估算国际商品价格向国内价格的迁移并将其与国家特征和政策框架（但不包括任何特定的应对政策）联系起来，以考察国际商品价格的波动如何对各国的国内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在进行上述考察时，我们采用了国家间区别对待的估算和面板估算（同时采用源自各个国家的数据）的方法。此外，我们还分析了各个国家在 2008 年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几个月份内的总体通货膨胀及核心通货膨胀，因为当出现大的价格波动时，经济变量的表现可能有所差异。

研究结果证实，商品价格波动对发展中经济体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大于对发达经济体。例如，在发达经济体中，食品价格每波动 10 个百分点，其对国内通货膨胀的长期迁移平均值为 0.2 个百分点。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这个数值要大四倍。在燃油价格方面，这种差异性则没有如此巨大。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转化的规模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其中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价格控制和补贴措施所致。

毫无疑问，按照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衡量，对于食品占日常商品和服务通货篮相当大一部分的国家而言，食品价格的波动更有可能产生持续的通货膨胀性后续效应——尽管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所赋予的不同权重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迁移的差异性（见图 1）。同样，燃油价格波动更多地迁移到了石油高度密集型的经济体中。例如，根据我们的面板估算，对于 CPI 中食品占比位于前 1/5 的国家而言，国际食品价格每遭受 10 个百分点的波动，则可使通货膨胀增加 1.4 个百分点；而对于食品占比位于后 1/5 的国家而言，这种迁移仅为 0.3 个百分点。

一些惊喜

然而，令人惊喜的是，当商品价格出现波动的时候，其他一些国家性因素似乎并不会如同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影响到通货膨胀的波动。例如，经济理论表明，

对于金融部门更发达、金融市场更深化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更有效。另一方面，金融高度美元化（采用外币而非本币，通常为美元）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限制作用，从而使之更难以抵御价格波动向通货膨胀的迁移。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如下证据，即金融发展的

提高或广泛的美元化大幅影响国际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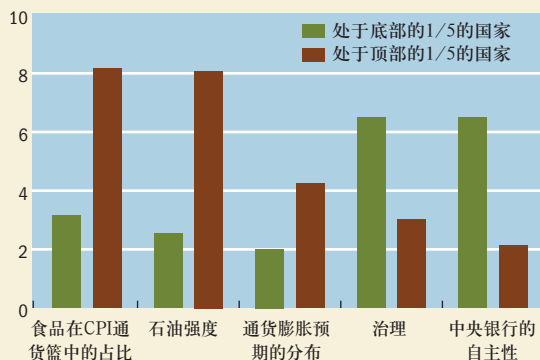
此外，我们也未发现商品价格波动向国内通货膨胀的迁移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之间存在任何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关系；经济理论预测，其内部的公司可更加容易地调整工资及其员工队伍的经济体在应对商品价格波动时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更小。而且，总体而言，商品价格通货膨胀向国内价格的高迁移率也不能归咎于贸易开放性（按照进出口在总的经济活动中的占比来衡量）。然而，有迹象显示，燃油价格的波动对更为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通货膨胀造成了更加强烈的影响。

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在价格波动之前，通货膨胀

图1
迁移的多样性

在2007—2008年商品价格飞涨期间，食品在消费市场篮子中占比最小、石油强度最低及通货膨胀预期得以锚定（非广泛分布）的国家的价格上涨向消费物价指数（CPI）通货膨胀的迁移程度最小。

（2007—2008年商品价格波动期间CPI通货膨胀的变化，百分点）



资料来源：Arnone等人（2007年）；作者的计算；《共识预测》（2012年）；《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CRG）。

注：该图显示的是分别处于既定状况顶部和底部1/5的国家。石油强度的衡量指标为石油使用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治理所依据的是ICRG指数，该指数体现了140个国家的诸如官僚机构的质量、腐败、民主问责制及法律和秩序等情况。中央银行自主性这一指标衡量的是货币政策相对于政治影响的独立性。

率越高，商品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越大。例如，在发生2008年危机之后，先期通货膨胀率超过10%的经济体的CPI通货膨胀水平比先前通货膨胀率低于10%的国家高出6个百分点（见图2）。泰勒（2000年）表示，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公司通过提高自身产品价格来应对成本上升的程度取决于所预计的成本上升的持续性，而在高通货膨胀环境中，成本上升的持续性较强。因此，较低且更为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导致商品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Choudhri和Hakura，2006年）。此外，还有迹象显示，通货膨胀预期越分散（通货膨胀锚定程度的一项指标），则通货膨胀迁移率越高（如欲了解针对2008年危机期间所实施的货币政策进行的初步评估，请参见Habermeier等人，2009年）。

抵御价格的波动

为了减小国内通货膨胀对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决策者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我们的分析表明，总体治理的改善、中央银行自主性的提高及较小程度地实施针对通货膨胀的架构似乎有助于锚定通货膨胀预期并减少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所产生的第二轮通货膨胀效应。

例如，根据《国际国别风险指南》的衡量，2001—2010年期间，治理架构越好的国家，越容易遏制商品

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即使某些经济体采取控制措施以实现CPI通货膨胀率目标，上述结果依然有效。食品价格通货膨胀提高10%，则治理评级——其中涵盖官僚机构的质量、腐败、民主问责制及法律与秩序——处于最底部1/5的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比治理评级处于最顶部1/5的国家平均高出0.9个百分点。同样，在发生2008年食品价格波动时，中央银行自主性更大的国家发生CPI通货膨胀的幅度较小，而2001—2010年期间的价格波动至通货膨胀的迁移也较小。

然而，在2001—2010年期间，通货膨胀目标制对商品价格压力的迁移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弱。例如，国际燃油价格通货膨胀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与央行没有设定CPI通货膨胀目标的经济体相比，对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长期通货膨胀影响仅低0.2个百分点。而且，尽管有迹象显示，在2008年时，一些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防止商品价格飞涨向一般性通货膨胀（总体和核心通货膨胀）的迁移，但是两者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

十分明显的一点是，在面临商品价格波动时，与一个国家是否正式宣布其自身为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相比，对制度的总体信心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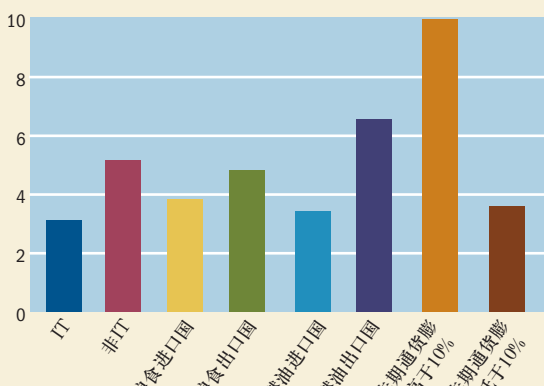
加斯顿·杰罗斯（Gaston Gelos）是IMF能力发展协会的顾问；乌斯秋戈瓦（Yulia Ustyugova）为IMF西半球部的经济学家。

图2

至关重要的因素

许多基本条件影响到了2007—2008年商品价格上涨向总体通货膨胀的迁移，其中包括发生价格波动之前的通货膨胀率水平。

（2007—2008年商品价格波动期间CPI通货膨胀的变化，百分点）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Roger（2009年）。

注：IT指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通过该目标制，设定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以实现某一水平的消费品通货膨胀率。如果一个国家五年内的粮食进口平均值超过其五年内的粮食出口平均值，则该国被视为粮食进口国。利用这个同样的衡量标准，可以确定一个国家是否为燃油出口国或进口国。CPI=消费物价指数。

参考文献：

Arnone, Marco, Bernard J. Laurens, Jean-François Segalotto, and Martin Sommer, 2007, "Central Bank Autonomy: Lessons from Global Trends," IMF Working Paper 07/8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oudhri, Ehsan U., and Dalia S. Hakura, 2006,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to Domestic Prices: Does the Inflationary Environment Mat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25 (June), pp. 614-39.

Gelos, Gaston, and Yulia Ustyugova, 2012, "Inflation Responses to Commodity Price Shocks—How and Why Do Countries Differ?" IMF Working Paper 12/22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bermeier, Karl, and others, 2009, "Inflation Pressures and Monetary Policy Options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ross Regional Perspective," IMF Working Paper 09/1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September).

Roger, Scott, 2009, "Inflation Targeting at 20: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MF Working Paper 09/236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aylor, John, 2000, "Low Inflation, 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4, No. 7, pp. 1389-408.

花费还是分配

拉巴·阿尔扎基、阿诺·迪普伊、阿兰·盖尔布

发展中国家可以把商品特别收益金花费在实物投资上，但是从短期的角度看，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其国民可能更加有利

长达十年的商品价格上涨大幅充盈了许多传统生产国政府的国库。在勘探浪潮过去之后，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如加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也正在兴起（见附表）。这些国家可能并非都是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但对它们而言，它们所获取的收入将是一笔数额不菲的资金，并因此将确保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光明前景。

然而，这些国家的未来并非一片光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新的石油收入将缓解政府预算所受到的约束，但是，它也将形成诸多挑战——正如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所显示的那样。尽管这些国家从资源中获取了大量的收入，但是许多国民仍然很贫穷。在一些情况下，以资源财富为中心的竞争推动国内冲突或使国内冲突长期持续。经

济多元化是一项更为深刻的长期挑战：由于汇率升值，非资源部门往往面临着失去竞争力的风险。

例如，在几年之前的尼日利亚，所有上述效应均已出现。鉴于需要对经济进行重新平衡，培育非商品行业以生产更高附加值商品，并在商品储备消耗殆尽之后确保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因此，有关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变得更加明显起来。发达经济体已经从对自然资本的依赖——如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及矿产资源——转向了对实物和人力资本的依赖（见图1）。但是，贫穷国家的财富往往集中在自然资源方面。

传统的论点是，国家应当利用它们的资源收入来为公共投资融资。但是，这是否始终为最佳的办法，对此仍存在众多疑问。许多以资源为基础的国家具有的国力有限，因此难以实现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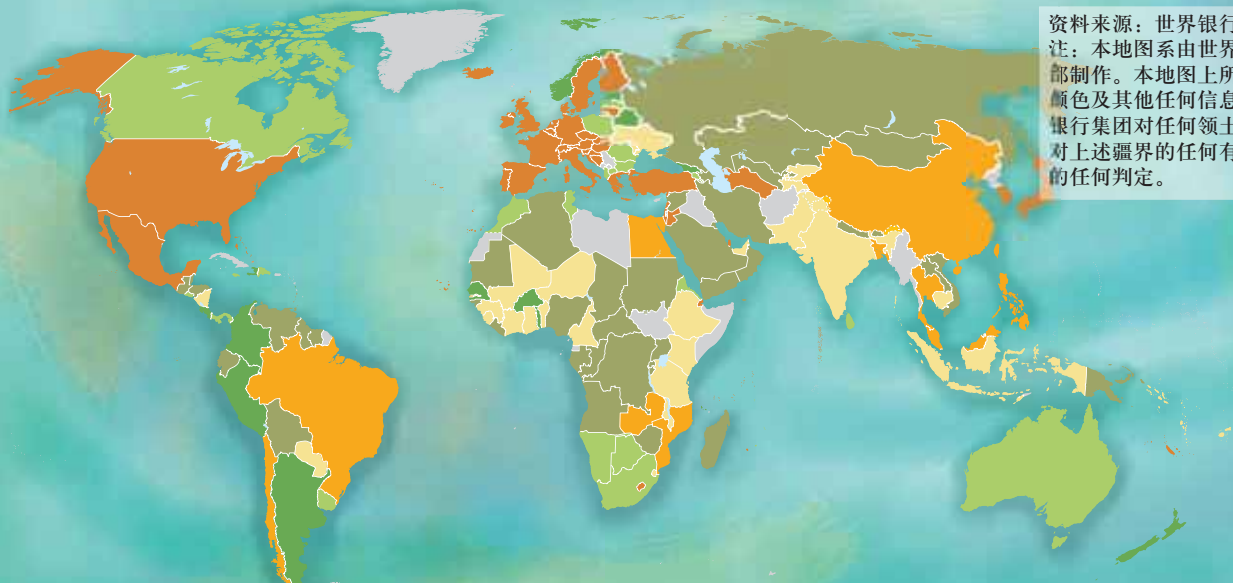
图1
超越商品财富

贫穷国家的财富往往集中于自然资本——如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及矿产资源——而发达经济体已经从对自然资本的依赖转向了对实物和人力资本的依赖。

（自然资本所占的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6年）。
注：本地图系由世界银行地图设计部制作。本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颜色及其他任何信息并不表示世界银行集团对任何领土的法律地位或对上述疆界的任何有关文件或认可的任何判定。



巨大的收益

最近，非洲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这或许不会对全球的石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但是却有可能为这些国家提供可观的收入来源。

国家	年份	储量估算数据
乍得	1973年	石油，15亿桶
苏丹/南苏丹	1979年	石油，50亿桶
赤道几内亚	1995年	石油，12亿桶
乌干达	2006年	石油，35亿桶
加纳	2007年	石油，6.6亿桶
南非	2009年	页岩气，16万亿立方米
莫桑比克	2010年	天然气，2.8万亿立方米
坦桑尼亚	2010年	天然气，6.5万亿立方米
肯尼亚	2012年	探明储量

资料来源：行业及新闻报道。

注：所列年份系指首次探明可能具有商业开采价值储量的年份。

当而有效的投资。有限的的能力所反映的并非仅仅是一个政府缺乏甄别、部署和监督重大投资项目的技术能力。它通常也是公共部门腐败的结果，因为腐败促使这些国家通过政治影响浪费并错误配置资源特别收益金，其中包括通过尤其易受管理不善影响的巨额建筑合同。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大幅增加公共投资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从短期来看，将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直接红利分配给国民并依靠他们的支出选择来创造和培育非资源行业。从中短期来看，这些国家应当加强它们的治理能力——可以说是针对投资能力进行投资——以便缓解收入使用所遭受的一些束缚。

避免重蹈覆辙

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传统的商品出口国推出了野心勃勃但常常颇为浪费的政府开支计划——其中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如道路、港口和铁路。据案例研究表明，这些投资项目受到低效率的困扰，而且还造成资源配置失当（Gelb, 1988年）。即使在完工之后，一些大型项目有时也未能产生收益，因为政府无法支付高昂的运营和维护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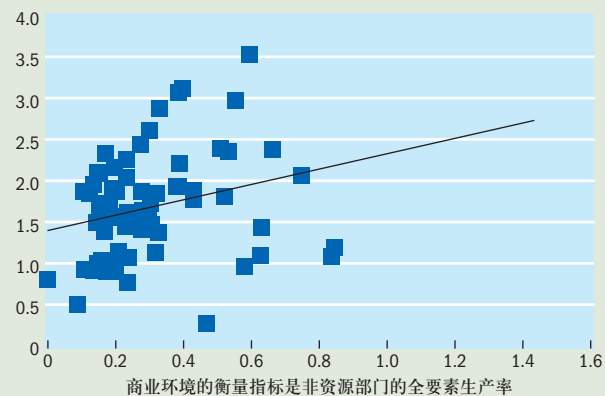
由于商品特别收益金直接通过政府国库流转，因此，这为政府官员提供了将其变成个人获利的大好机会。对政府开支进行操纵，尤其通过建筑合同的审批，是政府收入利用的一项重大障碍。对30个石油出口国1992—2005年间情况的研究表明，石油所带来的大笔收入导致腐败大幅攀升（Arezki和Brückner, 2012年）；这既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成本，又降低了投资的质量。据IMF所推出的一项公共投资管理质量指数显示，资源出口国的公共投资管理质量显著较低（Kyobe等人, 2011年）。此外，由石油收入所推动的支出增加通常超越了可利用资源的承受限度，因而导致一些产

图2

各不相同的举措

一个国家良好的公共投资管理与高质量的商业环境通常不会相伴而行。

（公共投资管理的质量，指数）



资料来源：Kyobe等人（2011年）；Heston、Summers和Aten（2006年）；世界银行（2011年）；作者的计算。

注：上述数据涵盖了可获得IMF“减贫增长贷款”的低收入国家。管理质量的衡量指标为公共投资管理指数，其中包括17项指标，涵盖了战略性指导和项目评估、项目选择、项目实施及项目评价和审计。衡量等级从0至4不等，得分越高说明公共投资管理绩效越好。商业环境的衡量指标为非资源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NRTFP），它是非资源部门产出（不通过生产中所使用的投入数量来诠释）的一部分。在计算非资源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时，最大值为1，该值对应于美国普遍具有的水平。

油国，尤其制度较弱的国家陷入债务之中（Arezki和Brückner, 2011年）。

为了避免出现上述问题，商品生产国在从商品中获得特别收益金之后确定开支的长期水平和类型时，必须兼顾它们的制度条件。对于治理能力较弱的国家，假定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因为治理和公共机构水平较差——这些问题导致了公共投资的成本超过其表面价值，藉此可塑造最佳的开支决策，而且我们可以假定，上述成本随着商品获利的规模增大而增加。我们还可以考虑私营企业所面临的更好或更糟的投资环境所发挥的作用，因为投资环境将影响到私人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开支所创造机会的响应程度。不同的国家所面临的两种制度条件的组合也各不相同（见图2）。一些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可能相对较强，但商业环境却较差（例如阿尔及利亚），而其他国家虽然在国家机构的质量方面被认为得分相对较低，但是却成功地维持了高效率的私营部门（例如肯尼亚）。我们还考虑了政府开支的一项替代性方案：直接将大量的资源性收入转移支付给国民，以增补他们的工资收入，增强他们投资和消费的机会。

国民获益

直接将资源特别收益金转移支付给国民早有先例。



加纳首都阿克拉附近的一座炼油厂。

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根据石油收入向其市民每年分配一笔资金。例如，2009年，每一个阿拉斯加州的居民收到的红利约为1300美元（Ross，即将出版）。蒙古将其矿业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其国民，最近，该国许诺赠予每一名蒙古国民以可分红的矿业优先股投资组合。赞同为国民分红的论点引述了如下证据，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税收一直在高效的现代化国家的创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将资源收入分配给国民，然后将其中一部分通过税收的形式收回，政府可以增强公众的责任感，因为藉此，国民会更倾向于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Sala-i-Martin 和 Subramanian，2003年；Moss，2011年）。更加直接的论据是公共开支的效率低下十分明显——随着计划的

价急售、以更好的条款获得贷款及更加多样化地参与更高风险和更高回报的经济活动。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将社会转移支付引入贫穷的偏远地区可刺激需求和当地的市场开发。社会转移支付正在日益被纳入社会保障计划之中。许多社会计划的证据表明，转移支付从资源中产生的收益可帮助受惠者家庭及国家。

不久之前，如若在更为贫穷的国家将特别收益金利润分配给国民，则很难避免——若非不可能——使其中的一大部分损失掉或被政府公务员据为己有。但是，新技术开创了多种方式，藉此可将资金精确而高效地转移支付至各个家庭，而且成本较低。手机和生物识别智能卡得以日益广泛的应用，即使在制度较弱、能力较低的国家中也是如此。例如，巴基斯坦的 Watan 卡计划向超过150万受洪灾影响的家庭发放了重建支持资金。正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一项旨在对解除武装的民兵提供支持的计划一样，南非的社会拨款系统行之有效地采用了这一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可克服在甄别接受者过程中传统上所面临的困难，从而避免多次重复付款并消除“幽灵”接受者。Gelb 和 Decker（2012年）考查了19项计划。并非所有的计划都受到整体的好评，但是，证据显示，利用可确保转移支付计划本身以外收益——例如使用银行账户进行预防性储蓄及更加完整和精确的选民名册——的识别和支付技术，可确保上述计划得以大规模实施，从而使几乎所有的资金都能用于原本设想的用途（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几乎没有渗漏”）。由于这些技术可尽量降低石油利润在人口中均衡分配的成本，因

新技术开创了多种方式，藉此可将资金精确而高效地转移支付至各个家庭，而且成本较低。

逐步拓展尤为如此——普通百姓越来越难以从逐步拓展的公共开支项目中受益。更为直截了当的论据是，现金转移支付对发展的影响及高效现金转移支付的可能性等证据日益增多。

社会转移支付可发挥作用，而且是最为有效且最受好评的发展援助机制之一，当上述转移支付以接受者的行动为条件时尤为如此——例如避免儿童辍学。许多研究显示，此类转移支付可以帮助家庭减贫，提高儿童的成长指标，提升学校的入学率，并改善医疗服务的获取渠道。此外，几乎没有证据显示，面向穷人的社会转移支付会促使人们放弃工作。相反，接受者似乎在利用这笔钱寻找工作。而且，转移支付似乎促进了生产性的家庭活动。贫穷的家庭受到发展不完善的信贷和保险市场的制约较少，而这种不完善性往往是不发达经济体的特征之一。数额较小但十分可靠的转移支付资金流有助于贫穷的家庭积累私人生产型资产、避免在困窘时期的廉

此，有理由假定，决策者将商品获利的一部分用于直接转移支付的成本几乎为零。

即将采取何种措施

如若考虑到收入的特别收益金优化应用模型中的所有上述要素，则可得出有助于为政策提供指导作用的多个结论。当然，在制定所有的决策时，必须考虑如下的长期性效果，即，当资源性收入增加时，则鼓励储蓄，藉此，可在收入减少时确保支出的持续性。除了这些注意事项之外，制度性特征可影响到收入得以优化使用的程度。如若公共行政能力较弱，则将降低公共投资的优化水平，因此倾向于将较大部分的转移支付给国民；与其将资金浪费在效率低下的开支上，还不如将其中的部分资金直接给予各个家庭。而且，在同等条件下，从商品中的获利越大，则应当

致使公共投资的额度降低而非增加，因为官员谋求将这笔资金据为己有的行为将进一步弱化国家的能力。这些状况对有关向国民转移支付的论点提供了支持。

此外，在确定资源性收入优化使用的过程中，基本的商业环境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良好的条件——如可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安全和稳定的促进商业发展规章制度——可弥补较弱的能力，并可合理化解释公共投资的增加。这是因为公共投资开支有可能促进生产性私人投资的增加，此举可实际上提高公共投资的回报率。政府能力可影响到商业环境，但是正如我们通过上述实例所知道的那样，良好的治理和理想的商业环境并非总是相伴而行。商品生产国政府及其战略经济顾问在确定如何利用其收入时必须兼顾上述制度性因素。

对投资进行投资

有限的政府能力是一种制约，但是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制约因素。一些国家（例如智利）已经提高了它们的能力；其他国家的能力却明显弱化。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把部分特别收益金花费在提高国家管理其投资计划及提供关键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高效的公路、电力供应和监管——的能力之上，私营部门需要实现振兴。为了考察此种可能性，我们对我们的基本模型进行了拓展，引入了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公共投资调整成本的可能性——要付出代价。我们发现，优化的公共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而随着日益增长的公共资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并导致工资收入的提高，对收入转移支付的依赖性逐渐降低。一般而言，商业环境越好，实施这种战略的依据越充分。假如公共投资在随后的时间内未能刺激私人投资并带来宝贵的产出，那么大力提升公共投资就显得没有多大意义。在对国家能力、对此种能力进行投资的途径及实现此等改进的时间框架等建模方面，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为与腐败作斗争，商品出口国可在对特别收益金进行处理的过程中确保更大的透明度。例如，“采矿业透明行动计划”为石油、天然气和采矿行业的透明性提供了国际标准，而基于透明行动计划的“自然资源宪章”则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如何充分利用采掘商品利润所创造发展机遇的更为综合性的原则。上述行动计划可作为增强商品富余国家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支柱。更具体而言，如若对公众公布政府采购合同，则可能有助于提高投资质量，降低合同成本，避免成本超支（Kenny 和 Karver，2012 年）。

国家还可大力提升它们甄别和实施项目的技术能力。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智利，30 年以来，该国对所有

的公共项目均进行严格而透明的成本效益分析。南非国家对项目评估的方法实行了标准化，并将评估项目的机构与提交项目的机构分离开来。国家投资系统在规划部，财政部对其实施联合管理。旨在增强技术能力、消除腐败的综合性努力是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商品特别收益金巨大作用的最佳途径。■

拉巴·阿尔扎基（Rabah Arezki）是IMF能力发展协会的一名经济学家；阿诺·迪普伊（Arnaud Dupuy）是兰斯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阿兰·盖尔布（Alan Gelb）是全球发展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本文基于上述作者的IMF工作论文12/200，“资源特别收益金、优化公共投资及重新分配：生产率总要素与行政管理能力的作用”（Resource Windfalls, Optimal Public Investment, and Redistribution: The Rol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参考文献：

- Arezki, Rabah, and Markus Brückner, 2011, “Oil Rents, Corruption, and State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Regress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7, pp. 955–63.
- , 2012, “Commodity Windfalls, Democracy and External Debt,” *Economic Journal*, Vol. 122, No. 6, pp. 848–66.
- Gelb, Alan, and associates, 1988, *Oil Windfalls: Blessing or Curse?* (New York: World Ban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lb, Alan, and Caroline Decker, 2012, “Cash at Your Fingertips: Biometric Technology for Transf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Vol. 29, No. 1, pp. 91–117.
- Heston, Alan, 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 2006,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2*,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on, Income and Pr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 Kenny, Charles, and Jonathan Karver, 2012, “Publish What You Buy: The Case for Routine Publication of Government Contracts,” *CGD Policy Paper 011* (Washington: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 Kyobe, Annette J., Jim Brumby, Zac Mills, Era Dabla-Norris, and Chris Papageorgiou, 2011, “Investing in Public Investment: An Index of Public Investment Efficiency,” *IMF Working Paper 11/3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Moss, Todd, 2011, “Oil to Cash: Fight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rough Cash Transfers,” *CGD Working Paper 237* (Washington: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 Ross, Michael L., forthco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troleum Weal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 Some Policy Alternatives,” in *Commodity Prices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d. by Rabah Arezki, Catherine Pattillo, Marc Quintyn, and Min Zhu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Sala-i-Martin, Xavier, and Arvind Subramanian, 2003, “Address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 Illustration from Nigeria,” *IMF Working Paper 03/139*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World Bank, 2006, *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hington).
- , 201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什么是 LIBOR ?

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被广泛用作利率基准，但如今却备受诟病

约翰·基弗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11 点左右，18 家大型银行会向英国银行家协会报出一个借贷利率，他们认为根据此利率可在伦敦银行同业市场中彼此借到一笔“合理”数额的美元资金。他们所报出的利率针对 15 种借款期限，从隔夜到一年不等。财经新闻机构汤姆森路透社代表该银行家协会收集所报出的利率，剔除最高的四个和最低的四个，对其余的数值取平均值。然后，该新闻社公布各家银行表示可针对 15 种借款期限中的每一种借取美元的平均利率。

此外，还针对其他 9 个币种实施这一流程。所得平均值——通常以单数形式表示，尽管实际上有 150 种利率——被称为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IBOR）。它是全球知名度最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利率之一。

但是，它并不重要，因为银行在彼此进行交易时很少依照所公布的利率——尽管可能存在这样的交易。事实上，LIBOR 的重要性在于它被广泛用作利率基准，为实际实施的交易所采用的许多其他利率提供参考。

LIBOR 的重要性在于它被广泛用作利率基准，为实际实施的交易所采用的许多其他利率提供参考。

据英国财政部最近的一项报告显示，价值 300 万亿美元的金融合同均参照 LIBOR——而且这还不包括全球范围内未计算在内的数百亿美元的浮动利率住房抵押贷款及其他消费贷款，而上述贷款均通过不同的方式以 LIBOR 为参考。

由于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因此美元的 LIBOR 利率或许是使用或引用最为广泛的利率。其他组别的银行——银行数量从 6 家至 16 家不等——每天报出其在伦敦银行同业市场中可短期借取澳大利亚元、英镑、加拿大元、丹麦克朗、欧元、日元、新西兰元、瑞典克朗及瑞士法郎等的利率。

由于对于一些银行如何报出它们“认为”可据以借取款项的利率存在争议，而且因为 LIBOR 概念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很多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在 9 月底时，英国政府公布了如下提议，即将这个十分重要的利率基准的设定和维护纳入政府的管理范围，使

利率基准的设定基于实际的交易，以及去除 150 个不同利率中的大多数。

最近的创新

虽然伦敦的各家银行彼此出借款项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但是 LIBOR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其产生的根源是，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利用期货合约来对冲利率风险的做法陡然增长。因此需要可靠的基准利率，以对上述合约进行结算。市场求助于银行业贸易团体及英格兰银行来提供此等利率。1986 年，英国银行家协会推出了 LIBOR——最初仅针对三个币种——美元、日元和英镑。

LIBOR 成为了浮动利率企业贷款定价的标准化利率基准。然而，这个基准的推行恰逢基于新利率的金融工具出现了增长——例如远期利率协议和利率互换——而此等工具也需要标准化且透明的利率基准。

LIBOR 应当反映现实情况——银行认为它们为借

取一笔指定短期期限的“合理”数额货币而应当支付的平均费用——尽管银行或许在任何既定的日子内实际上并不需要这笔资金。

但是，一直以来，LIBOR 颇受诟病，因为有观点认为，这套利率的设定存在缺陷，而且当市场压力增大期间，银行会停止在彼此间出借从隔夜到一年不等的各种到期日的款项，因而这容易导致扭曲的结果。

此利率可靠性所面临的一项更为直接的挑战是，英国大型银行巴克莱银行试图操纵 LIBOR（及其他基准利率），为此，该银行于 2012 年 6 月同意向英国和美国的监管机构支付总计约 4.5 亿美元的罚金。此外，其他银行也因谎报 LIBOR 利率而正在接受调查，对此，银行资产分析师估算，罚金及法律诉讼的价值可能总计约 500 亿美元。

但是，甚至在有关利率操纵的争论对利率的精确性提出怀疑之前，LIBOR 便常常被人称为“过场戏”，

因为在被用作基准的 LIBOR 与伦敦银行同业市场中实际的借款交易之间完全脱节。大多数银行彼此借贷的资金到期日为一周或更短，因此，大多数针对更长到期日的 LIBOR 在设定时均基于有一定依据的猜测。然而，在参照 LIBOR 其中一个利率——从利率衍生品到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交易中，几乎有 95% 的交易被用于制定到期期限为三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利率。据英国财政部表示，美国到期日（或者“期限”，即所谓的到期期限）为三个月的贷款最受欢迎。无抵押定期借款已经成了空中楼阁，对此，一个更为明显的迹象是，由于缺少来自总部设在纽约的银行的数据，因此，伦敦一家大型的经纪交易商毅联汇业（ICAP）决定停止发布其一个月和三个月的纽约资金利率（New York Funding Rate, NYFR）指数——LIBOR 的替代性指数。

然而，人们发现 LIBOR 一直具有相当合理的准确性，因为其在大部分时间内均可密切监测与实际无抵押银行资金利率有关的类似利率基准，如针对商业本票的利率。

最突出的例外情况是 2008 年 9 月纽约投资银行公司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一段时间，此事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三个月期的 LIBOR 偏离了两大公开发表的类似短期利率——毅联汇业的纽约资金利率及欧洲美元三个月期存款利率，后者针对在美国以外的银行中的美元存款。

在 2008 年初时，LIBOR 低于欧洲美元利率，在雷曼公司破产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降低的幅度尤为明显。LIBOR 似乎密切跟踪纽约资金利率，除了在雷曼

公司破产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之外，因为当时 LIBOR 的下降尤为突出（见图示）。

从一定程度上讲，在雷曼公司破产之后，LIBOR 之所以出现下降，其原因可能是英国银行家协会旨在确保银行据实提交其借款利率之规定（即，立即公布各家银行的上报利率）出现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后果。通常情况下，这种规定会促进诚信，尽管如此，2007 年至 2008 年期间，这项防护措施却事与愿违。据称，一些银行不愿意通过报出比其他银行更高的拆放利率而表明它们在获取资金方面出现了困难。因此，为了掩盖其资金流动问题，出现资金问题的银行倾向于报出比其实际认为可借到款项的更低的利率。实际上，多项研究表明，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于 2008 年 3 月倒闭，六个月后，雷曼公司倒闭，在此之后，银行在提交利率时开始虚报低价。

其他研究发现了表明银行故意不报准确利率的一些情况。但是，意在寻找具体银行相互串通证据的研究通常最终无法得出证据确凿的结论。

在发生这种丑闻之后，有一些观点认为应当取消 LIBOR。但是，作为利率基准，它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以至于英国政府决定，不能将其废除，而应当挽救它。

首先，英国政府提议从银行协会手中接管 LIBOR 的监督权，因为按照英国金融服务局负责人马丁·惠特利的说法，银行协会“显然未能充分履行对 LIBOR 设定流程的监管责任”。惠特利概括地介绍了政府于 9 月底公布的报告中的拟议变革措施。

根据所拟议的改革，LIBOR 将依然根据各银行向英国监管部门提供的报价进行每天设定。但是，这些银行将必须提交相关资料，以证明他们所提交的利率是对其借款成本的准确反映。而且，尽管政府将依然对外公布所提交的利率，但是将延后三个月公布，这样，银行将不会有在借款压力加大期间谎报成本的动机。此外，惠特利表示，政府计划对谎报的银行实施刑事制裁。

而且，为了使所产生的 LIBOR 集中于至关重要的利率之上——并且针对这些利率存在可验证的资金成本——将逐步淘汰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新西兰和瑞典货币的利率，同时取消四种期限的利率。LIBOR 的数量将从 150 个降至 20 个，这 20 个 LIBOR 均为对市场参与者最为重要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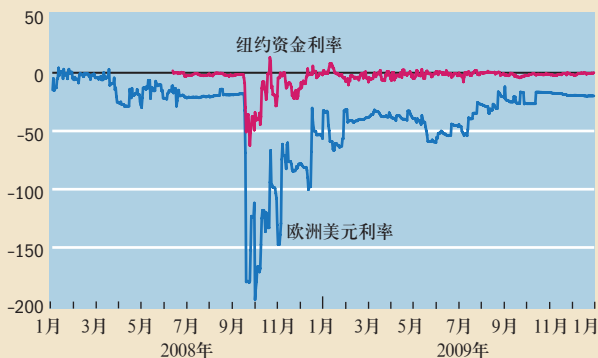
然而，在实际的银行同业交易中，有许多利率仍未受支持。因此，惠特利的报告鼓励市场参与者重新思考他们将 LIBOR 作为基准的做法，并考虑在如果不再提供上述汇率的情况下采取备份方案的必要性。■

约翰·基弗（John Kiff）是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资深金融行业专家。

鲜明的差异

在雷曼兄弟公司于 2008 年 9 月破产之后，美国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明显低于两个类似利率——三月期的欧洲美元存款利率和三个月期的纽约资金利率（NYFR）。

（LIBOR 与 NYFR 及欧洲美元利率之间的差异，基点）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欧洲美元存款系指在美国以外的银行中的美元形式存款。根据在纽约运营的主要银行所提交的信息，伦敦的经济交易商毅联汇业对纽约资金利率进行编制，其设计初衷是体现上述银行的短期借款成本。毅联汇业于 2012 年 8 月停止公布纽约资金利率。利率计算的基点为 1% 的一百分之一。



弗朗西斯卡·巴斯塔利、大卫·柯迪、桑杰夫·古普塔

目前，通过再分配社会支出应对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经济体比发展中经济体中更为有效

当前，收入差距不断加剧正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公众重点讨论的话题。全球化、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技术进步（均对高素质劳动者有利）都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驱动因素。

对于高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持续和经常性的大幅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决策者和时事评论家已表示了严重的担忧。很多人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对于促进人们更广泛地获得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机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刺激投资和增长的一种手段，收入存在某种差距十分必要。不过，有证据表明，如果差距过大，就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近来，很多著名专家认为，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剧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公共政策如何才能应对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在IMF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收入差距的全球发展趋

势以及政府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为减少收入差距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过，在未来几十年间，随着很多国家尽力将其公共债务降低至可持续的水平，由于财政政策调整期的延长，保护财政政策的再分配作用可能变得更难。

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没有进行公共支出再分配的资金，其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收效甚微。为缩小收入差距，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必须提高收入和建立更多的再分配支出机制，如公共养老金和定向转移支付。

收入差距的发展轨迹

为研究收入差距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收集了1980—2010年期间150个

公平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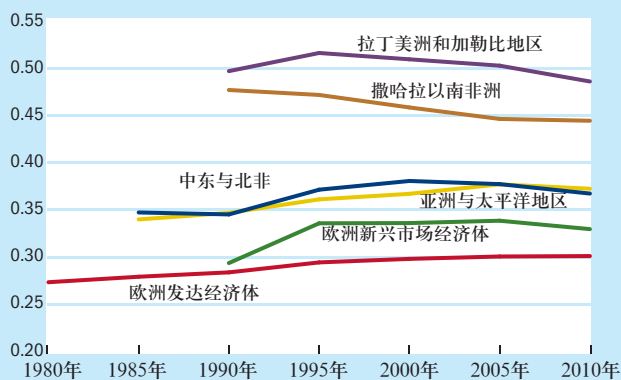
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可支配收入（即个人必须支出的金额，包括社会福利金，并扣除收入所得税）综合数据库。我们采用了收入差距的最常见指标——基尼系数来评估收入分配的变化状况（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0表示人与人的收入完全平等，1表示全部收入被一个人完全占有）。

我们发现，近几十年间，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加剧（见图1），同时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明显超过发达经济体。

我们获得了1990—2005年间大量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在此期间，欧洲的22个发达经济体和22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分别有15个和20个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有所增加。在收入分配本已是最不平等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增大，不过此后绝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亚太地区的15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增大，中东和北美地区的12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在此期间世界上唯一一个平均收入差距程度出现下降的地区，但26个国家中仍有10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加大。

图1
收入差距的不同发展趋势

目前，拉美地区的收入差距最大，不过这种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欧洲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最小。（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值基于多个收入差距数据库。
注：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0表示每个人的收入完全平等，1表示全部收入被一个人完全占有。

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富裕人群收入比重的急剧增长（见“扩大还是缩小？”，《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我们的证据主要集中于最富裕人群的市场收入（纳税和社会转移支付前的收入）比重。

例如，在美国，1980年10%最富裕人群的市场收入比重为30%，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8%。其他发达经济体以及印度和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不过北欧诸国和南欧国家的这一趋势明显小得多，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和日本则几乎不存在这一发展趋势。

缩小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

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为抵消收入差距的增加，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过去20年间，政府财政政策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减少了大约1/3。同时，财政政策往往对市场收入差距更大的国家在再分配方面影响更大。例如，2005年，财政政策使得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下降了20或20以上个百分点。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上述几个国家的市场收入差距相对很高，基尼系数在0.48—0.56之间。

绝大部分的收入再分配是通过支出实现的，特别是居民无论收入高低均可获得转移支付，如公共养老金和通用托儿津贴等。与市场收入相比，这些转移支付的收入分配平等度要高得多，在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波兰和北欧经济体中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影响作用相对更大。平均而言，这些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再分配是税收实现的收入再分配的一倍（见图2）。

收入所得税是另一个重要的收入再分配工具。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经济体中，所得税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超过必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基于接受转移支付人的收入）的转移支付方式，但不及无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的转移支付方式。

如果将实物转移方式，如公共教育和健康支出等包含在内，财政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甚至更大。这些实物转移方式可将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最多降低6个百分点，体现了全民对教育和卫生服务的获取

程度。更加平等地获得教育服务，也有助于降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度。

财政政策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有限

近几十年间，与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相比，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

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明显更大，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再分配财政政策有限。这反映了这些国家税收和公共支出水平相对较低以及使用非累进式税收和支出工具的状况。

通常，发达经济体的税收收入平均超过其 GDP 的 35%，但发展中经济体（新兴欧洲国家除外）的这一比例普遍要低得多，仅为 15%—20%（见图 3）。因此，发展中经济体政府支出的比例也明显更低，在亚太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些地区，政府转移支出比例较低是导致可支配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例如，在 21 世纪初开展的一项调查中，拉美地区和发达欧洲经济体之间在可支配收入差距方面的差异中有接近 3/4 与财政政策有关。在拉美地区的六个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中，财政政策仅使这些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下降了大约 2 个百分点，从 0.52 降至 0.50。而在 15 个欧洲经济体中，这一下降幅度达到了大约 20 个百分点，从 0.46 降至 0.27。不过，部分证据表明，拉美地区最近收入差距缩

小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增加了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减弱

近年来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是，很多发达经济体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图 4 显示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适龄工作人口家庭的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差距所出现的变化；其差值代表每个时期财政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度。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上涨了 3 个百分点，而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仅增长了 0.8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们的收入差距大幅增加，但其可支配收入的差异变化并不大。

因此，在上述十年间，财政政策抵消了 73% 的市场收入差距增幅。尽管此后十年间市场收入差距的增幅相对较低，但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影响也同时减弱。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的 20 年间，财政政策仅抵消了 53% 的市场收入差距增幅，而市场收入差距的增幅是收入再分配增幅的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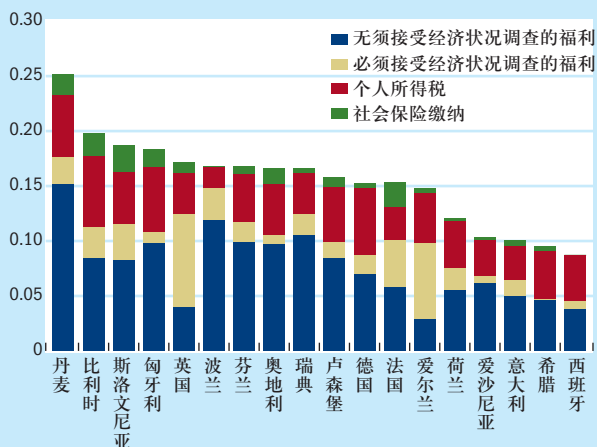
近几十年间，财政政策的影响不断减弱的这一现象令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没有政策改革的背景下，随着市场收入差距的加大（例如，由于失业率增长或者高收入群体收入不断上涨），累进式税收—福利制度通常会导致收入再分配效应的不断增强。证据表明，财政政策的影响减弱体现了政策改革使税收—福利制度总体趋于非累进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很多经济体的政策改革削减了社会福利，特别是失业

图2

实现收入平等

全民福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

（受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的推动，欧洲各国的基尼系数出现下降）



资料来源：Bastagli、Coady和Gupta（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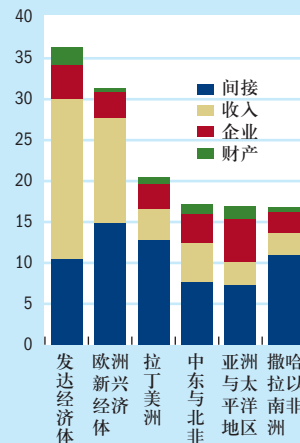
注：模拟政策体现的是2000—2005年期间实际的政策，准确的日期各国之间存在差异。为便于分析，我们将不同税收和转移支付措施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叠加在一起，不过其累计影响并不完全是各个税收和转移支付措施影响的总和。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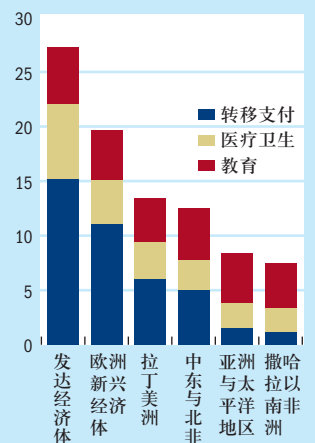
以多胜多

发达经济体的所得税和社会支出相对更高。

（税收占GDP的百分比，2010年或最近年份）



（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2010年或最近年份）



资料来源：Bastagli、Coady和Gupta（2012年）。

保险和社会救济金，同时降低了收入所得税率，特别是更高收入水平的所得税率。

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影响减弱状况更加令人担忧，这是因为在今后十年间，很多发达经济体为降低

类措施的有效性将相对有限。排除避税和逃税的可能性（通常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以及更大程度依赖于累进式财富税和财产税，可以同时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和收入分配效应。

在今后的财政紧缩期间，政策改革必须保护税收和支出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

目前的高公共债务水平，将被迫削减政府支出和提高税收。过去，由于失业率提高（特别是不熟练劳动者的失业率提高）以及高度依赖于支出削减，此类财政紧缩政策常常导致收入不平等度的短期提高。

在今后的财政紧缩期间，政策改革必须保护税收和支出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

从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所谓的自动稳定器（如失业救济金）减弱财政紧缩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保护最积极的社会福利并更好地面向相关对象，可以减缓可能加大收入差距的支出削减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这种方法目前已在丹麦、德国、冰岛和瑞典采用。针对不利于收入再分配支出（如军事资助、补贴和公共部门工资）的改革，可以降低对削减更有利于收入再分配社会转移支付的必要性。此外，扩大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如求职支持、有针对性的工资补贴以及培训计划，有助于在经济恢复增长时加快就业的增长速度。

在税收方面，累进税收措施可以防止大幅削减社会转移支付的必要性。不过，假如税收已经偏高，此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再分配

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财政政策。合理的财政政策既可以促进收入再分配，同时又能推动经济增长，保持政府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加强政府在调动资源方面的能力，同时制定更多的再分配支出计划。

在税收方面，重点应放在扩大税基，而非提高税率方面。通过减少免税政策、弥补税收方面的法律漏洞、提高税收合规性，扩大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基，将有助于提高税收收入，为再分配转移支付提供资金。例如，通过征收增值税扩大消费税基，可以提高税收收入。此类消费税通过对小型企业免税和对奢侈品征税，可以避免对收入分配状况造成负面影响。

不过，税收收入有限以及高度依赖于这些资源为发展提供资金，意味着公共支出必须更具有收入再分配性。通过更大程度地依赖于有针对性，而非普遍性的社会支出计划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社会支出计划应旨在避免处境危险的家庭陷入贫困，并改善贫困家庭获得教育和医疗卫生的状况。很多国家通过取消代价高昂而又效率低下的普惠性物价补贴政策，可以很快节省下大笔的资金。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可以将社会福利与各个家庭对家庭成员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这些计划已在很多发展中经济体中取得了成功，今后应在实施社会保障策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大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有效方法。如果短期内扩大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在政府行政管理和财政能力方面存在局限，可能有必要更多地采用有针对性的“社会养老金”，直到可以扩大养老金的覆盖面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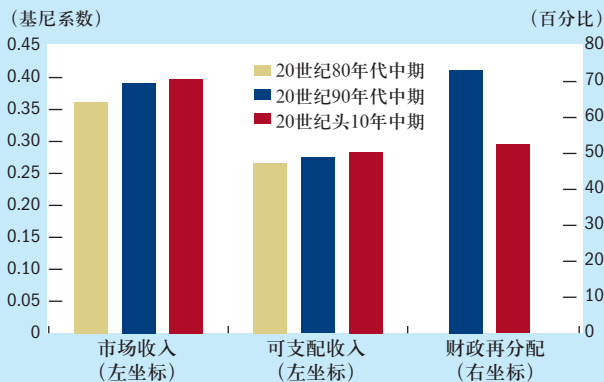
弗朗西斯卡·巴斯塔利（Francesca Bastagli）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大卫·柯迪（David Coady）和桑杰夫·古普塔（Sanjeev Gupta）分别是IMF财政事务部副处长和副主任。

本文基于作者所著的IMF员工讨论记录12/08，“收入差距和财政政策”（Income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

图4

影响减弱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年间的财政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低于过去十年间的影响程度。



资料来源：Bastagli, Coady和Gupta (2012年)。

注：“财政再分配”条柱表示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期间（蓝色条柱）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头10年中期期间（红色条柱）财政政策对市场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状况的抵消程度。

反思可持续发展

必须制定一个新的发展议程，使之真正具有全球性、与所有各方相互关联，并且在责任分配方面切合实际

奈梅特·沙菲克



奈梅特·沙菲克
(Nemat Shafik) 是IMF
副总裁。

随着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截止期限的日益接近，人们正更多地思考必须在该框架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框架，来衡量全球在应对饥饿、疾病和贫困方面的进展。任何一个后续框架必须体现出全球的愿望，并经过充分的协商过程。我认为，新框架必须对发展拥有更广泛的认识，发展应该是与包括富裕和贫困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相关的发展。

与几年前相比，当今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债台高筑，多年以来难以开展支出计划。因此，需要反思针对金融行业的激励和监管措施，完善现有的增长模式以提供新的充足就业机会，并且重新审视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状况。

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恢复人们对全球复苏的信心。在 2011 年一度表现出部分快速恢复能力之后，当前全球增长再度放缓，其主要原因是欧元区的发展前景继续扑朔迷离以及人们对美国可能出现财政危机的担忧。在发达经济体开展恢复其信心的行动的同时，世界各地的其他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和中东地区必须应对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普遍存在失业的问题，以及缺乏体面就业机会的问题。就业危机对年轻人来说尤为严重。经济增长的复苏将提供部分帮助，但创造就业的速度必须快马加鞭，才能吸纳现有的失业人口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就业人口。

其他问题包括：全球化以及难以驾驭的全球化进程；政策和市场失灵，其

表现为那些仍未得到解决的危机，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危机；以及各种长期发展趋势，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加剧、人口老龄化以及不平衡增长、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和气候变化等。

本世纪之初，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携手应对贫困和饥饿、疾病以及与此伴生的机会缺乏等问题。与世纪之交相比，目前要找到一个应对上述挑战的协作式解决方案更为紧迫。

新的规则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要关注于减少绝对贫困的必要性。尽管与《千年宣言》中确定的目标仍然相距甚远，但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仍然非常巨大。比如，自 2000 年以来，世界极度贫困的发生率就减少了一半。

不过，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的发展严重受挫——目前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该次危机的影响。欧洲继续深陷债务危机之中，而日本和美国也亟待进行财政改革。不过，中东和北非地区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变：该地区能否迎来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加民主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其经济转型能否保持公平的高增长态势。再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确保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在保证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以下发展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 收入不公平现象加剧。过去十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提高了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过总体而言，富裕人口的生活状况要大大超过贫困人口。这种收入不平等现象的不断加剧，导致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问题。

- 长期失业和普遍存在的就业不足状况更加严重。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的第五年，全球仍有 2 亿人口无法找到体面工作，其中包括 7500 万年轻人，他们很有可能成为“迷失的一代”。

- 人口增长不平衡。预计到 2050 年，世界总人口数量将超过 90 亿，其中生活在目前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重将达到 85%。全球经济在为这些人口提供食品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将非常巨大。

- 气候变化不断恶化。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状况非常严重，全球变暖仍在持续——二氧化碳排放浓度达到了令人极其担忧的水平。

真正全球化的行动议程

上述所有问题相互关联，不能孤立解决。正因如此，2015 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必须超越我们对发展的传统认识——即帮助不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同时，这一新的发展议程必须应对全球经济存在的各种不平衡现象，包括最终将影响世界各地贫困和弱势群体的溢出效应。

新的发展议程必须是一个真正全球化、其目标与所有各方相关，并且在责任分配方面（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分担责任）切合实际的发展议程。保障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是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不过，鉴于不同国家的能力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必须公平分配这一责任。

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增强，要求各国必须加强政策间的协调。我们需要行之有效、快速实施的全球领导力。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在推动有效的国际合作方面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还应提高多边协作的效率。坦率地说，我们已经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国与国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中了，这种讨论在照顾到方方面面之后只能达成一个最低标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雄心勃勃但又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使我们能够快速付诸行动。

IMF的作用

在帮助全球经济摆脱经济危机方面，IMF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它继续与 188 个成员国在众多领域内开展合作，进一步夯实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础。过去五年间，上述方面已发生了巨大转变，但仍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

- 增强全球的稳定性。IMF 已提高了增强不同国

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并重点关注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最新的经济监测框架使其能够更加深入地分析各种溢出效应和跨境影响。IMF 已从多边组织的角度加强了对各国政策的评估，同时更加关注极其重要的金融行业。

- 在经济衰退期间为各国提供支持。自从全球经济危机伊始，IMF 已向其成员国承诺提供超过 3000 亿美元的贷款。它对其贷款框架进行了全面修订，使之更好地满足其成员国的各种需求，并简化了贷款的附加条件。此外，IMF 意识到了低收入成员国对财政援助的需求，将其优惠贷款额翻了两番。

- 建立危机“防火墙”。为满足日益增多的融资需求，IMF 从成员国那里获得了 4610 亿美元的承诺资金，从而大大增强了其贷款能力。


我们需要行之有效、快速实施的全球领导力。

- 促进包容性增长。IMF 的研究显示，那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国家在可持续增长方面往往表现更佳。IMF 一直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针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问题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咨询建议，同时与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帮助各成员国加强社会保障工作。

- 制定绿色经济政策。我们的政策咨询建议鼓励各成员国通过确保商品价格反映出负面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转向绿色经济发展。例如，用针对贫困人口的财政援助取代主要惠及富裕人口的高昂的能源价格补贴，有助于将资金用于社会和发展支出，同时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世界各国针对岌岌可危的全球经济复苏做出统一应对，是目前最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全球发展在联系日益紧密中的脆弱性，使得上述工作势在必行。欧元区的问题以及美国复苏乏力，对全球信心带来了连锁反应。新兴市场的增长放缓；低收入国家非常担心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商品价格的波动；整个中东地区的挫折感不断加剧。只有我们携起手来，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复苏再度受挫的问题。

培育健全的经济和金融管理，是 IMF 为可持续发展所做的最为重要的贡献。这将为良好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种经济增长有助于创造就业、产生保护贫困人口利益和保护环境的资源，最终赢得和平稳定的局面。我们随时准备与我们的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将这一全球议程推向新的高度。■



发展中国家正在重新评价
贫困的定义

一名男子在印度普什卡骆驼交易会上使用手机。

相对难题

马丁·瑞沃林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上升的平均生活水平引发了人们对贫困定义的重新评价。作为响应，一些国家已经提高了其贫困线（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个人或家庭视为贫困）。例如，中国的国家贫困线最近从日收入 90 美分翻倍达到了 1.80 美元（调整反映 2005 年的不变购买力）；包括哥伦比亚、印度、墨西哥、秘鲁和越南在内的其他国家，最近也提高了各自的贫困线。

这些修订不足为奇。在任何特定环境下，只有当贫困衡量标准与该环境中的主流贫困观点相符合时，才会被接受。持续的整体经济增长无疑会使更多的国家提高贫困线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今大多数富裕国家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这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监控整体的与贫困作斗争的工作意味着什么？贫困线也应该随着平均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吗？

进展评价

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一个古老的争论——贫困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绝对贫困线旨在表示商品在不同

时间和不同地点的不变购买力。举个例子，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为日收入 1.25 美元，这一贫困线按照购买力平价定义转换为各国的本地货币；而现行的相对贫困线设定为特定国家或特定年份家庭平均（或中等）消费或人均（或等量的单身成年人）收入的定比。西欧使用的贫困线便属于典型的例子。

衡量方式的选择与反贫困斗争进展评估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可能性的政策讨论密切相关。实际上，当贫困线使用实际条件确定时，任何标准贫困衡量尺度都将在一个所有收入成比增长的时期自动下降。但当贫困线设定为平均收入或消费的定比时，同样的增长过程将对贫困衡量尺度毫无影响。

中低收入国家倾向于选择绝对线，而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则喜欢选择相对线。较富裕国家倾向于使用更高的贫困线。这种对于选择较高国家贫困线的偏好可以称为“相对者梯度”。

图 1 按照大约 100 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消费情况绘制了国家贫困线。国家贫困线最高的是卢森堡，为日收入 43 美元；而与其消费水平不相上下的美

国，贫困线却只有日收入 13 美元。随着消费水平下降，相对者梯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大约 20 个最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为日收入 1.25 美元，这是世界银行设置国际绝对线的依据。即使在使用绝对线的发展中国家中，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往往设有比绝对线较高的实际贫困线。通过这些国家看来，贫困确实是相对的。

社会标准

发展专家考虑的问题是，全球的贫困监测是否应该允许贫困线随着平均收入的变化而改变。答案取决于如何解释图 1 中的国家贫困线梯度。

人们可将贫困线看作特定环境下人类的潜在福利概念的折算金额——一个可以在不同环境下变换的社会标准。在任何环境下，只有当贫困衡量标准与该环境中的主流贫困观点相符合时，它才能被接受。富裕社会和贫困社会之间的标准全然不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然而，较贫困国家使用较低的实际贫困线意味着对于处于相同生活水平的两类人的判断，即他们的收入可以购买等价的商品和服务，但最终还是根据他们生活的地域和时代差异区别对待。这种不一致导致过去侧重于利用常见的真实贫困线（如日收入 1.25 美元）来衡量绝对贫困。

然而，对于富裕国家为何使用较高的贫困线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以福利的“社会影响”为根据的观点。

使用绝对线即认为个人福利依赖于个人自身消费。在此观点中，一个人的生活地点与此人是否被认为贫困无关，因为绝对线代表国家统一的真实消费水平。相比之下，相对线则包含了随某些环境变化的社会性福利决定因素。在这个视角中，该贫困线反映了相对性匮乏的福利效应——尽管两人拥有相同的实际收入，一个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会感觉更糟——社会融入成本，意即在一个富裕社会，他比在贫困社会需要更多的支出以融入社会。在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发现表明，在个人福利问题上，存在社会效应。

因此，关于图 1 存在以下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根据社会标准的解释，个人福利仅取决于个人消费。相对者梯度源于在确定贫困者时，富裕国家愿意使用更高的福利标准这一倾向。

社会效应解释不需要不同的标准，但，反过来却是以生活在较富裕国家需要更高层次的消费以达到同等水平的福利作为条件的。这样一来，固定在同一福利水平上、表示福利处于同等水平上的贫困线将会随着国家平均消费水平的上升而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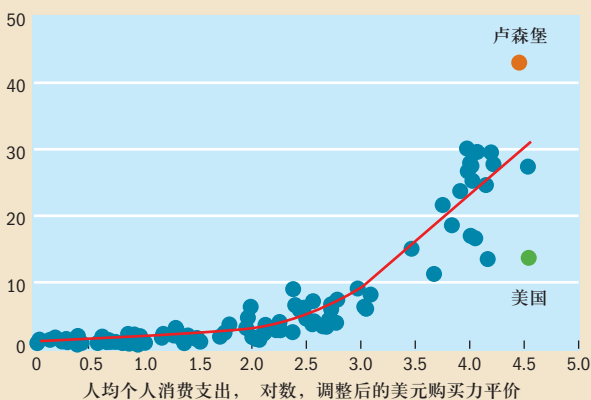
诚然，福利的社会标准和社会效应之间这种微妙的理论区别对于全球的贫困衡量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社会标准的解释指引我们走向绝对衡量，而社会效应则让我们趋向相对贫困的概念。哪种才是正确解释，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促使我们在衡量全球贫困时，必须对两种方法进行综合考虑。

图1

相对贫困

贫困国家采用的国家贫困线一般明显低于富裕国家的贫困线。富裕国家对于更高贫困线的偏好被称为“相对者梯度”。

(国家贫困线，每人每天，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美元)



资料来源：Chen和Ravallion (2012年)。

注：此数据涵盖了100多个国家。1990年后，贫困线的设定依据时间有所不同。所有的贫困线都以购买力平价常数表示，这样的话，1美元在每个国家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是相同的。在世界银行线中，约20个最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为1.25美元/天，低于此线者视为绝对贫困。随着国家人均消费量增长而上升的红色线代表相对者梯度，即富裕国家对于更高贫困线的偏好。

相对贫困的全球衡量标准

对于分析家而言，问题在于如何为相对贫困设计一个合理的全球衡量标准，以弥补主流绝对衡量标准的不足。将相对贫困设置为平均收入的定比需要进行一些不合情理的假设。特别是，它需要假设人们仅仅关心相对损失（这样他们自己的消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是独立于相对消费的）或假定社会包容成本在最穷的地方几乎为零。

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已经制定出了新的贫困衡量标准，此标准将对福利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Ravallion和Chen, 2011年)。严格来说，这些新标准被称为“弱相对”衡量标准，它意味着，贫困线是随着平均收入增加而提高的，但并不与该收入成定比。这也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包容”的反向衡量标准，生活在弱相关线之下的人数越少，意味着越多的人达到了其所生活社会的社会包容要求。每个国家都有两条贫困线，即一条日收入 1.25 美元的绝对线和一条更高的（或者至少不低于日收入 1.25 美元的）、旨在反映相关国家较高社会包容成本的相对线。在最贫困国家，第二条线同

样是一条绝对线。

与上述相对者梯度相符合的弱相对衡量标准已经建立，并且也有证据表明其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的主观感知。弱相对论从最近的一些迹象当中也得到了证实，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概念正在改变。这并不一定代表更高的福利门槛，相反，这也许代表，获得同等水平的福利需要更高的收入。

当把这个新方法应用于数据时，我们发现，47%（几近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相对于2008年来说更加贫困了。在这47%中，22%的人口生活水平低于日收入1.25美元的绝对线。

从另一个角度看，高收入国家2008年的相应相对贫困率为24%（计算依据一致）。然而，从可用数据可以确定的最佳数值来看，高收入国家中上述24%的人口没有人日收入低于1.25美元（尽管一些非常贫困的人，尤其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可能未被列入抽样调查范围）。

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比率已经下降，从1981年人口总数的63%降到了2008年的47%（Chen和Ravallion，2012年）。但是，尽管比例有所下降，总人口数量的增长又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总数量在这段期间上升了大约3.6亿。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率也有所下降。1981年，生活水平低于1.25美元的总人口比例为52%，而2008年则为22%。2008年，日收入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总数是13亿，而1981年则为19亿。不同区域发展并不均匀，但在21世纪，绝对贫困人口数量

在所有地区均会下降。

图2显示了1981—2008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人口数量。1981年，80%以上的相对贫

与绝对贫困斗争的成功可能会使得相对贫困扩大。

困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但在2008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不足一半。

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战胜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而不再是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较低的绝对贫困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意味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相对贫困的考虑更为重要。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自然逐渐减少，并且更加重视不平等的现象。相对贫困人口数量上升在另一方面即意味着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成功到来了，但是这一成功的意义当中带有一些变化。

与绝对贫困的斗争

放弃与绝对贫困斗争对于那些仍然靠着每天少于1.25美元的收入生活的10亿多人口来说很不公平，消除这种极端贫困应当是全球发展社区的首要课题。但是，世界瞬息万变。全球生活标准的趋同伴随着我们对于贫困的意义的看法的趋同出现的——尽管这可能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贫困线已经达到了美国标准，更别说卢森堡了。新的贫困目标无疑会反映出这些新观念。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同时也能意识到，对抗绝对贫困的成功可能会使得相对贫困的行列扩大，但这并不会转移我们帮助世界上最贫困人口摆脱极度贫困的努力。■

马丁·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是世界银行研究部主任。

参考文献：

Chen, Shao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2012, "More Relatively-Poor People in a Less Absolutely-Poor World,"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114* (Washington).

Ravallion, Martin, 2012, "Poverty Lines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ed. by Philip N. Jeffer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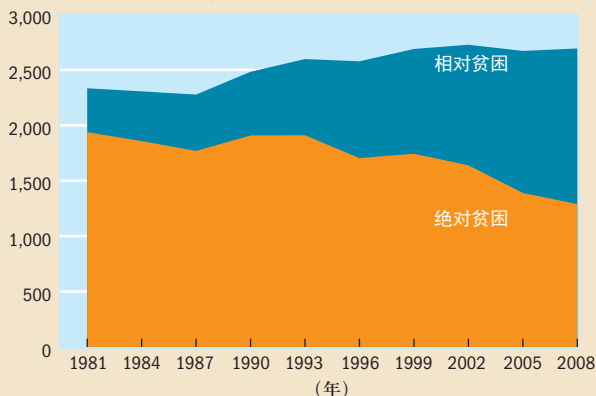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2011,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3, No. 4, pp. 1251-61.

图2

趋势不同的报告

近年来，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明显下降，但是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却有所上升。

（贫困人口数量，百万人）



资料来源：Ravallion（2012年）。

注：日收入低于1.25美元（如果换算成各国本地货币，能够在所有国家买到相同数量的商品和服务的收入值）者视为绝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是指个人收入低于某一社会可接受标准，该标准可能远远高于每天1.2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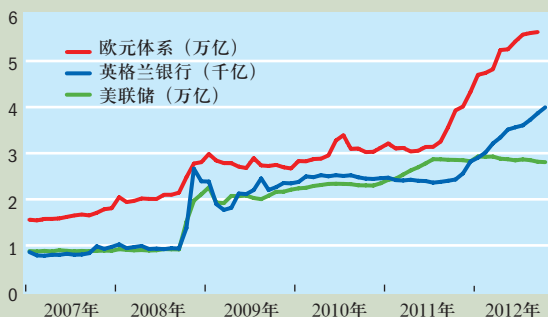
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

几个主要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牵制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已急剧膨胀。这些央行发现它们正处于一个政策窘境。它们很难通过进一步降低利率来遏制经济衰退，因为利率本身已经非常低了。因此，只能采取非常规政策，旨在稳定金融市场和通过刺激总需求以扭转经济衰退。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央行的总资产飙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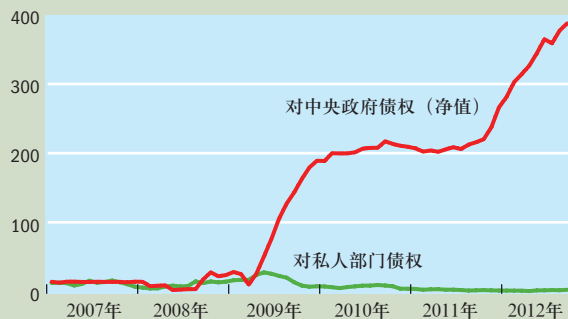
(总资产，月末值，本国货币)



注：欧元区体系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国家的中央银行。

英格兰银行购买了政府债券。

(月末值，10亿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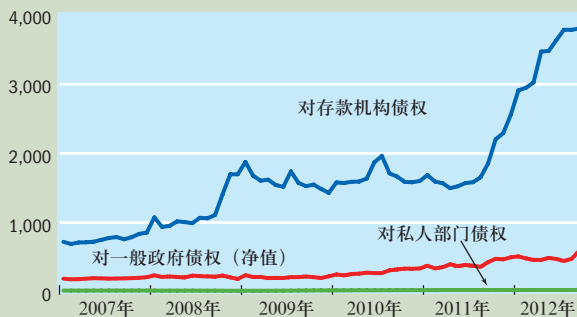


虽然各央行实施的方法不同，但这三大央行均积极采取行动，向其经济注入流动性，促进增长。英格兰银行实施了有针对性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集中在购买政府债券。自2009年3月，英格兰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券（称之为“金边债券”）的总额已达到GDP的14%。欧洲央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长期融资计划以及对主权国家的有限的证券市场计划。而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则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证券，以降低长期收益率，尤其是住宅抵押贷款利率。

尽管侧重点不同，不过实施这些措施给这三大央行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结果：使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快速扩大。自2007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以来，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380%；欧元区则迅速增长了241%；美联储则扩大了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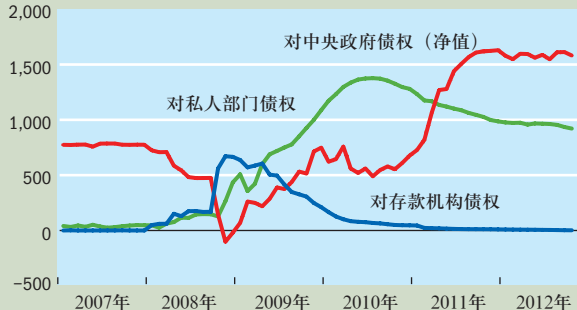
欧元区体系向银行提供了更多信贷。

(月末值，10亿欧元)



美联储购买了政府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月末值，10亿美元)



有关数据的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自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194个国家的所有有关国际和国内金融领域的现有的统计数据，可在<http://elibrary-data.imf.org>查询。

本文由IMF统计部的里卡多·达维科 (Ricardo Davico) 和布莱恩·约翰·戈登史密斯 (Brian John Goldsmith) 撰写。

躲避风暴

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大部分国家总体上幸免于持续性的欧元区危机，但这种局面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巴斯·B.贝克尔、克里斯多夫·科林根

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大部分国家总体上幸免于持续性的欧元区危机。金融市场的焦点一度集中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最近还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但却没有波及 22 个位于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见专栏），虽然它们与欧元区联系密切。

和过去截然不同，投资者们经常要求这些国土面积较小、影响力相对小的欧洲国家提供低于那些西欧大国的债务风险溢价：爱沙尼亚的风险溢价有时就低于荷兰的债务风险溢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风险溢价也低于意大利和西班牙。

几年前的情形则不同。当时，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来袭造成的西欧动荡，迅速波及中欧和东欧的经济体。该地区曾经拥有过多年的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欧提供的宽松信贷。但随着 2008 年 9 月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欧元区国家银行突然停止了新的放贷业务，绝大多数中欧和东欧经济体的国内需求急剧萎缩。全球贸易的大幅滑落使危机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出口遭受猛烈冲击。最终，该地区国家在 2008—2009 年间出现了空前的经济萎缩。直到 2010 年经济开始复苏时，一些国家的 GDP 下降幅度甚至达到了 25%（尽管这些国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阿尔巴尼亚和波兰，躲过了这场劫难，相对来说毫发无伤）。

除了 2011 年后期遭受的恐慌，该地区的国家基本上未再受到开始于两年前的欧元区危机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如今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分依赖西欧银行提供的宽松信贷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同时也是因为

它们采取了控制政府赤字的措施。

联系依然紧密

看似能够避开欧元区动荡的情况确实正在发生，尽管西欧与东欧国家一直联系紧密。自从 20 年前苏联解体后，西欧和东欧之间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交往日益频繁。

西欧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有些出口商品正是西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已经是向西欧的最终产品生产商提供原材料的供应链上的一部分。例如，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就在中国设厂，并将其部分生产转移至此。

贸易联系对中欧地区尤其重要，尽管它们中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如俄罗斯和乌克兰，与非欧洲国家的贸易量非常大，但它们的出口商品在西欧经济体畅销与否影响着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相比之下，东南欧与西欧的整合程度较低。

在欧元边境

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中欧的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以及斯洛伐克共和国，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科索沃、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共和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以及东边的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位于欧洲和亚洲交界处的土耳其也属于这一区域。



位于波兰华沙市中心的购物休闲中心。

但是，贸易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越重要，金融联系——主要是经由银行——就依然越重要。不管是在所有权关系和还是融资关系上，该地区的银行体系与西欧银行之间的结合非常紧密。

在白俄罗斯、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境内，外资银行（这里指境外实体所占股份超过 25%，并且为最大股东的银行）占据了大约 35% 的市场份额；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以及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外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高达 80%。相比之下，外资银行在欧元区的平均市场份额不到 20%。

然而，外资银行并不一定是依靠国外的资金。例如，外国银行在捷克共和国占优势地位，但是他们却都是本地投资运营，大部分是通过存款的形式，这样他们就不易受到外国——此处系指其总行——资金链突然断裂的影响。

但是，外资银行的跨国投资对于该地区许多经济体的经济运行还是很重要的。截止到 2011 年年底，这些资金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 GDP 总量中所占比例达 30% 以上（见图 1）。这些投资以西欧总行集团为其当地分支机构的运营提供资金，以及直接向大公司提供跨境借贷的形式进行。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尽管外资银行的市场渗透率相对较低，但本地银行还是经常从国际同业银行和债券市场借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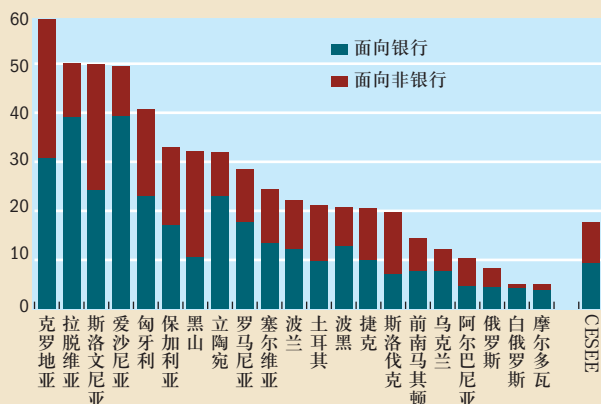
用以补充存款，从而给国内贷款提供资助。

这些唇齿相依的金融联系意味着源于西欧的动

图1
紧密联系

主要外资银行向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银行以及非银行类借款人提供数目巨大的跨境投资。

（发达经济体银行贷款在投资接收国GDP中的占比，2011年第4季度，%）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地区银行统计》、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这些贷款系由拥有国际运营业务的发达经济体银行提供，其中央银行将信息报告给国际清算银行，再由国际清算银行对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国际清算银行是各国中央银行的央行组织，科索沃的相关数据没有提供；CESEE指中欧、东欧和东南欧。

荡严重影响着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而这正是2008—2009年间所发生的事实。雷曼兄弟破产之前，西欧总行忙着为迅速扩张的国内借贷筹资，这刺激了资产价格的飙升和国内需求的增长。但是当全球危机重创西欧时，这些资金流动戛然而止，使得该地区陷入了深度衰退，直到2010年面向西欧的出口复苏，这种状况才开始得到缓解（见图2）。

虽然东西欧之间存在着这些紧密的联系，但这场已持续两年的欧元区危机带来的影响还是与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不同。随着借贷成本在欧元区的外围国家——首先是希腊，接着是爱尔兰，然后是葡萄牙——无情地疯长（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担忧也在上升），尽管中欧和东欧已经从深度衰退的困境中脱身，针对这些国家的相对借贷成本继续保持平缓或者还在持续下降。

该地区在最近的欧元区危机中只受到很小的影响主要是归功于不存在很大的不平衡。2007—2008年间，该地区在面临资金流入突然中断的时候显得非常脆弱，因为这些国家从国外（主要是西欧的银行）借了数目可观的外债来为经常账户赤字筹措资金。但是到2011年，这种失衡状况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消失了（见图3）。今天，经济没有过热，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出口而不是得益于国外资金流入形成的国内需求繁荣。

这些国家也开始着手一些能够减少财政赤字的项目。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前期阶段，尽管一向是繁荣风向标的税收收入出现了上升，给人们制造了一种财政状况强劲有力的错觉，但公共财政是脆弱的。繁荣的终结清楚地表明，税收收入大部分都是暂时的：

2009年，该地区的财政收支平衡由占GDP 2%的顺差下滑到了6%的赤字。但到2011年，大多数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巩固措施，该地区的财政赤字减少到了GDP的0.5%。

当然，很多国家仍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巨额的外债再融资需求使得借贷需求高企不下，而大量的外币贷款则对外汇价格和货币政策造成了束缚。俄罗斯和乌克兰就仍然备受商品价格下滑的影响。虽然很多国家极力进行了财政整顿，但它们的财政赤字依然非常庞大。并且银行体系背着大批不良贷款的沉重包袱——这在2008年之前不曾存在过。

缓慢地蔓延

该地区经济重振的极限在2011年下半年受到了考验，那时正值欧元区问题升级之时。欧元区银行承受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作为应对措施，它们收紧了在国外的资金运营。从6月到12月期间，他们削减了对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投资的6.5%——相比之下，其同期针对非洲、中东和亚太地区的削减幅度为3%；而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则增加了2%。

尽管由于地方存款和当地银行贷款的增长，使得投资紧缩得到了部分抵消，但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黑山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的信贷依然属于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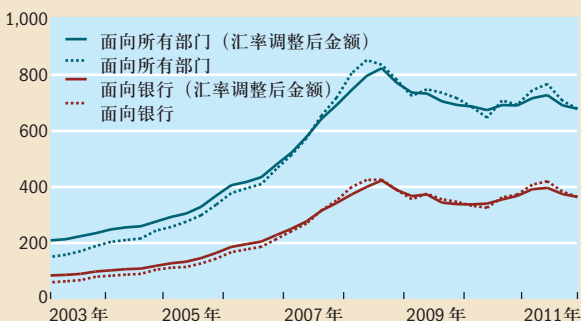
在2011年后期和2012年早期欧洲中央银行(ECB)向各银行提供为期三年的低息无限流动资金后，面向该地区的投资紧缩状况得到了缓解。2012年7月，欧

图2

资金收回

在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宣告破产为开端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大幅提高了向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提供的贷款。

（发达经济体银行给该地区提供的贷款，10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B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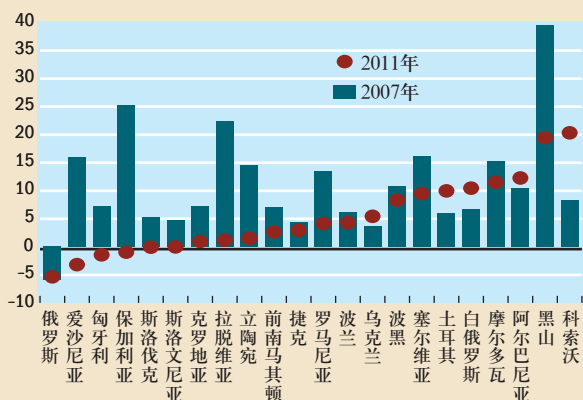
注：图中所包括的银行都是国际清算银行（一个国内中央银行的国际央行组织）成员国中拥有国际运营业务的银行。汇率调整的目的是在于尽量消除报告数据使用汇率换算为同一种货币（此处为美元）时发生的价值变化。

图3

正在消失的赤字

2007年，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持有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到2011年，该赤字出现了大幅萎缩。

（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经常账户衡量一个国家在出口、境外投资以及来自境外的现金等项目上的收入减去在进口、转移到国外所有人的境内投资收入以及转移到境外的现金等项目上的支出情况。

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会尽一切努力保护欧元”的承诺进一步缓解了市场焦虑和资金压力。

尽管金融市场近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今年这个从欧元区大衰退中脱身的时刻，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急剧下跌。IMF 在其 2012 年 10 月发布

现在，这里的情况比只能听天由命的 2008 年好很多了。那时受严重失衡的影响，该地区在面临资金流入突然停止时不堪一击，而现在早已今非昔比——来源于本国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然大大减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已经完全躲过危机了，它们


尽管金融市场近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今年这个从欧元区大衰退中脱身的时刻，……经济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急剧下跌。

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仅有 2.8%，与 2011 年相比将会下跌 4.9%。

另外，紧密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使得这一地区承受着欧元区危机再次恶化的风险。如果欧元区危机加剧，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将在贸易和金融两方面到严重的影响。如果欧元区经济大幅下滑，该地区的出口将会受损，金融市场环境将会加快收紧，总行投资将会成比例缩小，资本流入停止——这样又会进一步影响国内需求。

仍然受着西欧发生的一切的影响。尽管其重新恢复了应对能力，但是很快，它们又可能被淹没在持续恶化的欧元区危机中，这强烈意味着，重建缓冲区是一个持续的要求，并且需要做好在危机中磨练的准备。■

巴斯·B. 贝克尔 (Bas B. Bakker) 是 IMF 欧洲部顾问，克里斯多夫·科林根 (Christoph Klingen) 是该部门副主任。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3-2014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3.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1, 2013.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_programs/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



博格尤特·巴克布、杰斯明·拉赫曼

重构增长

西班牙马德里附近托莱多省的闲置公寓大楼。

为刺激增长，
欧元区必须将
积极的体制改
革与拉动需求
政策相结合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早就明白，欧盟经济亟需从根本上进行体制改革。意识到欧洲落后于美国，欧盟于2000年推出了“里斯本战略”，以期到2010年之前，让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体，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从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早在当前危机到来之前，时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让-克洛德·特里谢就写过：“欧洲改革的四大首要任务就是提供就业、增强竞争力、释放商业潜力以及建设一个创新的环境。”（OECD，2005年）

事实确实如此，根据我们的研究，产品和劳务市场改革带来的长期收益是巨大的，并且会给提高欧洲增长潜力提供一个极为需要的机遇。此外，同时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推动改革能够引发国家间的积极溢出效应。

正在肆虐的欧元区危机突出了改革的重要性，但也增加了实现改革的复杂程度。在没有独立汇率的情况下，当需要给个别国家提供相

对的价格调整时，体制改革必须先进行。但是改革往往要假以时日才见成效，而增长的需求却要求立竿见影。因此，为立刻实现增长和就业机会，就必须将长期性的体制变革与维持需求的短期措施相结合。为了不使这些努力付之东流，也为了恢复货币联盟的生存信心，欧元区必须走向更加彻底的联合。

不管是在欧洲的核心还是在个别国家的层面上，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采取了空前行动来应对这场危机。解决问题的各种要素已经具备，但是需要将其进一步实施。

问题因何而起？

造成欧元区某些国家经济停滞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采用统一货币后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严重失衡；二是竞争缺乏带来的缺陷，特别是在劳动力方面，自从启用货币联盟后，这种缺陷由于南部国家的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更加凸显。

劳动力市场中的招工难、解聘难、最低工资标准过高、集体工资

谈判以及特定市场的限制性准入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问题。

要提高增长率，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解决好失衡与竞争力缺乏这两大问题。

过去十年间，欧元区国家在追求增长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北部欧元区国家，例如德国和荷兰，是以出口拉动增长；而南部国家，如希腊和西班牙，则是依赖于内需拉动。我们毫不惊讶，北部和南部这两个实际存在的次区域在经常账户收支和相对价格（包括名义工资在内）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进步。南部国家的需求确保大多通过向北部国家借款来筹措资金。南部国家的经常账户存在巨额赤字，而北部国家就持有盈余。

一旦危机爆发，南部国家就要遭受双重打击：随着私人资本流动和信贷的增速放缓，它们不得不开始减少其累积的不平衡；同时，市场开始区分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抬高赤字国家的私人 and 公共部门的借贷成本。

南部欧元区国家的新就业机会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周期性部门，如房地产。这些部门随着经济繁荣带来的信贷快速增长风潮而迅速崛起。

随着信贷的枯竭以及经济的繁荣让位于深度的经济衰退，南部欧元区国家的失业率出现飙升。欧元区大相径庭的增长策略使南部国家陷入了大规模的失衡，背上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并且正常调整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国家扭转了一些失衡以及竞争差距，但是其进步大都通过劳务输出而取得。它们要做的是，对相对价格作出更多的调整。失业率程度之高仍然前所未有，市场准入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所以经济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见图1）。

这些都不仅仅是短期问题：它们是欧元区长期发展的根本性障碍。例如，意大利的能源价格在欧洲属于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反映了其有限的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而在西班牙，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改革不仅有助于提高其发展潜力，而且还能够加快就业的复苏。

这些体制性的缺陷阻碍了欧元区在过去的30年里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并驾齐驱，即使欧盟的发展较具有包容性。欧元区增长的下滑趋势反映了其大部分地区在生产率负增长现状，南部国家更是如此。此外，较低的劳动力利用率（或有效生产时间）——许多欧洲经济体的一个体制性因素——能够解释欧元区和美国在人均GDP上的诸多差异。

深层改革会带来变化吗？

欧元区的很多基本问题在本质上属于根本性问题，

所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体制改革——用以纠正经济的某些基本特性带来的长久性积累问题的措施。

举例来说，一些关于欧洲问题的研究报告表明，强有力的就业保护、丰厚的长期失业津贴和有益于提高就业薪水的集体谈判制度降低了生产力，继而使增长速度持续低迷。要想让雇主们对招聘负起责任，就必须在控制最低工资标准、分散集体谈判、逐步放开

要提高增长率，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解决好失衡与竞争力缺乏两大问题。

封闭职业、放宽职业保护以及增加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的某些体制方面做出改变。这些措施与包括降低利率或平衡预算等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工具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同的。

经验证明，降低竞争壁垒、提高商业环境等产品市场改革可以大幅提高增长率；而劳动力市场改革除了能够从长期推动增长和就业之外，通过在招聘和解雇方面给予雇主更多的灵活性以及控制工资增长幅度，还能够有助于价格调整，帮助国家恢复部分已经丧失的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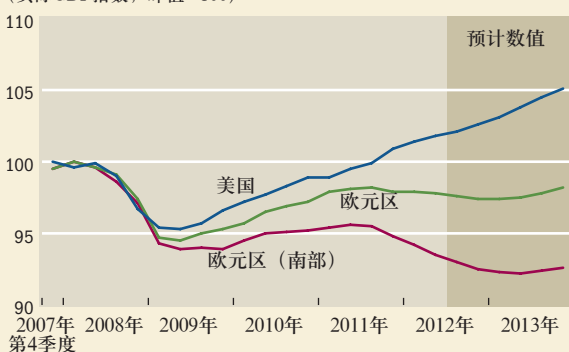
控制名义工资、利用税收来调整消费与劳动力之间的相对价格——这在技术上称之为“财政贬值”——能够加速再平衡的过程。跨部门的再分配可以通过在欧美核心国家层面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来支持，包括定向投资和对欧盟境内的资金资源进行杠杆调节。

欧洲的经验表明，体制改革能够产生强烈的回报（见专栏1），并且许多实证研究指向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改革对生产力、增长速度和就业的长期积极影响。

图1
扩大的差距

欧洲尤其是其南部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会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重大分歧。

（实际GDP指数，峰值=100）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为了对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进行比较，我们用IMF的全球综合货币财政模型（GIMF，见专栏2）对个别体制改革的输出效果进行模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确定了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以及养老金政策的最佳做法。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欧元区国家做出改变弥补其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政策与OECD的最佳做法之间的50%的差距，GDP每5年就会平均上升1.5%；如果同时推进产品市场改革，收益还会增加2.25%（见图2）。

其他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OECD发现，全面且具有魄力的改革在10年内将会使大多数欧元区

国家的GDP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OECD，2012年）。

这些潜在收益是巨大的，但实现它们所需的努力同样巨大，并且短期回报很少，特别是产品市场改革，它需要时间来落实实施。由于产品市场比劳动力市场更加落后于最佳做法，所以，在该领域集中进行改革似乎会产生更高的回报。

我们的模拟结果同样指出，大范围的改革能带来非常大的相互加强效应。例如，一个仅采取措施缩小其劳动市场差距的国家，所获得的增长将会小于一个同时还致力于缩小产品市场差距的国家。

另外，主要通过加强贸易和提高生产力溢出，一个国家的改革也能帮助其他国家，西班牙对其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会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增长产生积极效应。总体来说，分析表明，南部国家从北部国家的改革中的获益程度高于后者从前者的改革中所获得的利益，这是因为，北部欧元区国家拥有更大的经济体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但在当前的经济衰退时期，改革不可能给短期行为提供充分的推动力。在经济衰退时期实施改革或许比在经济形势好时更难。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等体制改革针对的是提高竞争和生产力，从而加强一个国家的供应，如果总需求疲软并且产能过剩，在短期内也可能毫无回报。

例如，采取就业保护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刺激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却可能增加失业，因为雇主们可以不用受到处罚就解聘过剩的工人。同样，减少失业保险或提高退休年龄可能会削减那些被迫去找工作而并未找到的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但是，这些变化对于恢复趋势增长至关重要。

专栏1

改革的回报

20世纪80年代的荷兰和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给我们提供了改革能够扭转经济发展颓势的例证。

改革之前，这两个国家经历了持续低于平均水平的经济发展，当经济的低迷因大衰退（荷兰，1980—1982年）或银行危机（瑞典，1990—1992年）而进一步加剧时，两个国家对政策作出了一些改变。在10年间，它们实行了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供给方面的变革。其公共支出占GDP比率显著下降，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税收也随之减少；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工作的积极性增加；产品市场的改革提高了竞争力。瑞典在20年里经历了快速增长，荷兰也因其就业神话而闻名于世界。

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第一，改革因国家而异。荷兰的改革聚焦于提高其低迷的就业率（工资增长过快的结果）；而在瑞典，改革的重点则在于刺激其低迷不前的生产率增长（受过时的产业与过度的监管所拖累）。在瑞典，由于货币贬值，该国对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大幅向下调整，这对瑞典经济的重新启动起到了助力作用。尽管如此，两个国家的改革依然存在相同点——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高竞争力以及改变激励机制。

第二，改革需要随时间而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瓶颈期。荷兰最初的问题是劳动力需求不足，所以政策均集中在降低工资成本上；随着工作岗位的增加，改革转向刺激劳动力供应。

第三，改革的全面效果随时间而增强。

专栏2

模型

全球综合货币财政模型（GIMF）是一个广泛使用于IMF内部和一小部分中央银行的通用均衡模型，主要用来分析一些国家的政策和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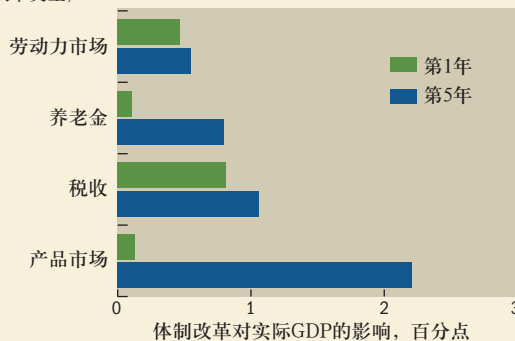
GIMF的传统优势就在于它能有效进行财政政策分析和宏观金融联系研究。

图2

让改变发生

如果欧元区国家能够实行与OECD的最佳做法相匹配的改革，其GDP就会大幅上升。

（改革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IMF的全球综合货币财政模型的计算结果。

政策选项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要应对低迷的趋势增长背景和一些国家的竞争力问题以及为削减非可持续性债务和巨额赤字以满足巩固财政的需求，欧元区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但在南部国家，试图按照建立在活跃的国内需求基础的危机前模式来走出危机，只能是一个幻想。已经证实，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战略。

首先，体制改革应该尽快实施，因为改革成果不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国家，尤其是南部国家，在几年前就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步，但在现实和可能的增长最大化标准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巴克布（Barkbu）、拉赫曼（Rahman）和巴尔德斯（Valdes）对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步进行了讨论，并为所有欧元区国家提出了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改革重点。

在南部欧元区国家，体制政策必须提升贸易商品的生产效率以帮助其恢复竞争力；在其他国家，政策应当打开服务部门的商业机遇，促进潜在增长。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应当根据国家情况执行，南部国家应该对相对价格进行调整，而北部国家则应当提高劳动参与率。

其次，为避免难以逆转的过度严重收缩，这些改革必须辅以能在短期内增加总需求的政策。这不是简单的财政刺激建议，而是消解改革执行中种种阻碍因素的方式。这和市场压力严重处的快速财政巩固措施以及其他地方的逐步巩固措施一致，允许自动稳定机制发挥作用，并且也考虑到使调整尽量有益于增长。

如果相对价格得到进一步调整，欧洲境内减少不

平衡度会降低对经济活动的破坏性。

自从货币联盟启动，南部欧元区国家物价和劳动力成本的更多的快速上涨又使其失去了竞争力。尽管部分竞争力差距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了扭转，但是要把额外的外部需求引导向南部国家并且保全统一的货币，还需要更多的竞争力。

南欧的价格上涨速度必须慢于北部国家，这就要求南部国家抑制名义工资，而北部国家要让工资与生产力保持一致（见图3）。

再次，欧元区要毫不犹豫地走向更彻底的联合（见IMF，2012年）。最近的政策进步已经缓解了危机，在此基础之上的建设需要欧洲兑现其已经做出的承诺：建立更多的泛欧洲支持政策，修补已经破损的货币传导机制。

在2012年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达成的关于银行联盟的第一要件，即一个独立的监管框架，必须得到实施，并且要辅之以一个覆盖全欧元区的存款保险计划和拥有充分的统一保障系统的银行解决机制。

为了减少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荡波及到整个欧元区的趋势，银行联盟需要更强大的财政一体化，也就是将更加强劲的中央治理与更多地风险共担结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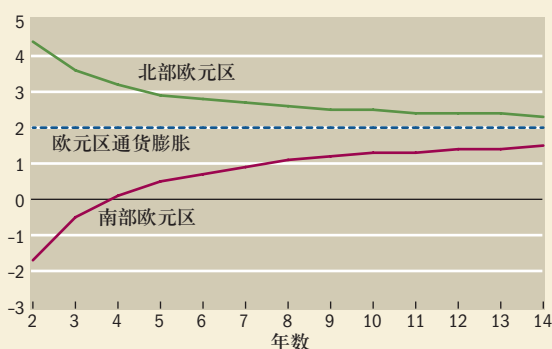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国家在纠正以往错误的过程中，不管是如何明智的策略，其当前的表现都难免不尽如人意。该地区必须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修补，并减少过度借贷，因为这会给经济活动带来短期的消极影响。银行去杠杆化——危机前信贷繁荣期的一个必要退绕——更高的私有部门存款和旨在减少债务和赤字的不可避免的财政巩固措施将仍然是妨碍增长的强劲逆风。

结合刺激增长，修补竞争力差距的体制性与选择性需求政策，政策制定者们建立一个更加坚固的联盟的承诺将会提升信心并且支持复苏。■

博格尤特·巴克布（Bergljot Barkbu）和杰斯明·拉赫曼（Jesmin Rahman）均为IMF欧洲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图3
扭转差异

为了改变失衡状态，北部国家必须提高通货膨胀，而南部国家则需要降低通货膨胀，从而把前者的需求引向后者。（北部和南部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的信息公告系统；作者的计算。

注：图中为通货膨胀率（与2%的欧元区平均值一致）与自1998年以来需要弥补实际有效效率汇率累计差距的年数的组合。

参考文献：

Barkbu, Bergljot, Jesmin Rahman, Rodrigo Valdés, and a staff team, 2012, "Fostering Growth in Europe Now,"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2/0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2, Euro Area Policies: 2012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IMF Country Report 12/181 (Washington).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5, OECD Observer (Paris).

———, 2012, OECD Economic Surveys: Euro Area (Paris).

日本青年 畅所欲言

IMF、日本财务省与日本中央银行联合举办了一次面向日本大学生的作文比赛。该比赛要求参赛者写一篇关于全球经济和 IMF 作用的文章。三名获胜者受邀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 IMF 与世界银行 2012 年年会上的青年对话。IMF 副总裁奈梅特·沙菲克 (Nemat Shafik) 和全亚洲的青年代表出席了本次对话。



介田智子 (Tomoko Kaida)，日本金泽大学国际学专业学生。她与别人共同发起了一个旨在促进在日本留学和经商的外国侨民与本地居民的相互理解的非盈利性机构。

作为一名身处全球经济危机时代的年轻人，确实非常令人沮丧。你就像一个透明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兴趣和未来岌岌可危，但却毫无办法去左右局面或参与事件的发展。

发达国家的年轻人觉得，他们有可能已经被剥夺了像其父辈和祖父辈所拥有的机遇；与之同时，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则失望地认为，他们的未来不如所期待的那样光明。

我想说，这概括了年轻人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状况所持的观点。

除其他事情之外，IMF 拥有一项明确的任务——提升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它利用各种手段，使财政保持稳定，缓和各国（及其人民）的经济状况，并使其免遭货币政策失败的影响。因此，IMF 在全球经济稳定中的地位与责任都非常重大。然而，尽管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发展（比如 IMF 青年对话倡议），但在 IMF 的政策和实践中，“青年因素”还是太少。虽然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在整体上对其国民（包括年轻人）的就业具有正面影响，但这远远不够，IMF 应该更加

关注年轻人。

事实上，IMF 应该继续向前，并将我所说的“国家青年政策条件规约 (NYPC)”融入其贷款业务中。今天，当贷放资金时，IMF 就会寻找愿意调整其政策来应对潜在问题并有能力偿还贷款的国家。IMF 的视野应当跳出以往的经济政策范畴。希望在将来获得 IMF 支持的国家应该展示其已经拥有（或者即将拥有）的、有利于青年发展的经济政策，并且表明他们将把从 IMF 获得的贷款的一部分用于为年轻人创造机遇。广泛的青年就业计划、正规教育和职业项目等应当得到关注。

此外，应该指出，这一概念对 IMF 而言具有经济逻辑优势，通过将 NYPC 融入其贷款政策，IMF 可以刺激国家投资到能够（可能）偿还借款的一代人身上。这样一来，IMF 就能保证其贷款可被收回，这在本质上与其长期商业利益是一致的。同时，贷款国的年轻人也会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感。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会说：“是的，我们记得，这其中的一部分以及 IMF 提供的贷款投资到了（我们的）未来上，我们相信这是合法债务——我们确实从中受益。”

总而言之，IMF 扩大青年在应对当今令人担忧的经济问题上的作用的尝试已经引起了注意。人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 IMF 团体对青年负责，我把这种自由的洗礼称为“IMF 全球青年责任 (Global Youth Responsibility, GYP)”。对此，全世界的年轻人正在翘首以待。■



瀧永大典 (Daisuke Gatanaga)，耶鲁大学化学系学生；2011 年夏求学于日本京都；2012 年夏，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学习期间，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实习。

作为耶鲁大学化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我承认自己平时过于关注自己的电子和质子的研究学习，而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但这个夏天，我走出封闭的化学实验室到 WFP 实习。工作中看到的场景令人触目惊心，也令人十分担忧。在萨赫勒地区，母亲们将非煮

沸不能食用的有毒植物煮沸，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千方百计地提供给他们的孩子；在南苏丹，整个粮食歉收地区爆发了暴力事件，这使当地的人们对未来和生存

IMF绝对不能忘记，经济会影响每一个真实的人。

陷入了绝望。高通胀、不断上涨的食品和燃料价格以及动荡的全球市场等经济状况加剧了袭击全世界的粮食危机。

大部分时间都舒舒服服地住在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我，几乎不能理解这种连基本的生存必需品都会缺乏的不幸。或许我应该感到欣慰，在最近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我们家遭受的最大灾难只是我父亲去年丢了工作而已，但即使在当时，我们全家都沉浸在彻底的恐惧和悲伤中，因为我父亲面对的是看上去冷酷无情的就业市场。

我不敢声称自己能够提出什么开拓性的建议来解决这些经济难题，但在WFP的实习经历和我父亲的失业经验让我看清了当今的全球金融体系和这场金融危

机的真实状况。尽管经济危机在各国反响不尽相同，但很显然，尤其是从2007—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出，危机的大旗已经插遍了世界。鉴于国际化趋势使得一国的经济与国际网络不断地连接在一起，像IMF这样的国际机构必须在宏观审慎监管以及确保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很关键的是，IMF不能忘记——在这些用于货币监管和分析的客观数据和计算结果中——经济影响着每一个真实的人，这些统计数据代表着人们真正的声音。

我坚信，IMF充当着一个核心媒介的角色，通过它，全世界的人们——包括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参与双边谈话。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货币机构，仅IMF提供了这样一个论坛，让不同背景的人都参与其中。只有当人们感觉到，在将来与自己存在利害关系，拥有发言权，他们才会愿意参与国际合作和理解，或者才希望消除在信息、交流以及在以往经济危机的透明度上存在的不足。我的结论就是，在一个联系不断加强的世界当中，IMF给我们提供了基础，据此，我们可以带着积极的态度看待未来，因为我们会竭尽全力加强国际货币合作。■



仲田健治 (Kenji Nakada)，一名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的大学生，来自日本静冈市，曾在花旗银行、《经济学家》杂志社和日本中央银行实习。

在这篇文章中，我所提出的论点是，作为一个国际对话平台，如果IMF再进一步完善，就能够为国际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首先，我将指出全球化给经济环境带来的几个变化；然后，我会援引一个IMF本可以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最近的国际货币问题进行论证；最后，我会提出几点改善意见以确保其能够作出强有力的贡献。

全球化使得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在这其中，“三D”现象（依赖 [dependence]、多样性 [diversity] 和争端 [dispute]）非常普遍。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中，各经济体相互依赖，各个团体又不失其多样性。而依赖和多样性往往又带来了争端。自当前的金融危机爆发起，全世界关于汇率机制、跨国资本流动、银行监管和经常账户失衡的经济争端不可胜数。新一代将不得不通过共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争端，我相信，解决的关键在于第4个“D”——对话 (dialogue)。国际对话能提高国家间的相互理解，而这正是金融稳定的基础。

在最近发生的一次关于货币政策的争端中，IMF本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为应对这场持续发展的危机，

工业化国家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支持增长。一些新兴经济体声称，这些政策引起的资本溢出对它们有害而无利，因为这诱发了通货膨胀。在我看来，工业化国家的货币权力机构应该认真对待这些抱怨，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倒退会通过出口严重影响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比如，在20国集团会议上，IMF本应该首先提出国际政策协调理论，使货币政策在工业化经济体内更有效率，同时对新兴经济体的危害更小。

IMF正适合这种角色，因为相对于其他国际性金融机构，它拥有两大优势。首先，在第四条磋商的支持下，它拥有杰出的研究能力。在其本身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它能提供关于经济形势的一致解释，从而能够建立起国家间对话标准。另一个优势在于，它拥有雄厚的资本。它可以通过提供财政捐款来推动合作政策，而且，它是现存唯一能够提供这种激励的机构。但即使拥有这些优势，IMF还是要进行改变，它必须加强研究能力，从而解决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并且对于IMF来说，树立真正公平和中立的形象至关重要，这样，其研究结果和提议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如果作出了这些改善，我相信，IMF就能够为稳定金融体系发挥更好的作用。

全球化进程越快，IMF促进国际对话的作用就越重要。借助这一角色，IMF可以鼓励全球货币体系所有人之间的合作；并且，这还可以帮助各经济体从全球化中获益，避免经济下滑。我坚信，这将会带来金融稳定和更为健康的世界经济。■

信贷与福利间的得失权衡

莫妮卡·普拉萨德

过度消费的国度

美国的富裕与贫困悖论

哈佛大学出版社,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12年, 344页, 39.95美元(精装)。

便捷信贷一直是美国选择成为福利国家以外的另一种方式。由于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选择通过提供方便的信贷来促进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 美国成为了比西欧各国拥有更多贫困人口, 在福利方面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以上便是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者莫妮卡·普拉萨德在其富有吸引力的新书中所表达的观点。

在新书中, 普拉萨德阐述了美国过去120年间的经济发展历程,

从政治上讲, 美国并非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美国的经济史拥有很强的干预主义色彩。

分析了美国的信贷、税收、消费、监管、福利国家的发展、利益集团政治、生产过剩和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美国与欧洲大陆地区所存在的差异。她认为, 从政治上讲, 美国并非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美国的经济史拥有很强的干预主义色彩, 与法国、德国或北欧诸国相比, 美国的监管更多, 并更多地实行累进制税收制度。

欧洲各国, 特别是自“二战”以来, 开始建设精心设计的福利国家, 提供全民医疗保健服务、大量



公共养老金和社会保障, 并对社会支出进行重新分配。与此同时, 美国则利用监管和税收政策来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普拉萨德认为, 这种信贷和福利之间权衡的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是, 欧洲各国抑制了工资和消费水平的增长, 促进了对社会支出的更大投资; 而美国则形成了一个在福利方面不完美的国家, 使其贫困人口的数量相对更多。

普拉萨德将这种差异归结于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农业生产过剩, 这种状况导致美国经常出现通货紧缩和大型工业企业的同步

增长。这又进而促使平民主义者等土地改革者及其后来者主张加强监管和实施累进所得税制, 而不是更加有效的累退消费税制。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实施的改革进程(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到修义龙, 再到富兰克林·罗斯福), 导致信贷的过度民主化, 普拉萨德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经济增长推动力称为“抵押贷款凯恩斯主义”。

丽莎·泊丝·科恩(Lizabeth Cohen)和梅格·雅各布斯(Meg

Jacobs)等历史学家认为,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在内的美国总统专注于提高大众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 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便捷信贷(从联邦住房和大学贷款计划, 到分期付款购买和信用卡等私营部门的创新)在促进美国繁荣方面的作用也是人所共知。

普拉萨德的成就在于, 她进一步深化了上述观点。首先, 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美国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促进消费, 在市场监管(从食品安全到银行体系)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国家。其次, 她阐释了美国政府竭尽全力地促进住房、大学和其他消费的个人贷款, 包括联邦住房管理局制定的低首付长期抵押贷款政策, 以及可扣除抵押贷款利息税(以及其他类型的利息)的税收政策。第三, 她认为, 由民主党和农业州共和党组成的政治联盟促使美国在18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制定了累进制所得税制, 而不是一个会抑制消费的全国家业税制。

普拉萨德分析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罗斯福“新政”初期跨越到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 美国经济增长停滞导致共和党和民主党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使得信贷的获取更加便利。在此方面, 美国人承担了过重的债务, 从而引发了投机性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

然而, 历史状况分析成为了普拉萨德的新书所存在的问题。她并未探讨美国在大规模发展福利国家(从《社会保障法案》到“大社会”计划)期间出现的经济繁荣现象。她认为, 累退税制促进了欧洲福利社会国家的繁荣发展, 但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美国从1981

年以后转向弱化的累进税制，为何会导致美国公共福利的缩减而非增长。

同时，普拉萨德对平民主义者和20世纪初平均地权论者的影响力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并且把这些迥然不同的运动与城市激进和“新政”改良者的运动混为一谈。正如作者指出，一方面，美国在建立信贷推动消费方面一直是个异类，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并非唯一的推动力。富有创新精神的商业领袖，包括各大百货商场巨头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敏锐地发现了向消费者提供信贷的价值。同时，工人阶级运动通过创建住房贷款协会及信用合作社，大力推动了信贷的民主化进程。

此外，普拉萨德有关贫困的论点尽管很有煽动性，但也未能得到很好的阐释，并且掩盖了分配问题。普拉萨德声称，“激进式干预措施

适得其反”，不过激进和“新政”时代的监管干预措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减贫。扩大信贷范围可能作为福利的一种替代方式，但其本身的目的也是为了刺激增长，而非扶贫。此外，尽管欧洲福利国家更加成功地利用社会支出来减轻贫困和收入不公平现象，但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推行的过高累进所得税制以及最近的工薪收入所得税减免政策，通过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客观上也起到了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公平现象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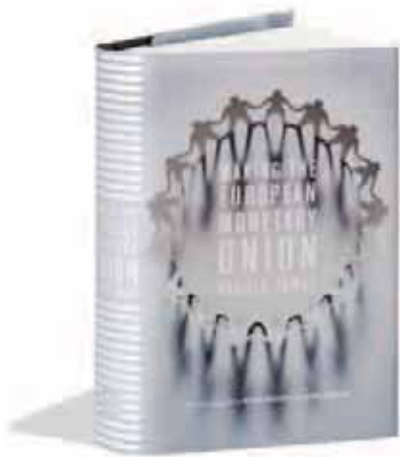
普拉萨德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福利社会、监管和信贷都很薄弱的发展中经济体，目前仍不清楚。巴西和中国在实施了扩大社会福利计划后经历了快速增长和贫困减少的时期，但上述两国在帮助其民众摆脱贫困方面能否取得像北欧诸国或美国那样的成功，最后结论仍有待分晓。

此外，本书还偶尔有重复之处，部分论断也过于新奇。例如，她认为，法国建立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美国劳工运动是因为“支持资本主义”而反对全国性的营业税；美国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险”。

尽管如此，普拉萨德的很多论点还是非常简洁明了和发人深省的，这些论点涉及信贷和福利之间的得失关系，以及美国强有力的监管及其累进税收政策（直至最近数十年间）所带来的影响。尽管书中缺乏政策建议，但它毫无疑问将激发人们对发达经济体如何才能提供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经济稳定“三架马车”的方式展开讨论。

雷蒙德·奥芬海泽尔
(Raymond Offenheiser)
国际施乐会美国分会总裁

货币狂欢：实现货币的统一



哈罗德·詹姆斯

建立欧洲货币联盟

贝尔纳普出版社，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2012，592页，35.00美元（精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最新出版的《建立欧洲货币联盟》(Making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一书，简要叙述了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建立前的各种历史事件，发人深省地阐释了EMU的起源、表现和问题。对于那些寻求了解EMU各种细节的研究型读者，该书广泛深入的历史探究必将受到他们的青睐。

本书写作上乘，有吸引力，是一个恰逢其时的作品。同时，该书条理清楚、全面透彻，并拥有大量的历史事实，深入探究了EMU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根源。

在经历了接近10年的相对宽松期后，EMU单一货币制随着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人们有关欧元可持续性的争论很快转向另一个问题，即在没有任何程度的财政联盟的前提下能否建立货币联盟的问题。

詹姆斯认为，欧洲的金融危机不能归咎于欧元。当前的危机应该源于在欧元建立之时讨论过但未得到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在欧洲央行行长委员会（最终演变为欧洲中央银行）的情报研究中，详细阐述了欧元区危机的起源问题。本书阐释了欧洲货币联盟以及统一货币概念从筹备到执行的全部过程。

本书通过追溯幕后谈判的详细信息，有助于读者了解欧洲货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正如本书所阐明的，缔造欧元的过程就是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不断角力的过程。

EMU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它将通过建立一体化的货币体系，借助一个主要的跨国货币欧元，继续朝着确保其成员国的物价稳定这一目标而努力。利用最近从欧

洲央行行长委员会和德洛尔委员会 (Delors Committee) 获得的 1988—1989 年的档案资料, 詹姆斯指出,

缔造欧元的过程就是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不断角力的过程。

尽管 EMU 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 但由于决策缺乏协调、决策过程复杂以及货币和经济可变因素之间过于复杂的相互关系, 导致 EMU 出现了各种严重问题。

最初, 人们将 EMU 视为政治统一后的欧洲所取得的又一个重大里程碑。不过,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德国的统一, 为确保欧洲和平、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必要性也不复存在。鉴于建立完

全的欧洲政治联盟的意愿逐渐消退, 欧元项目也因此短期内丧失了一个稳定的依托平台。

事实上, 欧元从其诞生之初就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欧元区在设计方面的缺陷从其建立以来就广为人知, 这些设计缺陷包括缺乏财政联盟, 没有建立应对不对称冲击和竞争力不一致问题的实施机制等。不过, 在建立欧洲联盟时, 政治上的势在必行最终战胜了经济考虑因素, 欧元也因此成为了这一政治项目的样板。

当前, 媒体对 EMU 即将“寿

终正寝”的报道仍然有增无减, 现在还难以很快找到应对这一错综复杂状况的措施。本书阐述了欧洲各国为了结束数百年来欧洲内部的冲突局面, 在经过数十年的合作后建立了 EMU 和欧元的历史背景。同时, 提出了对现有的金融危机进行平衡应对的措施。对于那些对 EMU 感兴趣的读者来说, 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 詹姆斯的这本书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 将受到对欧元持赞成、质疑态度或者现实看法的读者的青睐。

约翰·莱恩
(John Rya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沉闷的科学?

IMF



在我们的播客上聆听对有关顶级经济学家及经济决策的采访：www.imf.org/podcasts。

A

- Hisham Allam, Daria Sito-Sucic, Barbara Fraser, Jacqueline Deslauriers, Julian Ryall, Wale Fatade和Tolu Ogunlesi, 青年之声, 3月号
- Rabah Arezki, Klaus Deininger和Harris Selod, 全球土地热潮, 3月号
- Rabah Arezki, Arnaud Dupuy和Alan Gelb, 花费还是分配, 12月号
- Paul Ashin, 非法钱财, 真正的伤害, 6月号
- Irena Asmundson和Ceyda Oner, 回归基础: 什么是货币? 9月号

B

- 回归基础: 何为银行? 3月号; 什么是货币市场? 6月号; 什么是货币? 9月号; 什么是LIBOR? 12月号
- Bas B. Bakker和Christoph Klingen, 躲避风暴, 12月号
- Alicia Bárcena, 图表释义: 摆脱贫困, 3月号
- Bergljot Barkbu和Jesmin Rahman, 重构增长, 12月号
- Steven Barnett, Alla Myrvoda和Malhar Nabar, 中国式消费, 9月号
- Francesca Bastagli, David Coady和Sanjeev Gupta, 公平分享, 12月号
- David E. Bloom, 前途未卜的年轻人, 3月号
- Nick Bloom, Mirko Draca和John Van Reenen, 中国推动西方创新, 12月号
- Nina Budina和Andrea Schaechter, 数字聚焦: 追踪财政规则的运用, 9月号
- Adelheid Burgi-Schmelz和Alfredo M. Leone, 井然有序, 9月号

C

- Stijn Claessens, 摆脱债务困境, 6月号
- Jeremy Clift, 经济学人物: 关注差距, 6月号
- Bill Clinton, 合作的力量, 12月号
- David Coady, Valentina Flamini和Matias Antonio, 燃油风险, 9月号
- Carlo Cottarelli, 直言不讳: 紧缩时代, 6月号

D

- 数字聚焦: G7成员国从国外举债, 6月号; 追踪财政规则的运用, 9月号; 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 12月号
- Ricardo Davico和Brian John Goldsmith, 数字聚焦: 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 12月号
- J. Gregory Dees, 学习型社会实验室, 12月号
- Asli Demirguc-Kunt和Leora Klapper, 图表释义: 获取银行服务, 9月号
- Kemal Derviş, 世界经济: 趋同、相互依存与分化, 9月号
- Randall Dodd, 回归基础: 什么是货币市场? 6月号

E

- Mohamed A. El-Erian, 挥之不去的不平衡, 6月号
- Luc Eyraud和Benedict Clements, 向绿色进军, 6月号

G

- Panayotis Gavras, 评级博弈, 3月号
- Gaston Gelos和Yulia Ustyugova, 当商品价格飞涨之时, 12月号
- Atish Rex Ghosh, 壁垒将要倒塌, 3月号
- Jeanne Gobat, 回归基础: 何为银行? 3月号
- Geoff Gottlieb, Gregorio Impavido和Anna Ivanova, 金融业税收, 9月号

H

- Thomas Helbling, 繁荣期的大宗商品, 6月号
- Bernard Hoekman, 贸易政策至今仍完好? 6月号

J

- Luis I. Jácome和Erlend W. Nier, 整体性保护, 3月号
- Sarwat Jahan, Brad McDonald, 经济崩盘时的旁观者, 6月号
- Emmanuel Jimenez, Elizabeth M. King和Jee-Peng Tan, 提高教育水平, 3月号

K

- Meral Karasulu和Sergei Dodzin, 重返世界经济, 9月号
- Dean Karlan, 殊途同归, 12月号
- Masahiro Kawai和Domenico Lombardi, 金融区域主义, 9月号
- John Kiff, 回归基础: 什么是LIBOR? 12月号
- Kalpna Kochhar, Pradeep Mitra和Reema Nayar, 更多的工作, 更好的工作, 6月号
- Laura Kodres和Aditya Narain, 修复系统, 6月号
- M. Ayhan Kose, Prakash Loungani和Marco E. Terrones, 追踪全球经济复苏, 6月号

L

- Christine Lagarde, 直言不讳: 分割风险, 9月号
- Prakash Loungani, 经济学人物: 美籍全球主义者, 3月号; 经济学人物: 涉足多个领域, 12月号

M

- Kishore Mahbubani, 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 9月号
- Camelia Minoiu, 深陷于网络之中, 9月号
- Hanan Morsy, 受伤的一代, 3月号

N

- Malhar Nabar和Olaf Unteroberdoerster, 聚焦变化, 9月号

P

- Demetrios G. Papademetriou, 当移民遭遇增长缓慢, 9月号
- 经济学人物: C. 弗雷德·伯格斯特滕, 3月号; 劳拉·泰森, 6月号; 林毅夫, 9月号; 杰弗里·萨克斯, 12月号
- 图表释义: 摆脱贫困, 3月号; 生命之源, 6月号; 获取银行服务, 9月号; 投资于人, 12月号
- Eswar Prasad和Lei Ye, 人民币能否称霸世界? 3月号

- Marina Primorac, 慈善义举, 12月号

R

- Natalie Ramirez-Djumena, 图表释义: 生命之源, 6月号
- Martin Ravallion, 相对难题, 12月号
- Tamara Razin, Marcelo Dinenzon和Martin McCanagha, 数字聚焦: G7成员国从国外举债, 6月号
- Ana Revenga和Sudhir Shetty, 赋权于妇女是明智的经济学, 3月号
- James L. Rowe, Jr., 从危机道来, 6月号

S

- Alfred Schipke, 另一货币联盟剪影, 3月号
- Nemat Shafik, 直言不讳: 幻灭的理想, 3月号; 直言不讳: 反思可持续发展, 12月号
- Anoop Singh, Sonali Jain-Chandra和Adil Mohommad, 冲出灰色地带, 6月号
- 直言不讳: 幻灭的理想, 3月号; 紧缩时代, 6月号; 分割风险, 9月号; 反思可持续发展, 12月号
- Murtaza Syed和James P. Walsh, 虎与龙, 9月号

V

- Dirk Van Damme, Corinne Heckmann和Elisabeth Villoutreix, 图表释义: 投资于人, 12月号

书评

- 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3月号
- Olivier J. Blanchard, David Romer, A. Michael Spence和Joseph E. Stiglitz (编), 《危机之后: 主要的经济学家重新评估经济政策》, 3月号
- Janet Byrne (编), 《占领华尔街手册》, 6月号
- Tyler Cowen, 《经济学家“有饭吃”》, 6月号
- Yegor Gaidar, 《俄罗斯: 长远的眼光》, 9月号
- Jane Gleeson-White, 《复式记账法: 威尼斯商人如何创建现代金融》, 9月号
- Harold James, 《建立欧洲货币联盟》, 12月号
- Paul Krugman, 《马上结束这种萧条!》, 6月号
- Ngozi Okonjo-Iweala, 《知难而进的改革: 来自尼日利亚的经验教训》, 9月号
- Monica Prasad, 《过度消费的国度: 美国的富裕与贫困悖论》, 12月号
- Robert J. Shiller, 《金融与美好社会》, 3月号

浏览 IMF数字图书馆



在 www.elibrary.imf.org/fd12
上查看推荐阅读文章

www.elibrary.imf.o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Finance & Development, December 2012 - Chinese \$8.00



MFICA2012004